

引 言

1995年11月4日晚，正是欢度周末的好时光。可对整个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尤其是以色列和阿拉伯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却是一个黑色的周末。正是这天晚上，缔造巴以和平的领导人之一，号称和平斗士的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全世界震惊了，他那轰轰烈烈而又令人心碎的一生，顿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为他悲哀，为他流泪，为他祈祷，祝愿他的在天之灵安详。

一只和平鸽就这么被枪杀了，一个和平的斗士就随着那野蛮、罪恶的几声枪响而倒下了。但是，拉宾为中东和平鞠躬尽瘁的高大身影，并没有在人们心中倒下，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深深地感动着人们。1948年，以色列国诞生。为了自己的祖国，拉宾自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都投入到了保卫国家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事业中去了。拉宾的一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色列国家发展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的历史。拉宾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精神，永远是人类的财富，就像一面旗帜，永远昭示着人们。他成长过程中所表现的远大抱负和遇事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光辉照人的。在他倒下的时候，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也染红了他随身带着的那一首《和平之歌》。值得高兴的是，爱好和平的以色列人们和巴勒斯坦人们并没有忘记这首歌，他们唱着它，继续把和平的进程推向前进！

——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

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我们复生。

生命之火被熄灭的人，

血肉之躯被埋入黄土的人，

悲痛的泪水无法将他唤醒，

也无法使他重获生命。

无论什么人，

无论是胜利的欢乐，

还是光荣的赞歌，

都不能使他从黑暗的深渊中，

回到世上与我们重逢。

所以，请唱一首和平之歌吧。

不要小声地祈求神灵。

引吭高唱和平之歌，

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

第一章 拉宾之死

1 国王广场的枪声

1995年11月4日是星期六，是犹太教的安息日，也是以色列的法定假日。以往的这一天，以色列大部分交通工具都会停驶，娱乐场所和大小商店会关门停业的。但是，今天却不一样，当夜幕降临以后，特拉维夫市灯火辉煌，异常热闹的气氛中透着祥和。约10万市民沐浴着习习的海风，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的“国王广场”（已改名为伊扎克·拉宾广场），去参加支持和平进程的盛大集会。

集会是由“支持和谈，结束以阿争端总委员会”组织的。这是一次少有的规模盛大的公众集会，集会的主题是：“要和平，不要暴力。”会议的气氛表明：人们已对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来，战火持续不断所带给中东地区及全世界和平、安全的极大损害感到了厌恶和不满。盼望和平已成为中东人民最渴望的事情。伊扎克·拉宾的伟大和魄力，既表现在他驾驭战争的能力，也表现在他能顺应民心、表达民意、推进和平之舟的水平。拉宾决定参加今晚的集会。

晚上7点左右，拉宾在佩雷斯及其他内阁成员的陪同下，随着市政厅电动平台在国王广场的缓缓升起，来到了集会中心。埃及、约旦驻以大使等来宾，也应邀出席。

拉宾显得特别激动，他看到欢声雷动的人海，波浪翻滚似的彩球、横幅，有这么多人支持和平进程，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时地向人群招手致意。

一些演员也来登台助兴，在拉宾和佩雷斯中间穿来穿去，高唱和平颂歌。集会正式开始后，拉宾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决心继续中东和平进程的演讲。

晚风吹拂着他的满头白发。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肩负着和平的使命，他用坚定的语气向集会的人们说：“我当了27年军人，打了很长时间的仗，那是因为过去我别无选择。但是今天和平的机会来临了。为了今天在这里和不在这里的人们，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听惯了他低沉沙哑的声音的人们发现，他今天似乎换了一个人，讲话坚定有力富有底气。人们聆听着这位中东和平缔造者的演讲，历史却在他们的脑海里一幕幕闪过。

中东，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西奈沙漠和朱迪亚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和阿拉伯人民。耶路撒冷，世界三大宗教的诞生之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

中东，世界经济的“血库”，全球60%的“黑色血液”——石油埋藏在这里浩瀚的沙漠下……半个世纪来，这里一直是血雨腥风，战争和暴力连绵不断，世界列强伸出争夺的黑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争夺在这里的生存权利而互相厮杀，鲜血染红了沙漠，陷入仇恨的深渊，和平成了沙漠上的“海市蜃楼”。

1922年7月24日，国际联盟把这块阿拉伯人叫做巴勒斯坦、犹太人叫做以色列的土地交给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托管。

也就在这一年的3月1日，圣城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

家庭里降生了一个男孩，从美国移民至此的父母给他取名叫伊扎克·拉宾。

青年时代的拉宾立志农业救国，他在特拉维夫一所农业中学毕业后，赴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主攻灌溉工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的梦想破灭了，他投笔从戎，加入了反对轴心国的军事组织，战火锻炼了他的才能，1964年他就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

1967年，他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六·五”战争，使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埃及西奈半岛和叙利亚戈兰高地划归以色列版图。但是，他辉煌的战绩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联合国通过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战争并没有带来和平。

1968年，拉宾退役从政，就任驻美国大使；197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1977年，他的政府垮台后，他有了冷静的思考，他开始认识到，和平是历史的潮流，只有顺应潮流，才能生存和发展。

1992年，70岁的拉宾东山再起，他在大选中击败了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米尔，再度出任总理。他出任总理后，看到了冷战结束给和平带来的希望，上任不到一周，就向阿拉伯国家发起了令人目眩的和平攻势。在整个中东问题上，其实质就是巴勒斯坦问题。他选准这一点，作为突破口，接受了巴勒斯坦人提出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及联合国242号、338号决议，中东和平出现曙光。

1993年11月13日，巴以第一个和平协议——《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在美国白宫签署。1995年9月28日，拉宾再度来这里与阿拉法特共同签署了关于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塔巴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在10天后从约旦河西岸撤军，6个月后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的范围扩大到西岸的27%的地域。巴勒斯坦的雏形已经出现，以色列极右势力则哀叹：“大以色列之梦”从此破灭……

“总会有和平的敌人，”拉宾继续说道，“他们正在拼命地伤害我们，目的是破坏中东和平。但是，我要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位和平伙伴，那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过去是敌人，现在它已经停止恐怖活动。没有和平伙伴就没有和平。为了解决以阿冲突中最复杂、最持久、最敏感的部分——以巴冲突，我们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巴解也要作出自己的努力。我相信，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支持和平，愿意为和平去冒任何危险……”

拉宾说得对：“总会有和平的敌人。”自“塔巴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极右势力反对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反对把西岸归还巴勒斯坦，抗议示威和暴力活动此起彼伏，他们大骂拉宾是“叛徒”、“卖国贼”。矛头直指拉宾和他的联合政府。威胁政府要人的事件接连发生，住房部长埃利泽遭到愤怒人群的围攻；教育部长阿洛尼遭到殴打；环境部长的轿车被推下高速公路。为此，以色列专门负责要人保安的部门因此加强了对拉宾和其他政府部长的保安措施。拉宾率领内阁成员出席大会，是为了显示以色列人民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支持，也为了同那些极右势力的反和平集会相抗衡。

拉宾的讲话已接近尾声：“这个大会就是要向以色列人民，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阿拉伯世界，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和平。”拉宾以和平的呼喊结束了他政治遗言的

讲演：“只有和平才能解决以色列面临的各种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实现和平的机会，如此盛大的集会表明，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

拉宾演讲完毕时，已是晚上七点五十分。但他意犹未尽，从衣袋里取出歌篇，和全场群众一起高唱《和平之歌》：

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
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我们复生。
请唱一首和平之歌吧，
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

数万人齐唱，广场上的情绪到了极高潮……

就在拉宾演讲的同时，有一个 27 岁的法律系学生伊扎尔·阿米尔，也在为他的暗杀行动作准备。他抚摸着泛着铁青色幽光的贝雷塔左轮手枪，不停地狂笑：“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定要完成一件伟大的使命，刺杀拉宾，让他变成一具僵尸！”他抚摸着这只手枪，就像抚摸着—一个美丽冷峻的少女。他吻着枪管，精心地把子弹压进膛，暗自高兴道：“宝贝，就看你的了。你肯定会成功的。”他穿上牛仔裤，套上一件蓝色 T 恤衫，把—顶黑色编织帽戴在头上，走出了家门。这时正是黄昏到来之际，因是安息日，街上行人不多。按照犹太教的仪规，周六的晚上，太阳落山后方可开通公共汽车，而此时正是通车的时候。

出了家门，伊扎尔·阿米尔便上了公共汽车，朝特拉维夫市中心广场出发。

阿米尔是特拉维夫市郊外的巴尔·伊兰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家住以色列中部。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在邻居们的眼里，他是个温和、有礼貌的孩子。上大学前，他曾是以色列陆军后备役军人，曾当过保安人员，拥有持枪证。

巴尔·伊兰大学是一所犹太教会学校。在同学们的印象中，阿米尔性情孤僻，沉默寡言，多愁善感。自巴以和谈以来，阿米尔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每一次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人他都义愤填膺，发誓说：“我将把这一切罪恶算在拉宾和他的政府账上。”同学们还在他的床下发现了被取缔的极右组织卡赫运动的分支机构“埃亚尔”印刷的反政府传单，他还向同学透露：他在西岸参加以色列定居者抗议政府的示威，被警察逮捕过。他多次问参加过极右组织“大卫之剑”的哥哥哈加伊，怎样才能阻止政府的中东和平进程。同寝室的—同学还发现：阿米尔常看的有两本书，—本是专门描写政治谋杀的《杰卡尔的这一天》，另一本则是吹捧—一个在西岸杀死了 29 名阿拉伯人的犹太定居者的书。他不仅看书，还积极行动，曾几次想刺杀拉宾，但都没成功。今晚，他想孤注—一擲，—一举成名。

当他赶到集会广场时，拉宾正在演讲。当他挤到演讲台下，拉宾已演讲结束，正与佩雷斯紧紧拥抱。他便在这时走向政府要人汽车停放处。人们都沉醉在刚才演讲的那种和平气氛中，谁也没有注意他。

拉宾在众人的簇拥下健步走下主席台，准备乘车离开广场。他—边—走—边—同—群—众—握—手，并谈笑风生地—问—佩—雷—斯：“你说过，在这个大会上

有人要行刺，不知道这人群中谁会开枪。”

当佩雷斯第一个走下平台时，他碰到了拉宾的司机达姆提。司机问他：“总理什么时候走？”他回答说：“再过几分钟吧。”说完，他就和司机站在车前看平台上的拉宾和政府要人及外国使节握手话别。

拉宾和夫人利扬走下台阶时，两人相距仅一米左右。他们向停在广场边的黑色凯迪拉克防弹专车走去。在这之前，卫士曾要求拉宾穿上防弹衣，尽快离开广场。但拉宾拒绝了，他幽默地笑着说：“有上帝保佑，我就跟在家里一样安全。”曾有记者问利扬：“难道你不怕有疯子突然冲向总理开枪吗？”利扬听了似乎很惊奇，她反问记者：“你疯了吗？为什么突然提这么个问题？我真不可思议，你们记者怎么有这么多的怪问题。”

但就在拉宾离开众人，走向自己的汽车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黑暗中突然窜出一个人来，这就是伊扎尔·阿米尔。他见拉宾距自己仅两米远，急忙从怀里掏出左轮手枪，朝迎面而来的拉宾一边喊：“没事，没事，这不是真枪。”一边“叭叭”开了两枪。拉宾感到胸部被人重重击了两拳，心口有一阵钻心的痛，便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腰。如梦初醒的卫士一时竟忘了要擒住凶手，而是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遮住拉宾，但却把拉宾的背部暴露给了凶手。阿米尔绕开卫士，又朝拉宾背部开了两枪。一弹击中拉宾，另一弹击中了遮挡的卫士。有“和平斗士”之称的拉宾，就像一只飞翔的鸽子，倒在了罪恶的枪口下。

在一名卫士的帮助下，司机达姆提把拉宾抬上汽车。另一些卫士则擒住了凶手，还有一些卫士则拉起利扬就走，还宽慰她：“那是一支玩具枪，不是真的。”

在送拉宾去医院的途中，卫士问拉宾：“总理先生，伤着了吗？”拉宾呻吟着，回答沉沉的：“是，是，背上，背上。”但他很快又低沉而清晰地说了他一生中最后两句话：“我没事。我没事。”说完，便昏迷过去了。

一分钟后，拉宾被送进伊希洛夫医院抢救，但此时拉宾已没有血压和脉搏。三枪击中拉宾，一颗打在脾上，一颗击中脊椎，另一颗则是经过改装的达姆弹，俗称炸子儿，是国际上禁用的子弹，击中了拉宾的腹部，导致体内大出血，无法止住，鲜血染红了手术台。据后来阿米尔哥哥哈加伊在法庭上供认：子弹是他改装的，在弹头上加了一个铁丸，使其杀伤力更大。

当晚 11 点 06 分，以色列电台向全国宣布：拉宾总理伤势非常严重。与此同时，在拉宾遇刺的国王广场，人们点燃蜡烛，唱起悲歌。更多的人则涌向医院，等待拉宾的最后消息。11 点 10 分，医生们走出急救室，宣布拉宾抢救无效，心脏停止跳动。

11 点 14 分，拉宾的高级助手哈伯走出医院，向守候的记者和人们正式宣布：拉宾遇刺身亡。

2 凶手伊扎尔·阿米尔

大学生伊扎尔·阿米尔，谁也没想到他会充当凶手，而且是刺杀总理的凶手。但事后他的同学回忆，在许多方面他却早已露出苗头。

11月6日，阿米尔被法庭传讯。他在供述中说，枪杀总理的原因是因为拉宾“想把我们的国家拱手让给阿拉伯人”。

阿米尔受审的法庭离他星期六晚刺杀拉宾的地点只几百码。他对法官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阻挡和平进程，我们需要一副铁石心肠。”

阿米尔说，拉宾释放了一批巴勒斯坦囚犯，没过几天，这些人就杀害了犹太人。他说，由于拉宾的政策，一个巴勒斯坦正在建立起来，“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怎么会没有注意到。”

法官问他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他说他的想法来源于“哈拉卡”（犹太教塔本德经中口述的不载于圣经的部分）。他说：“按照‘哈拉卡’，你可以杀死你的敌人。”

法官问他是否是单独一人的行动，阿米尔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阿米尔出生于以色列，父亲是个信教的经文抄写者，母亲是幼儿园教师。

他是批评政府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抗议拉宾政策的活动。在警方的审问下，阿米尔供认，他早就策划暗杀行动，前两次曾打算杀死拉宾，但由于安全措施严密而一直未下手。他对审问者说：“我不后悔，这个行动是我一个人单独干的。”

根据一些人的说法，阿米尔同一个称为 EYAL 的反阿拉伯的好斗组织有联系，这个组织强烈反对以色列政府同巴解组织达成的协议。其领导人阿维什伊·维拉夫承认，他认识阿米尔。但他否认这次暗杀是 EYAL 组织所为。一个署名 AIN（即以色列报复组织的希伯来文首字母缩略词）组织称，这次暗杀是其所为。这个组织以前不为人所知，现在尚不知这个组织同阿米尔是否有联系。

以色列警方 11 月 5 日逮捕了涉嫌参与谋杀拉宾总理的第二名嫌疑分子。他便是阿米尔的哥哥哈加伊·阿米尔，警方怀疑他知其弟谋杀拉宾的计划，并帮助其弟实施。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一名法官认为，刺杀总理拉宾的杀手伊扎尔·阿米尔和他的同谋哥哥哈加伊·阿米尔不是单独行事的。警方指控哈加伊是伊扎尔的同谋、私藏武器和非法制造弹药。报道说，警方在哈加伊住宅里搜查出武器以及类似刺杀拉宾的子弹的弹药。

以色列警方说，哈加伊供认他事先得知其弟要刺杀拉宾，他还知道伊扎尔·阿米尔此前曾两次企图杀拉宾。以色列法官对阿米尔兄弟传讯后认为，他们不是单独行动的。

此次谋杀以后，以色列政府对极右的极端犹太人组织采取了严厉打击措施，并开始逮捕总部设在约旦河西岸的“海亚勒”、“卡哈纳海依”和“卡赫”三个犹太极端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及其成员。

11 月 18 日，刺杀拉宾的凶手伊扎尔·阿米尔经过多次审讯后向警方供认，他哥哥哈加伊、犹太人极右组织成员阿达尼和前女友巴尔·伊兰大学法律系学生哈尔·谢菲是他暗杀拉宾的同谋。

阿米尔承认，他事先将暗杀拉宾的计划告诉了这几个人。阿米尔在被捕后曾一度咬定，他是一人作案，与其他任何人没牵连。

哈尔·谢菲是 11 月 15 日被警方逮捕的。审讯后警方宣布，她是案件的“核心和关键人物”。

3 耶城隆重安葬拉宾

11月5日，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在拉宾总理遇害的地方点燃蜡烛，沉痛悼念这位和平斗士。这位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推动者9月底在华盛顿同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签署了关于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巴勒斯坦自治的协议。拉宾的被害，对整个中东和平进程是一个巨大损失，对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是一件沉痛的事。11月6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前往以色列驻华使馆吊唁遇害的拉宾。钱其琛对拉宾的遇害向以色列驻华大使本·亚可夫表示深切哀悼，并赞扬拉宾总理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作出的积极努力以及为发展中以友好合作关系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1月6日下午2点，以色列在西耶路撒冷赫兹尔山军人公墓为拉宾总理隆重举行国葬。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美国总统克林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理、英国首相、德国总理以及来自日本、西班牙、摩洛哥、阿曼等8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府代表参加了以色列规模空前的葬礼。中午，灵车队离开以色列议会大厦，两辆白色警车开道，第三辆车上置放着覆盖以色列国旗的拉宾的灵柩，第四辆车上放满了花圈，后面是长长的车队。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站在公路两旁，目送灵车缓缓经过。葬礼在公墓前的广场上举行。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全体参加葬礼的人和以色列全国人民默哀2分钟，哀悼为和平献身的拉宾总理。

来宾代表先后在葬礼上致悼词，一致称赞拉宾生前为以色列国家建设、实现中东和平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3点20分讲话结束，全体起立向拉宾灵柩致敬。随后8名军人抬着灵柩，在拉宾遗孀、亲属及来宾的陪伴下走向拉宾的最后安息地。灵柩缓缓放入墓穴，军人们把一盆盆的热土撒入墓中。魏茨曼、佩雷斯等人把一个个花圈献在墓穴上。在拉宾墓旁，安葬着另外两位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和列维·艾希科尔。

4 夫人利扬

对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的遗孀利扬来说，1995年11月4日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与她朝夕相处47个春秋的丈夫就那样与她永别了。家里的抽屉里还有拉宾生前没有吃完的巧克力，冰箱里有他拉开的酸奶，厨房里有他熬夜时吃剩的玉米片……看到这一切，利扬心里难受极了，但是利扬努力使自己镇静、坚强起来。

为拉宾举行隆重葬礼之日，利扬虽然不能自己，由孩子们搀扶着。可是，当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领导人与她握手表示慰问时，她立刻挺起胸来。她甚至同丈夫的政敌——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雅明·内塔尼亚胡握了手，不过，这样的握手是“冷漠无情的”。随后，她频频在以色列和外国电视上露面，接受记者采访，呼吁人们继承拉宾的事业，把和平进程推向前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1月9日晚上，利扬接受了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的密访。他们边喝咖啡边谈话。利扬的3个孙子孙女还问阿

拉法特怕不怕被谋杀，阿拉法特笑了笑，逐个吻了他们的额头。11月12日，25万以色列人在拉宾遇刺的地点为他举行追悼会，利扬再次呼吁人们致力于拉宾为之献身的和平事业。

利扬与拉宾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的一面镜子。利扬生在德国，后来移居巴勒斯坦。1944年，利扬正上高中，而拉宾则是一位地下犹太战士，两人偶然认识，一见钟情，四年后他们正式结婚。从此，利扬始终是丈夫的知己和忠实的支持者，两人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他们膝下有一儿一女，还有三个孙子孙女。

为了倡导和平，她和拉宾不怕冒个人危险。自从1993年拉宾和阿拉法特在白宫南草坪上那次历史性握手以来，一些右翼分子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在她家门前的人行道上静坐示威，呼喊：“叛徒，杀人犯！”对此，她一笑了之。一次，她在特拉维夫的一家购物中心碰到一名妇女。这位妇女问她：“你一个人走路不怕吗？”利扬回答：“不怕。”那位妇女接着说：“我就怕有人在背后戳我一刀。”利扬对她说：“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拉宾遇刺时，有一名卫士中弹受了轻伤，在从医院回家的途中，这位卫士顺便去探望利扬，倒在沙发上失声痛哭。利扬赶忙安慰说，别再为这件事难过了，要振作起来。说着，还吻了吻这位卫士的头发。

5 从拉宾之死看以色列的保安和社会

拉宾遇刺的消息传出后，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疑问：为什么被认为是世界最可靠的以色列保安体系却未能保护政府首脑的安全？

负责拉宾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是名列世界四大情报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苏联克格勃、英国苏格兰场和以色列摩萨德）之一的“摩萨德”中的一个机构，名称为“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希伯来语中简称“希因·贝特”或“希贝赫”。这个机构由负责以色列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成员主要是经过“摩萨德”组织专门特工训练的青年男女。“希因·贝特”是一支享誉国际的保安部队。60年代以来，在反间谍、反恐怖、为名人保镖、保卫国内国外的国际机场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那么，如此强悍的保安部队何以让一名非职业枪手携带武器至总理仅几英尺远的地方，从容地连开三枪。它证明以色列安全保卫体系存在严重的漏洞。一是缺乏事先警报。根据保安规则，重要人物安全保证的关键是预测。以色列情报部门据说掌握着几乎所有来自阿拉伯方面现实和潜在的对拉宾的可能威胁，然而恰恰对一个“陌生人”出于“上帝的旨意”而行事的情报掌握不够。事后透露，在不久前，以色列警方曾经根据对以色列政局的分析警告政府，在右翼利库德党极端分子的宣传和挑动下，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测的暴力事件。其实极右分子已经制造了一些暴力活动：8月份一名内阁部长的汽车被人掀翻；9月份耶路撒冷警察局长遭到右翼分子的攻击；10月份拉宾本人也在一次集会中受到右翼分子的攻击和诘问；极右分子甚至在一次集会上不允许总统魏茨曼说话。二是保密不完善。暗杀一个受保护的人物，首先要摸清这个人的行踪，而这一点恰恰应该高度保密。这一次凶手却不仅知道拉宾将从市政府后门离开，而且知道他将在台阶处乘他的专车，再离开特拉维夫。三是保卫者与被保卫者之间缺乏协调。一

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警方人员声称，拉宾总理在安全方面不与保卫人员合作，也是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之一。当天晚上拉宾本应在讲话结束后立即离开现场，但是拉宾拒绝了。他继续与人群谈话、握手，并对卫士说：“这里我如同在家里一样安全。”这一迟缓，给了凶手以可乘之机。拒绝穿防弹背心也是拉宾致死的原因之一。拉宾作为一个前军人，他不愿意因穿防弹背心给人一种怯懦的印象。四是保安人员麻痹大意。拉宾最后离开会场时，兴致勃勃地快步走向自己的防弹轿车，将负责保安的大批特工人员甩在了后面。这时，一些反对阿以和平的极右分子向正在离场的拉宾高喊：“卖国贼，叛徒。”保安人员忙上前维持治安，这时，拉宾身边仅有两名卫士，怀揣装有9发内爆子弹6毫米口径手枪的阿米尔，从一条小道悄悄地接近了拉宾。另外，凶手能够向拉宾连开三枪，也说明卫士反应迟钝。

拉宾之死的原因，也与以色列社会环境有关。表面上看来，以色列是统一的、完整的。但是，很多以色列人自己承认，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西方式的，受过良好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生活比较富裕，事实上控制着国家权力；另一个是东方式的，比较贫穷，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虽然在人口上是占多数，却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没有多少自己的代表。与此同时，强烈的党派色彩，造成了内阁的严重离心倾向。与总理不属于同一政党的部长，本着本党本派利益至上的原则，常和总理唱对台戏，部长们的权力非常大。以色列有句家喻户晓的政治笑话，称总理为“平等者中的第一位”。另外，以色列是个犯罪率很低的国家，特别是贫民犹太人，暴力凶杀案件很少，仅为美国的1/10。在这样一个武器枪支十分普遍的社会里，暴力犯罪率这样低，的确是一个奇迹。拉宾和夫人早已习惯于这种社会的安定，同时也被当晚的热烈场面所陶醉。

由于以上多种原因，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

6 拉宾之死对中东和平的影响

伟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的存在与人类社会的命运休戚相关。拉宾之死，显然对中东和平进程有着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拉宾为和平铺设了路轨，时代的列车便会向前。也就是说，拉宾的死对和平的影响是暂时的，而他生前为和平所做的奉献、影响才是深远的。

首先，拉宾遇刺事件深深刺痛了以色列人，激起以色列人对和平更大的支持。拉宾此次死于犹太人之手，而不是阿拉伯人之手，这对以色列人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和震动，使他们认识到右翼势力的危险性，也感到实现中东和平责任在阿拉伯和以色列双方。对拉宾遇刺的悲痛会转为对和平的支持和追求。其次，以总统在拉宾逝世后也多次表示支持和平进程，继续完成拉宾的未竟事业。反对党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公开称，支持组成工党领导的新政府。第三，地区和国际大环境有利于和平。80多个国家派元首、政府首脑或政府代表参加拉宾葬礼在以色列历史上是空前的。

更何况，此后佩雷斯宣布，以色列和叙利亚将彻底恢复和谈，早日达成共识，以结束中东地区长达40多年的阿以冲突。中东和平的伟大缔造者拉宾走了，人们普遍担心正在乘风破浪、迅速前行的中东和平巨轮

是不会停航的。佩雷斯表示，以色列将坚定不移地执行拉宾开创的以阿和平政策，继续同阿拉伯人推进和平进程。他说：“尽管拉宾被暗杀，我们大家已决定继续走拉宾开创的和平道路。这是他给我们的最后遗言。和平是暗杀不了的。”

第二章 少年拉宾

1 父母的奇遇

拉宾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极浓的家庭里。

父亲老拉宾（原名鲁比佐夫）和母亲罗莎，可以说为了重建犹太民族家园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宾的父亲鲁比佐夫就参加了英军，到处转战。说起他从军的事，还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

1917年的一天，身体高大的小伙子鲁比佐夫，来到美国芝加哥一个招兵站，在大厅里焦急地转来转去。英军招募小组正在检验报名参加犹太军团的申请者，目的是为了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取巴勒斯坦。纳赫米亚·鲁比佐夫没有验上，因此他显得焦急，甚至有点垂头丧气。他的脚被查出是平脚板，这不利于军人的艰苦行军，但他不甘心就这么被刷掉。

鲁比佐夫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幼年丧父，14岁他便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艰苦的生活和恶劣的社会环境，使鲁比佐夫很早便投入到革命活动中，他参加过多次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罢工活动。当然，他照样逃不脱宪兵和密探猎犬般的搜捕，但他幸运，最后还是孤身一人逃到了美国芝加哥，其中所经历的艰苦是一言难尽的。

在芝加哥，鲁比佐夫先是一名街头的卖报小贩，后来才做了一名犹太裁缝，但他生活得很自在，业余时间就上夜大读书。尽管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但他的政治热情不减，他很快就成为美国移民中犹太复国主义党的成员，对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极为关心。他不是一个贪图安逸的人，他渴望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自己的犹太家园。现在有了机会，却被一双平板脚弄砸了，他不甘心。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在寻找机会。突然，脑子里闪出一个改名念头。于是，他以“拉宾”的名字大模大样地再次向另一位招兵军官走去。这位军官就是与老拉宾后来患难与共的战友大卫·本·古里安，他矮矮的个子、宽额角。他抬起头来目光如剑地盯着身材高大的老拉宾，半晌后竟大笔一挥让鲁比佐夫过了关。

鲁比佐夫便以老“拉宾”的名字成了英军第38营的士兵。第38营因为大部分士兵是美国佬，故又叫“美国营”。该营官兵中也有一些被土耳其当局流放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其中有古里安和本·茨维等。有意思的是，在开往巴勒斯坦的途中，老拉宾又在埃及结识了另一位很有影响的犹太军官弗拉基米尔·泽夫·雅博茨斯基。雅博茨斯基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激进的右翼“修正派”领袖，梅纳赫姆·贝京是他最得意的门生。老拉宾也深得雅博茨斯基的好感，并且教老拉宾学习希伯来语，同时也向他宣讲自己的观点。

但是，犹太军团成立得太迟，开进巴勒斯坦时已没有什么仗可打，从而使老拉宾失去了立功的机会。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只留下回声。不久，耶路撒冷发生了反犹太人的骚乱，这才使他多少挽回了一些损失，他和他的战友被派去平息骚乱。

人是需要缘分的，缘分是一种可望而不可求的机会。但缘分偏偏宠爱老拉宾。他没有在战场上获得多少战利品，却在情场上大获全胜，一

位楚楚动人的犹太姑娘成了他情场上的俘虏。这便是拉宾的母亲罗莎。老拉宾在耶路撒冷遇见了她，被她的美丽所吸引，他便以参军的那股倔强征服了她。后来，也就是 1921 年春天，老拉宾在耶路撒冷与罗莎结了婚。

1919 年夏季的某一天，在俄国黑海港口敖德萨的码头上，一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又唱又跳，引人注目。他们是一群到巴勒斯坦去建立自己的集体定居点“基布兹”的犹太移民。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位美丽的犹太姑娘，禁不住热情歌声的诱惑，很快也进入了欢乐的圈子里。她便是拉宾的母亲科亨·罗莎，在这里她走上了与老拉宾相遇的有缘之路。

罗莎出生在俄国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罗莎自幼个性极强，在十姊妹中是有名的。她凡事很有主见，上高中时就因违抗父命进入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寄读而与父亲闹翻了脸。但她父亲很疼她，毕业后又把她带到彼得堡去学做木材生意。罗莎很快便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木材商，到十月革命胜利时，她又成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军需品厂的老板。但她当时被“扫地出门”，结果引发了全厂工人的罢工，生产陷入了瘫痪。当局只好让她继续留任厂长，但她却再也不想干了，她决定离开俄国。

罗莎原不打算去巴勒斯坦的，她打算去北欧或美国定居，她当时对重建犹太民族家园没有什么兴趣。就因为那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吸引力，她才走上了与老拉宾奇遇的旅途。

罗莎开始是和伙伴们一块在加利利海畔的卡乌塔兹·钦乃里特安营扎寨，但她受不了那种恶劣的条件，也不习惯“基布兹”那种近似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她只好悄然离开，去耶路撒冷投奔她叔叔，随后又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护士工作。在那场耶路撒冷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的骚乱中，是老拉宾用他那厚实温暖的胸膛保护了她。她从惊恐万分中抬头，看到的是一双热情而又坚定的蓝眼睛，她的心弦触电似地颤抖。随后，他们便开始了奇遇后的热恋，不久便结了婚。

结婚以后，老拉宾在海法市找到了一份邮电局的差事，罗莎也是一家木材商行当会计。当时，英国人解散了犹太军团。罗莎当会计时的木材行出纳，就是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女强人果尔达·梅厄夫人。也就在这时，小拉宾即将出生，罗莎回到了耶路撒冷。伊扎克·拉宾出生后，老拉宾把全家迁到了特拉维夫市，时间是 1923 年。

2 家庭的熏陶

老拉宾把全家迁往特拉维夫市以后，家庭生活才真正走上正轨，逐渐平稳起来。这时候的罗莎，已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在政治才能上，正如经商才能一样，老拉宾同样不如妻子。当罗莎被选为特拉维夫市政委员时，老拉宾还只不过是一名金属工会的积极分子。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建立自己家园的追求。为了建立自己的祖国，他们连自己的家也贡献出来作为活动的场所。他们明白：家没有祖国无以成家。每天，来自各个阶层的工党积极分子，总在他们家里讨论或争辩到夜深人静。

这时，父母几乎是全身心投入到对祖国的追求中去了。小拉宾和小

他三岁的妹妹拉切尔，已很少感受到父母的哺乳之爱。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拉宾兄妹二人在这种情况下懂事很早，从小就学会了干各种家务。大人们在慷慨激昂地发表高见的时候，兄妹二人便默默地干着收拾桌子、添茶水和上点心之类的事儿。他们俩就像两条小鱼，在大人们身旁钻来钻去，也听到不少大道理。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在拉宾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已习惯于过这种献身事业的动荡生活。

3 坚强的小拉宾

小拉宾上完幼儿园，就被送进离家很远的工人子弟学校去读寄宿。当时，工党的成员把培养自己子女过这样一种寄读集体生活视为一种惯例。但拉宾太小，初进学校时真还有些不习惯。白天有小朋友一起学习、做游戏倒还行，但一到晚上，妈妈不来接，就想家，就害怕，不由得大哭起来。这样，马上就引起了其他的孩子们也嚎啕大哭起来。老师们毫无办法，只好耸耸肩，摊开手，干脆让他们来一次哭声大合唱。这样的大合唱每年新学期都有一次。

妈妈何尝不想自己的孩子，但她们根本没来看。罗莎实在太忙，同时也没有必要，孩子是未来国家的财产，必须从小接受最严格的集体生活教育。在学校里，学生们必须自己做饭、洗衣、种菜和干各种杂活，自私和偷懒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尤其是学校的各种庆祝活动，孩子必须一大早就起床，来回不停地奔忙，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嗡嗡作响的大蜂窝，只有等戴着白手套的校长确信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的时候，身着校服的孩子们才能松上一口气。这一切，小拉宾很快就适应了。

坚强的小拉宾不怕半军营式的生活，他只怕妈妈突然撒手离去。懂事的小拉宾已知道妈妈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痊愈已不可能。每当放假回家时，拉宾总是想方设法使妈妈快乐一些，他唯一的办法便是撒娇、讲故事和送上自己烤的点心。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含着泪把他和妹妹搂在怀里。她没宠爱过他们，但孩子们最敬重自己，她既满足又伤感。在孩子们身后，是怔怔地望着他们的老拉宾，他根本听不进妻子的劝阻，到处借债为她医治，他在履行自己当初的山盟海誓。对母亲的牵挂，使一天天长大的拉宾变得沉默和内向，在孩子们中显得早熟，他以便愿母亲活得更长一些。

4 农业报国

在上8年工人子弟学校和2年当地初中以后，拉宾报考了北加利利地区的卡多里农业学校。当时犹太移民拓垦活动蓬勃发展，急需农业科技人员，报考这所农校便成了大热门。可惜的是拉宾成绩不够理想，虽然达到了录取线，但农校通知需复试一次才能决定取舍。这就刺伤了他的心，他在暑假里拼命地复习，复试中以高分被录取。1937年秋，他成为卡多里农校的一名新生，开始了他农业报国的抱负。

卡多里农校的气氛与工人子弟学校大不相同。原有的那种强迫制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和谐宽松的气氛。尽管学校安排了各种劳动和公益

事业义务服务，但管理方式已民主化了。为了表示对学生人格的尊重，考试时教师不在课堂监考。在这种情况下，考场作弊和违反纪律的现象都很少见。老师以讨论的方式向学生灌输知识和责任感，学生自己管自己，班委会、学生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就在他专心致志投入学习的时候，他最不希望出现的不幸事情发生了：他的母亲因忙于工作得不到休息而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拉宾在母亲弥留之际回到了母亲身边，但她已说不出话，只能睁着眼深情地看着拉宾，寄托着无限的希望。拉宾扑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母亲见了儿子，安心地撒手而去了，把一切甜蜜和温情都变成了令人伤感的往事。

参加完母亲的悼念活动以后，拉宾又回到了学校。从此，他似乎变了一个人：话明显少了，常常一个人在教室里苦读。母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太大，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应有一种责任感。他决心像母亲一样，成为一个对民族有用的人。

正当拉宾拼命用功，增长本领的时候，一场浩大的阿犹冲突爆发了。在拉宾的生涯中，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放弃了农业报国的抱负，毅然弃笔从戎。

5 “帕尔马契”出击

二战前，随着犹太人的大批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地区，那里原有的阿拉伯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他们生活的空间在逐渐缩小，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工作机会空前减少。这样，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矛盾便尖锐化了。1936年，阿拉伯人举行总罢工，随后便发生了阿犹之间的流血冲突，紧张的气氛一直到二战爆发方告一段落。

冲突中，卡多里农校也遭到几次袭击，师生们被卷入到冲突的漩涡之中。由于年纪太小，拉宾最初只充当各犹太定居点的传令兵，后来才学习使用武器。教他们使用武器的教官叫伊加尔·阿隆，是农校的首届毕业生，由于他勇敢，在当地很有威信，犹太老百姓叫他“加利利之王”。拉宾很喜欢这位性情随和的大哥哥，阿隆也很喜欢这位听话的小弟弟，从此他们便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又共同走上了将军和政治家的旅途。

冲突中，学校停课。拉宾被分到一个“基布兹”去锻炼，白天干活，晚上担任警卫工作。后来还被英国当局吸收为“加菲尔”的犹太辅助警察，以保卫犹太定居点的安全。后来学校复课，他竟一时沉浸在“基布兹”的生活中和加菲尔的回忆中而无法安心学习。后来他强制自己静下心来，这才逐渐平稳地正常化。由于他为理想追求不懈，刻苦用功，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前茅，英国高级专员亲手给他颁发毕业证书，同时给他一笔7.5巴勒斯坦镑的奖金，让他去买农具。但是，他没有拿钱去买农具，而是用作组织经费了。所以，他后来还对英国客人说他欠着英国政府7.5巴勒斯坦镑。好事总是接着而来，英国政府给了他一个去伯克利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专业的奖学金名额，这将使他很快就会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水利工程师。诱人的前途在等着他，同学和老师也向他祝贺，但他自己却陷入苦思。不去吧，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去吧，那么建国大业谁来完成？他脑海里浮现出了父亲从俄国到美国，又从美

国向巴勒斯坦进发的身影，他仿佛又听到了妈妈对他的嘱咐，他似乎又看到叔叔阿姨伯伯们在他家争论着……他思考着，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他觉得：此时他不宜离开巴勒斯坦，他应该投入建国的事业。于是，他毅然放弃了这个绝好的机会。

他很快便走入社会，参加了当时犹太青年劳工运动在海法市附近一个“基布兹”里办的训练班，他自己想亲手创建一个新的“基布兹”，这样做符合他为建国出力的理想。但后来他没有把这个理想付诸实现，为了捍卫犹太家园，他毅然参加了伊休夫拥有的秘密武装组织“哈加纳”。这是一个以自卫和联防为主要任务的组织，之所以是秘密的，是因为当时伊休夫与英国打交道的是“犹太代办处”，它与英国人的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当英国人需要它维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时，就默许这支武装，暗中支持它，关系就好；当英国人觉得争取阿拉伯人更重要时，他们就会压制这支武装，双方的关系就紧张起来。而伊休夫却始终坚持一点，要尽量接纳和安置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谁限制和反对这样做，就和谁作坚决的斗争。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在北非连连得手。为此，“犹太代办处”决定从“哈加纳”组织中抽调一部分人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常备部队，这就是著名的“帕尔马契”，帕尔马契是希伯来语“突击连”的缩写读音。拉宾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支部队，原“哈加纳”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如伊扎克·萨德、雅柯夫·多里和摩西·达扬等均参加了这一武装。当时形势很危急，有消息说：法国维希政府已同意轴心国军队开进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大叙利亚”，战略要地巴勒斯坦直接受到威胁。英军采取果断行动，快速开进黎、叙，同时请犹太武装配合。勇敢的“帕尔马契”参加了配合行动，拉宾和20多个年轻人被召集在一块听多里的讲话。多里简要地讲叙了形势，他要求大家勇敢地战斗。拉宾为此兴奋不已，他以自己真正投入保卫家园的战斗感到高兴。

但开始他们只不过徒手巡逻边界，直到1941年6月7日，上面才交给他们多少带点风险的任务。具体任务是潜入黎巴嫩境内割断敌人的军用电话。夜深的时候，他们一路急行军来到了指定地点。在惨淡的月光下，电线杆如一个个幽灵般地排列在原野上，在微风的吹拂下呜咽着。拉宾年纪最小，但他挑大梁，爬杆割线的任务只能由他来完成的。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战斗，心儿怦怦直跳。黑暗中，他想象着不知有多少枪口在瞄准他们，要命的是他们只能光脚爬上电线杆去割线。他毫不犹豫，噌噌几下就爬了上去，掏出钳子“咔嚓”一声便剪断了电线。但不知怎地，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嘭的一声摔在了沙地上。他揉着摔痛了的屁股爬起来看了看才明白，原来那电线杆埋得很浅，完全靠线相互拉扯着才“站立”在那里，线一断杆子自然就倒了。贵在迅速，拉宾没有多想，接着又爬上第二根、第三根……每剪一根，都要“咕咚”一声摔一次，记不清一连摔了多少次。好在圆满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遭到枪击。尽管屁股摔痛了，但拉宾一瘸一拐地在返程中还是显得很高兴。同时，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害怕了。然而，战友达扬那晚上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与敌方交火中，他永远失去了左眼。无论怎样，“帕尔马契”的这次行动是值得骄傲的，但使人气愤的是，英国人在他们的战史上根本不提他们参加了这次战斗，好像是他们自己赶去凑了一场热闹。

当时“帕尔马契”共有六个连，达 2000 多人。但在二战期间却始终没有派上用场，因为隆美尔的德国兵怎么也没有打过来。这样，在伊休夫领导层内部就有一种看法：当初这支部队是准备用来与德国人拼命的，现在德国人来不了，再保留它就没有必要了。这样，既可讨好英国人，又可节省经费。但是，这种看法受到了那些来自“基布兹”运动领导人的坚决反对。最后，伊扎克·萨德提了个折衷方案，即把全脱产的“帕尔马契”变为半脱产的部队，把人马分到各“基布兹”去，一半时间习武，一半时间劳动。这样，帕尔马契随即“消失”了。一大批官兵离开了这支部队，他们在允许参加英军的情况下，都穿上英军服开往欧洲战场去了。这种离队现象在二战末期尤为严重，因为许多人得知亲友死于集中营时红了眼，拦也拦不住。但拉宾没有走，不是他怕死，而是他本能地预感到：战后的巴勒斯坦地区，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到那时，帕尔马契就是惟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因此，必须保持它的框架不要散掉。

有时候，伟人与一般人之间的区别往往就在乎一种预感。拉宾的这种预感，后来得以证明拉宾眼光的远大！

第三章 走上军旅生涯

1 初露锋芒

自参加帕尔马契以后，拉宾便正式走上了他 27 年的军旅生涯。

炮弹事件

1943 年，21 岁的拉宾已被任命为排长。有一天，上级安排他带他的排去给“哈加纳”的首长们做军事表演，因为他的排是力量最强的一个排。拉宾信心十足地把他的排带到演练场进行表演，观看表演的首长对表演很满意，拉宾自己也很高兴。

在他准备返回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发没打响的迫击炮弹。想到自己排里有门迫击炮却没有炮弹，他便趁管弹药的人没注意，偷偷地把炮弹用背包带回了海法市营地。他当时想得很简单：如果英军查出来，他就一个人承担责任。还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带着那发打不响的炮弹安全回到“家”。

他满以为自己的勇敢和机智是值得自豪的，但怎么也没想到，几天后连长怒气冲冲地找到他，横眉立目地说：“丢了一发炮弹，是不是你偷的。”拉宾承认了，结果遭到连长的一顿痛骂，还在军事法庭受审，被判一年之内不得提升。这样的判决是较轻的，因为军事法官是帕尔马契的司令伊扎克·萨德和另一个叫约瑟夫·阿维达尔的军官。而对一发炮弹的严肃性也是有原因的，它是当时帕尔马契的最后一发炮弹。

连接战役

1947 年 10 月，拉宾所在的一营接到上级的命令，去执行代号为“连接战役”的行动，把关在海法市以南的阿色里特集中营里大约 200 名犹太移民解救出来。在移民问题上，伊休夫与英国委托当局的矛盾已经很激化。英国当局开始动用武力阻止犹太移民涌向巴勒斯坦，将大批被截获的犹太移民送进了集中营。伊休夫领导层认为：这是不能允许的敌对行为，必须动用一切力量来保证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但这次行动的难度较大。第一，行动不能硬打强攻，因为移民中有不少老弱病残的人，在激烈的交火中将遭受伤亡；同时，伊休夫也不想与英国当局进行公开全面对抗。第二，集中营的主要守备力量是阿拉伯的辅助警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开枪的。为此，拉宾从营里挑出 200 名最优秀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另派一些伪装成教师的帕尔马契战士混入集中营接应。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绝对成功，拉宾和营长事先做了周密的部署。这是拉宾担任营训导主任后，参与指挥的第一次大的行动，他决心势在必成。行动的队伍，趁着夜色的掩护很快逼近了集中营。但集中营却被聚光灯照得如同白天一样，却又静得出奇，秋虫在微风中欢叫着，一幅宁静的意境。拉宾手一挥，队员们便疾速地扑了上去，剪断了电网，通过了第一道防护栅栏。在第二道防护栅栏处，事先派去伪装成教师的队员等在那里，他们已偷偷地敲断了阿拉伯卫兵的枪支撞针……正在交接

时，阿拉伯卫兵听到了动静，纷纷开枪，但只听到枪机响，却听不到枪声。这时，早有突击队员奔扑上去，用枪口逼住了阿拉伯卫兵的胸口。与此同时，拉宾带领的另一批人也已飞速奔向英军的营房，英军却依然在睡梦中。营长马上带人转移，拉宾带人掩护。行动紧张有序：在雪亮的灯光下，黑压压的人群悄声静息地转移着，秋虫为他们鸣奏行进曲！

拉宾率领后卫队撤离集中营时，是抄近路一路小跑赶到接运移民的卡车前的。这时，拉宾吃惊地发现：还有一半移民正在半道上慢慢移动。时间紧迫，已赶到的移民由营长快速拉走，剩下的移民由拉宾带人设法转移到附近的拜特·奥兰基布兹。这时，一个英国军士开车路过，他“砰”地向突击队员开了一枪，一名突击队员迅速地还了一枪，把这位军士打死在方向盘上。就是这两声枪响，引来了追赶的英军。

拉在后面的这群移民，应该说是一群难民，老弱病残、拖儿带女不说，每人还提着些大包，加上惊吓和折磨，已疲惫得不成样子。拉宾带人接应的时候，一直埋怨自己太粗心，心里一阵阵发酸。他命令所有的战士都要帮助移民们提东西带孩子，他自己则抱过一个孩子，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后面追赶的英军越追越紧，而前面的道路则越来越不好走，到处是裸露的石头，一脚踩上去稍不小心就会跌倒。沿途连一棵遮蔽的树也没有，移民中有些人实在无力再跑了，拉宾就下令战士们背着孩子拉着大人们往前跑。这时，一种强烈的犹太民族未来的责任感涌上心头，使他显得无比刚毅。

天亮后，拉宾他们带着移民终于到达目的地。这时，激怒了的英军也追了上来。拉宾指挥人们从缺口进入了基布兹，把大家疏散开并藏好了武器。这时英军的援军也赶来了，并不断地撞击基布兹的大门。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也从海法赶了来，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到了下午，不断赶来的犹太人挤满了四周，移民们趁机消失在人海中。

最后，英军只好悻悻地撤退了，他们始终没有敢开第一枪，“连接战役”就这样取得了胜利。拉宾和他的帕尔马契战士们，可以说是初露锋芒。一营的官兵们一个个喜气洋洋，士气高昂，纷纷要求下达新的任务。也就是这一系列活动，激怒了英国委任当局，他们决定给伊休夫和“哈加纳”一次沉重的打击，时间就定在犹太人安息日那一天。

2 黑色周末

不久，一营又接到了个袭击英国当局“机动警察部队”的新任务。这支部队自恃火力猛、机动性强，经常对“哈加纳”进行心毒手狠的打击，许多破获“哈加纳”军火库及逮捕持枪犹太人的事情均系它干的，帕尔马契司令部决定打击它的嚣张气焰。为了摸清敌情和充分做好准备，拉宾不知从哪弄来一辆摩托车。拉宾跟许多年轻人一样喜欢开快车，有一天，他在工厂区高速行驶，突然，一辆卡车从奈希尔水泥厂拐了出来，刹车已来不及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拉宾就失去了知觉。

当拉宾醒来时，自己已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左腿已被石膏夹板固定，他的左膝盖骨被严重撞伤。营长及战友们均赶来医院看他，劝他安心养伤，但怎么也解除不了他心中的懊恼。因为行动马上就要开始，而自己却只能躺在床上养伤。三个星期后，人们把他从医院送回了家，他

只能关注着行动的进展而咒骂自己的命运。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1946年6月29日是周末，正是犹太教的安息日。犹太教要求它的所有教民，一定要在这一天保持肃穆安静，就连公共汽车也要停驶，时间从星期五的日落直到星期六的日落。拉宾也和大家一样，呆在家中默默祈祷。但上帝并没有给他赐予保佑，就在这一天，拉宾被捕了。

这一天的夜里，拉宾被一阵马达声和嘈杂声惊醒，接着就是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拉宾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父亲鲁比佐夫开了门。闯进来的是一群英国伞兵，他们在弄清了拉宾的身份后，就不由分说地粗暴地把他从床上拉下来，押上了一辆大卡车，同时还一块带走了他父亲和一名在他家过夜的客人。他们一块被关押在一所被暂时充作拘留所的学校里。被捕的人不断送来，就连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负责人摩西·夏里特也被抓来了。因此拉宾明白：英国人不是针对个别暴露了的帕尔马契，而是针对伊休夫的行动。整个镇压行动规模空前，英军共出动了10万人，还有2000名警察，他们从几十个“基布兹”和犹太代办处搜查，逮捕了绝大多数领导人在内的约3000名犹太人。当时只有两个领导人没有被捕，一个是在国外的本·古里安，另一个是不便抓的梅厄夫人。在以色列建国史上，这一天被称为“黑色周末”。

拉宾他们很快从拉特隆转移到了加沙地区的拉特鲁恩集中营。他父亲鲁比佐夫被带走时没戴上假牙，在集中营里吃东西都困难。而那位客人则更倒霉，整整关了近两个月。

在遭到沉重打击后的伊休夫，很快便缓过劲来。犹太代办处严厉地谴责当局的敌对行动，并告诉英国人，他的官员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有事可以到那里与他们谈。这一着使得当局很被动，因为犹太代办处是国联认可的机构。与此同时，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也组织起来，与外面取得了联系。犹太代办处指派哈依姆·舍巴来照看囚犯，他仔细地检查了拉宾的腿伤并设法让他住进了集中营医院。但英国情报部门就是不释放他，他们知道拉宾是干什么的，每次拉宾到X光室透视时，窗外都设双岗加以防范。由于治疗条件及营养条件较差，拉宾的腿伤好得极慢，直到七月底才拆掉石膏。他看到已变得有些畸形和僵硬的腿，十分伤心。他一方面拼命锻炼以恢复功能；另一方面又找了些专业书复习，准备重新务农。因为，也许腿伤容不得他再从事军旅生涯。他的心情很难平静，当他听到“帕尔马契”准备用武力营救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更是担心，因为那将会造成巨大的伤亡。好在这消息仅是传闻，而英国当局在11月份却突然释放了他们。

出狱后，拉宾的行动还是不方便，郁闷中他又萌发了去伯克利深造的念头，但遭到好友阿隆的坚决反对：“这决不行！世界大战结束了，可我们自己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拉宾明白阿隆是对的，于是打消了读书的念头。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帕尔马契第二营营长，年仅24岁。当时为了应付英军的突击检查，拉宾身上常带着两个假身份证，一个名叫罗森伯格，一个名叫罗林堡。

到1947年初，伊休夫加快了建立犹太国的步伐，阿、犹冲突愈演愈烈，对此颇感棘手的英国政府遂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讨论解决。一场大决战已不可避免，身为“犹太建国协会执行机构”主席的本·古

里安接管犹太代办处，出任防务委员一职，以加强军事领导。上任以后，他立即召开了营以上的“哈加纳”军官会议，他在会上明确要求大家要为即将到来的恶战做好准备，因为犹太民族已经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决战前夕。

拉宾以前的预想也从而得以证明。

3 战争在建国前开始

形势的变化，迫使英国政府撇开美国，于1946年9月10日邀请阿拉伯双方代表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主要当事者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和犹太复国协会都拒绝参加。阿拉伯国家代表在会上提出，应在1948年底废除英国的委任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然而，英国却另有打算，它想通过同阿拉伯国家订立新条约来继续保持自己的殖民统治。

针对这种情况，10月4日，杜鲁门发表关于巴勒斯坦局势的声明，公开支持犹太复国协会的分治计划，随时准备帮助10万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英国看到巴勒斯坦问题无法解决，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在美国的支持怂恿下，肆无忌惮地开展活动，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47年2月，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英国以为联合国讨论的结果，要么同意延长英国委任统治期限；要么达成协议，交英国处理。4月28日到5月15日，联合国根据英国要求召开专题特别讨论会。会议期间，美国国务院动用了全部力量，不择手段地拉选票，特别是拉美20多个成员国。11月29日，美国预计已稳操胜券，就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迫不及待地开动联大表决机器。结果，美苏等33票赞成，阿拉伯国家等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分治方案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者终于使自己建立国家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

随着美国在犹太复国运动中地位的提高，复国组织的领导人也进行了调整，亲美的本·古里安取代了亲英的魏茨曼。

一天，阿隆从一个情况汇报会回来，他兴冲冲地告诉拉宾，本·古里安问犹太武装是否能抵挡住阿拉伯正规军的进攻，他回答是有可能，但要大大补充人员和装备。拉宾听了默不作声，他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本·古里安关心军队的时间太晚了，为什么不早一些呢？1947年4月，本·古里安在一次防务会上列举了“哈加纳”拥有武器的数量：10073支步枪，1900支半自动步枪，186挺重机枪，444挺轻机枪，672门两英寸口径迫击炮，96门三英寸口径迫击炮……飞机、大炮、坦克和装甲车均没有。从部队规模来说，当时组建的“野战军”约有1.2万人，实际上是“哈加纳”的扩编，而其中真正能作战的就只有“帕尔马契”的几千人。用这样一支武装去对付数以万计的阿拉伯正规军，这无异一个天方夜谭的玩笑。

对于本·古里安，拉宾的看法是双重性的。他很敬佩古里安的政治远见和那种为犹太民族的献身精神，古里安远见的政治才能使他往往与大多数领导层人物的意见不一样，但事实却证明了古里安的正确性。因此，他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但拉宾对他对于武装建设的轻描淡写和对于帕尔马契的一些做法是很不满的。

拉宾认为：古里安对决战前夕犹太武装的弱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是 1936 年至 1946 年这 10 年间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二是犹太代办处号召犹太人去参加英国军队，差一点使帕尔马契散了架。而古里安对帕尔马契的态度，是拉宾极为愤慨的。“帕尔马契”是“哈加纳”的精华，古里安应极力爱护，但事实相反，他对这支武装采取极力排斥和压制的态度，因为这支武装的官兵大多来自与他政见相反的“巴勒斯坦统一工人党”。他曾对它进行“外科手术”，采取重用从英军回来的犹太军官和排挤原帕尔马契指挥官等办法，使帕尔马契的规模一直难以扩大。对此，拉宾认为古里安表现得极为短视和狭隘，导致了当前的被动局面。

1947 年 10 月，联大就巴勒斯坦分治问题表决并通过决议。这时，25 岁的拉宾被提升为帕尔马契的副司令兼作战部长。拉宾在特拉维夫参加欢庆，看着欢呼雀跃的人群，拉宾心中掠过一阵阴影，他确信犹太人取得的只是外交上的胜利，阿拉伯人不会对犹太人的建国梦坐视不管的，犹太人急需的是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捍卫它的成果，可是这支军队在哪里呢？拉宾为此忧虑不已。随后，一场以巴之间的战争便拉开了。许多著作说，以色列的“独立战争”是 1948 年 5 月 15 日打响的，说是在这个国家成立几小时之后五个阿拉伯国家便对它发动了全面进攻。其实不然，拉宾认为，战争早在建国前的 6 个月便开始了。

也就是在 1947 年 11 月底联大通过了分治决议之后，随即阿拉伯武装人员便开始了围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场阿以战争便开始了。当时的情况很危急，60 万犹太人中有 10 万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丢掉这座圣城，无疑对犹太人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耶市 10 万犹太人中大都在新城，老城只有 25000 人左右，阿拉伯人选取弱点，想先攻下老城，进而占领全城。

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方又没有其他优越的因素，仗是很难打的。更何况联大决议规定了耶市的国际飞地特性，犹太人急于立国首先接受了决议，阿拉伯人不接受决议；这样，犹太人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阿拉伯却可以先声夺人。第二，亲阿仇犹的英军根据决议可以拖到 1948 年 5 月 14 日才撤走，也成为犹太人的障碍。第三，犹太人所处的位置是阿拉伯人大海中的孤岛，阿拉伯人占有围点打援的战术优势。10 万犹太人所需的一切物品，全靠长约 70 公里的特耶公路运输，这条“生命线”一旦被卡断，犹太人就陷入了绝境。而在 1947 年 11 月，这条“生命线”就被阿拉伯人切断了，要重新打通它，真是比登天还难。然而，又非打通不可。“哈加纳”司令部把这一艰难的任务交给了拉宾去完成，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4 打通生命线

耶路撒冷在 500 年的历史中，总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征战和厮杀；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像它一样吸引着众多的信徒来维系着民族的命运，也没有一个城市像它一样遭受那样多的劫难和痛苦，更没有一个城市像它一样引起那么多国家和人们的关注；它是世界上在联合国和各种报刊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城市。历史演绎到今天，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

兰教的信徒们依然为它在进行着你争我夺的斗争。

当以色列独立战争的序幕一拉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便围绕着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这条“生命线”展开了生死战斗。公路要从两个山谷间通过，对于犹太人来说无疑增加难度，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无疑又是极好守卫的天然屏障。拉特隆是阿雅隆峡谷的中心，汽车到此，只能绕着山坡蜿蜒而行。早在中世纪时，十字军就在这里设据点；在委任统治期间，英国人也在此建起台戈特警备站。第二个险要处就是阿雅隆山谷的“门户”，车辆到此只能擦着山涯行驶，这无疑帮了阿拉伯人的大忙。

拉宾接到任务命令后，他首先考虑保护好司机的安全，他命令所有车辆驾驶室两侧都焊上钢板。这样，司机的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但押车的战士却变得绝望了。拉宾面对这样的现实，只好亲自参加行动，用以提高士气；另外又找来一些钢板，焊制土造的“装甲汽车”。这样运行了一段，阿拉伯又制造了穿甲弹，伤亡一天天增加，随着阿方伏击水平的提高，整个运输几乎中断。

面对严峻的现实，哈加纳司令部十分焦急，只好发起“纳契松”行动。行动在4月5日开始，拉宾指挥着自己的部队，配合着“哈加纳”派来的援军，向阿拉伯人展开了强大的攻势，阿拉伯人只好退守山谷的两侧，犹太人趁机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使问题得到了缓解。但当援军一撤走，退缩的阿拉伯人又杀了出来，并且向犹太人的据点发动了强大的反攻，“哈加纳”部队陷入了险境，一个叫斯科普斯山地的哈达萨医院遭到洗劫，77名犹太人被杀。古里安十分焦急，他命令萨德率部增援拉宾，想在4月19日搞一次大规模的运输行动。拉宾怕阿拉伯人先有准备，建议推迟一天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恰在此时，拉宾又接到了带兵随古里安前往耶路撒冷的命令，想在英国人撤出之前抢占地盘。拉宾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但遭到上司粗暴的拒绝，他只好在20日凌晨和萨德一道带部队随古里安去耶路撒冷。

拉宾始终担心阿拉伯人的伏击，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开始，四周安静得死一般地可怕。就在部队过去了一部分以后，阿拉伯人精心策划的伏击开始了，漫山遍野涌出了阿拉伯军人。战斗十分激烈，炮火异常凶猛，许多车辆被击中，整个车队无法前进。好在城内的居民听说古里安赶来的消息，冲出城门赶来迎接。战斗很快开展到耶路撒冷城下，古里安命令萨德和拉宾向城北和城南的阿军发起进攻。这场代号叫“杰布西行动”的战斗尽管激烈，但还是被哈加纳的战士们占领了大半个城。但是，毫无撤走之意的英军，26日又把他们赶回了原地。争夺战陷入了僵局，生命线被切断了，部队也陷入了危机。

恰在这时，司令部发来了电报，要他速回特拉维夫，商议战事。拉宾坐一架旧的轻型飞机回到了特拉维夫，作战部长雅丁在询问了情况以后，仍然要求拉宾努力去打通生命线。拉宾率领部队苦战一个星期，肃清了沿途除拉特隆以外的敌人，但拉特隆的敌人却十分顽强。拉宾旅伤亡惨重，有些连队成了空架子。拉宾看着补充来的一些士兵，大多只有十五六岁，脸色惨白，但他只能咒骂那些忽视军队建设的人。

1948年5月14日 根据联合国决议 英国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犹太复国主义全国委员会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宣布成立以色列国。

世界上无奇不有，以色列是惟一根据联合国决议成立的国家。历史

上流散多于独立的犹太人，从此有了自己统一的民族特征。

5 血战拉特隆

1948年5月14日，英军一撤走，以军未放一枪就占领了市中心地区，随后又攻占了城外北部和西部地区，但东部的很大一块仍在阿拉伯人手中。15日阿军发动攻势，从以军手中夺回了城北阵地。17日，整个战局发生逆转，约旦军队攻入市区并直抵老城。城中犹太人又陷入危机，拉宾旅只得又担任掩护运输队的任务。拉宾为确保交通无阻，他带兵夺取了拉特隆和雅鲁村，并彻底肃清了公路交通障碍。他们等着护送运输队入城，结果，等了一天才等来“孤儿”似的一辆装甲侦察车，特拉维夫方面不相信他们能这么快打通道路。

17日，正当拉宾部署当天的护送任务，耶路撒冷旅旅长大卫·沙梯尔来找他，请求借两连人去攻城。拉宾看不起沙梯尔，提出得派两名手下军官共同制定作战计划。沙梯尔只得同意。在整个战斗中，沙梯尔把拉宾的两连人当主力使，整个作战计划也一团糟，拉宾为此与沙梯尔大吵，之后，才勉强同意了计划。

在沙梯尔的攻城计划战斗打响以后，进展缓慢，沙梯尔的兵连城边都没挨就退了回来；只有拉宾的两连人奋战夺取了安锡山，但随后就陷入了重围。在组织突围后，山上依然有15人没有冲出来，他们只有和敌人血战到底了。突围出来的战士，为了整个战场利益，没有休息就投入了战斗。整个战场，战斗十分激烈。阿拉伯军队越来越多，犹太军队却无法提供后补，且都老弱病残。27日夜，拉宾又组织了3次突入老城的战斗，均告失败。28日凌晨，拉宾登上了锡安山，在纷飞的炮火中他看到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屈辱场面：一个打着白旗的老城犹太代表团向着趾高气扬的约旦士兵走去，其中竟有犹太教士拉比。28日夜，老城区又有150名武装人员和700名居民投降。战场的失利，犹太人投降是难免的了。但在整个耶路撒冷战役期间，拉宾多次组织力量进攻拉特隆，但这颗钉子始终拔不下来，阿拉伯人决心死守。当6月8日的又一次进攻失败以后，古里安失望极了，他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要在6月9日要攻下拉特隆。可这一次大家没有听他的，阿隆和拉宾等人一致决定推迟到次日，因为部队急需休整，同时发现了一条可绕过拉特隆的便道。

那条便道实际是拉宾他们休整那一天发现的。那辆装甲侦察车就是从便道上过来的。后来，拉宾旅的一些人就是走这条便道。走这便道安全，阿拉伯人的火力打不到，关键是能否开辟成大卡车通道。延误军令是不行的，阿隆便和名义上指挥这条战线的美国人米奇·马可斯上校派拉宾去说明情况。古里安对此大为反感，甚至可以说气急败坏。他训拉宾、训阿隆，整整训了两小时。拉宾在古里安的训斥中不时地解释几句，他始终坚持一个观点：既然另有通道能确保运输生命线，就没有必要再血洒拉特隆！两小时以后，古里安终于同意了他们的方案。

6月11日下午10点，第一次停火协议生效。但待重开战时，阿以双方的力量就已倒了过来，这是犹太人用智慧创造奇迹的历史纪录。停火期间，拉宾组织力量开辟了另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缅甸路”，基本上解决了市内的补给供应问题。另外，大批的军火和志愿人员补充上来，

使以军实力大增。值得说一下的是，以军的军火主要是捷克在苏联的默许下提供的，“如果没有捷克按照苏联旨意提供武器，以色列能否打赢这场独立战争是值得怀疑的。”7月9日，战火又重新开始，但持续时间不长，仅仅10天。原因是各自为战的阿拉伯军队再也不敌以色列军队。但是，耶路撒冷老城仍在阿拉伯军队控制下。为了便于指挥战斗，以军将全国分为北方、耶路撒冷、沙隆和南方四大军区。拉宾和“帕尔马契”主力均划归在南方军区，伊加尔·阿隆为司令员。

第四章 战火中度过蜜月

1 喜结良缘

在独立战争自停火以后再燃战火以来，以军节节取胜，拉宾掩饰不住地高兴。但战友们另有发现：拉宾高兴还另有原因。不管战事如何繁忙，尽管事情千头万绪，拉宾总是不忘刮胡子，遇事总是乐滋滋的，原因是一个叫利扬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为他战火中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

对拉宾来说，1948年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之所以重要，一是自己的祖国在战斗的洗礼中诞生了，这是父母，还有自己为之奋斗的目的；二是这一年的夏天，他终于完成了持续4年的罗曼恋爱史，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开始了两人世界的崭新生活。

拉宾和利扬的结合完全是一种缘分。1944年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公共场合，两人偶然相遇。世界上一见钟情的事是有的，他们只是相互间那么淡淡的一瞥，就注定了他们一生将相依相伴。婚礼在特拉维夫拉宾的家中举行。为了这一天，拉宾和利扬做了许多充分的准备，家庭的装饰和摆设自不用说。作为新郎和新娘，他们也打扮得格外漂亮。拉宾的父亲想起自己早逝的妻子，他特地为两个年轻人祈祷。

双方的亲朋好友挤满了一屋，他们为新郎新娘出了不少的鬼点子，使婚礼显得十分热闹。此后，在4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拉宾夫妇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们都相依为命，紧紧地用彼此的身体，去抵御各种无情的打击。他们饱经了战火的考验，在同甘共苦的人生历程上，算得上是一对患难夫妻。

就在拉宾沉醉在新婚的甜蜜之中时，以色列政治家们却在划着政治圈子。一些难以说清的原因，使拉宾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以祖国为重，他只能做一个忠于祖国的军人，他只能走在政治圈子之外。

9月14日，古里安召集了10多位帕尔马契高级军官会谈。他高度评价了帕尔马契在建立和保卫国家方面所做的贡献，赞扬了帕尔马契的宝贵经验和勇猛作风，但他却宣布了撤销帕尔马契司令部，把所属交给地方军区和直属总参指挥的命令。拉宾和他的战友为此矛盾而苦闷。从大道理上说，古里安是对的。但从感情上说他对这一决定有反感。对于这支部队，它本来就属于哈加纳，又分散在各地作战，再保留司令部已没有必要；但他从士兵到旅长，和帕尔马契相依为命，感情很深。古里安不是军人，但他作为第一任总理来说，他有自己的政治远见和驾驭军队的的能力。他认为当时的军队不能胜任当前和今后的战斗任务。首先是他的手头的军队成分太复杂。其中既有听命于政府的哈加纳，也有不同政见组织的“伊尔贡”和“莱希”。伊尔贡的全名叫“伊尔贡·萨瓦韦·柳米”，意为“民族军事组织”。莱希又称“斯特恩帮”，意为“为以色列自由而战斗组织”。它们的头头中有后来当了总理的贝京和沙米尔。这两个组织主张对阿拉伯人和英国人采取强硬有力的措施，建国前的一系列恐怖活动主要是它们搞的。另外就是政治色彩很浓的哈加纳。这个组织分两部分，一是固守犹太定居点的防卫部队，还有就是机动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帕尔马契。帕尔马契约6000余人，3个旅的编制，其成员

大部分是工人党中分裂出去的“巴勒斯坦统一工人党”的成员，社会主义思想较浓。同时，古里安对帕尔马契敢于顶撞他的高级指挥官耿耿于怀，他的理想是建立一支绝对听命于文官政府的、不干预政治的职业军队。

作为政治家，古里安同样容不得异己。尽管伊尔贡和莱希在建国后都曾声明效忠国家，但古里安还是采取了兼并手段。6月22日，贝京率领伊尔贡人员准备强使一艘装载军火和志愿人员的“阿尔塔勒纳”号轮船靠岸。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古里安立即组织哈加纳和莱希部队包围，以处理叛军的形式把伊尔贡兼并入哈加纳。之后，莱希便成为下一个目标。9月17日，莱希组织刺杀了联合国调解人员福克·伯纳多特，这样，给古里安授以话柄，他以恐怖组织的名义给莱希以镇压。但在他转过身来对付哈加纳和帕尔马契时，他采取了如下的办法：首先以撤换哈加纳总司令及胁迫其辞职的手段解除了哈加纳高级将领的实权，然后在1948年10月底下令解散了帕尔马契的独立机构和特别参谋部，并在停战后迫使大批帕尔马契高级指挥官退出军队。古里安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坚持新建的军队叫国防军；他在改组兼并其他力量时，他吸收了别人的长处，他没有把孩子连同脏水一块泼出去。大批的骨干力量及顺眼的年轻军官被留了下来，诸如达扬、拉宾、马列夫、伊拉扎、古尔等人，他们还先后担任了军区司令、总参谋长或更高的职务。拉宾之所以被重用，除了他对军队的贡献外，还在于他当时效忠于国家的思想和走在政治圈子之外的路线。

在铲除了山头和清除了军队中的政治色彩之后，古里安开始了对国防军的整编。他以1944年建立的犹太旅的正规化建制为基本框架，吸收帕尔马契的勇猛作风和优良传统，全面改造和更新哈加纳部队。扫除了非正规的游击作风，采取了英军的军衔制度和惩罚制度，树立了令行禁止的上下级指挥权威，使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大大加强。同时，吸收大批年轻军官，大力倡导指挥员要率部队冲锋和决不丢下一个伤病员的优良传统。

拉宾沉醉在新婚的甜美中，首先遭受到的感情打击就是这一次部队的大整编。虽然他没有政治野心，但自己终究与帕尔马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因此，他很是苦恼。为了驱赶心中的不快，拉宾从蜜月的氛围中和部队整编的苦恼中跳出来，全神贯注于制定再次打击埃军的计划。

2 战火中度过蜜月

拉宾和利扬的新婚蜜月，是伴随着战火度过的。两次停火以来，以色列得了不少好处，美国和欧洲资本家们，除了给以色列大量军援外，还积极发动国内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到1948年10月初，以色列陆军强大了，海空军和炮兵也有了大发展。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以色列人悍然破坏第二次停火协议，于10月15日，向内格夫等地发动进攻。第二次进攻主要由两次作战组成：一是进攻埃及，一是对北加利利的进攻。两次进攻的时间均定在10月份进行。为了集中使用兵力，以军在第二次进攻中编成了由三四个旅组成的支队，地面部队协同空军作战。10

月 22 日，以军以迅速猛烈的进攻，占领了海岸地带的贝特·哈南，同时切断了埃军的后补线，埃军只得依靠海上运输坚持战斗。新组建的以色列海军敢于同埃及海军进行较量，并且击伤 3 艘小型船只。贝特·哈南以北的埃军丧失了战斗意志，阿什杜德遂于 10 月 27 日被以军占领。阿隆上校指挥的这次行动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掌握了制空权和机械化包围作战；而埃军防御作战呆板，反冲击部队乏力，步兵进攻则无火力支援，同时通讯不畅影响了有效指挥。而以军作战计划周密，机械化程度高，确保了成功。

整个行动代号为“约阿夫行动”，伊加·阿隆负责指挥，战役目标是把内格夫的埃军分割歼灭。但行动计划没有理由，埃及人不想打仗，以色列人只好寻找理由了。以色列军方只好根据二次停火协议规定以军车队可以穿越埃军防区向内格夫犹太人据点运送给养，但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但现在以色列人利用了这一规定，派几辆空车去试试，埃及人一开枪，借口就找到了。

10 月 15 日，以色列人按计划进行。就在车队即将通过埃军防区的时候，一名埃军士兵提着裤子出来撒尿，他发现隆隆开来的车队，揉了揉眼睛，呼叫着朝天放了两枪。这就足了，以色列人立即派飞机轰炸，步兵随即发动了进攻。经过七天激战，以军打通了内格夫地区至特拉维夫市的通道，夺取了重镇比尔谢巴。埃军则不妙，阿什克隆—阿士杜德滨海地区的埃军面临切断后路的危险，赶去增援的埃军也被以军引入到一个精心布伏的“法鲁加口袋”之中，直到 1949 年 2 月埃、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为止。而阿什克隆—阿士杜德的埃军，出于无奈，只好撤到受联合国保护的加沙地带。12 月 22 日，拉宾又指挥了“霍雷夫行动”战役，把留在内格夫和加沙的埃军都赶了出去，使以军占有了绝对优势的战略地位。但拉宾却不想就此止步，他打算乘胜拿下埃及西奈地区的交通枢纽阿布奥格拉，并攻占沿海重镇阿里什。因此，拉宾向代总参谋长伊加尔·雅丁汇报时，为获批准，他隐瞒了夺取阿里什的意图。雅丁批准了他攻占阿布奥格拉的计划。

拉宾带着利扬坐吉普车沿公路向南方疾驶，看到沿途匆忙调动的以军，拉宾心情非常激动，看看身边的利扬，他乐滋滋地笑了。整个蜜月，他们便在战火中度过了，拉宾屡建战功！

第五章 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

1 最后一战

1948年12月27日傍晚，拉宾指挥的“霍雷夫行动”发动了全面进攻，按行动计划推进战斗进程。当部队开进到距阿布奥格拉7英里处时，遭到埃军最顽强的抵抗，打了大半夜。待第二天黎明时，才发现守军已连夜逃遁了，以军没费什么劲便占领了它。

“霍雷夫行动”战役实际上是以阿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打的最后一仗。当时，以色列刚刚建国，就在战争中经受着一次次的考验。

有两个有趣的小插曲是值得说的。一月的阿拉伯世界，是黄沙纷飞的世界。肆虐的黄沙随时刮起，遮天蔽日，给行军打仗的军队带来极大的困难，特别是空军。偶然的识别不清，误伤友军的事是难以避免的。1949年1月6日，五架英军侦察机被以色列的“马哈尔”误当埃及战斗机加以攻击。英军飞机只是侦察，枪炮里没装弹药，以色列空军一遍又一遍地追赶着追击着，一口气把他们全打下来。使人哭笑不得。五位英军皇家飞行员，被不知道如何行军礼的犹太乡巴佬的行为气疯了。

另一次是拉宾指挥全旅逼近阿布奥格拉时，正准备拿下这块西奈地区的交通枢纽。这时，犹太空军“马哈尔”驾驶的以军飞机从空中直向拉宾他们扑来，任何摇旗示意的行为均不管用，直到炸毁了几辆吉普车之后才哼哼着飞走。部队接近阿里什以东机场时，遭到埃及飞机的轰炸，但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正当战士们爬起拍打着灰尘时，“马哈尔”们又一次飞来了，战士们怒不可遏，操起各种武器就向自己的飞机扫起来。有一位战士向阻止他的拉宾高声说：“敌人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

拉宾被这话触动很大，而且深有感受。他也觉得自己的命运时刻掌握在别人手里！

正当他准备拿下阿里什时，拉宾即接到总参访问的电文：“我们的飞机报告你们正向阿里什前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立即停止前进！”拉宾只得请求总参再给他一夜时间拿下另一个机场，但遭到断然拒绝。最后他求阿隆出马，仍然使拉宾失望，回答是“不得前进，从阿里什撤出！”其实，古里安并非不想占领阿里什，很明显，占领了它就等于把加沙和腊法拿下了。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要冷静，他得考虑国际反应，因为英国政府已提出要以色列从埃及领土上撤出的最后通牒。

2 脱下军装去谈判

1949年1月3日，拉宾的部队撤出西奈后，夺得城南可以俯瞰铁路和公路的制高点，使加沙埃军处于被动。1月6日，埃及政府被迫宣布，同意与以色列进行停战谈判。1月12日，埃以停战谈判在希腊的罗得岛进行。

作战部长伊加尔·雅丁要求南方战线派一名熟悉情况的代表参加谈判。司令官阿隆推荐拉宾。虽然拉宾对参加谈判充满信心，但毕竟是第一次；而多年的军人作风，使他不适应西装革履的装扮。但在战友们的

关心下，他还是脱下了军装，第一次走上了谈判桌。

听惯了枪炮声，拉宾很有点不习惯于罗得岛的和平、安宁气氛。上岛以后，他向服务生学会的第一个希腊语单词“多”的读法是“恩考瑞”。晚餐时，他眨眼间便吞下了一盘牛排，他只好指着空盘子说：“恩考瑞”。这样，他就又得到一盘肥牛排。他一连说了三次“恩考瑞”，最后在几位侍者惊异的目光下打着饱嗝离开了餐厅。

2月24日，以、埃签订了停战协定，直到7月20日，持续了15个月的独立战争（历史上又叫第一次中东战争）才宣告结束。这次和谈，埃、以只是英美的傀儡。实际上，是英美新老殖民主义相互勾结，相互妥协的结果。最后达成交易：把巴勒斯坦分为两部分，英国承认以色列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承认约旦河西岸属英国的势力范围。1949年1月29日，英国承认以色列的事实，美国也在三天后宣布了对约旦法律上的承认。以色列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它新的一页。

和平终于拥抱了人们的生活。这时，拉宾和许多战友一样，面临着多种选择。但他反复思考后，还是选择了留在军中。他相信：祖国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自己可以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贡献自己的青春！

3 旧怨难释

战后军队缩编，古里安一切按自己建立效忠于国家的职业军队目标发展。他先后取消了独立的“帕尔马契”司令部，指定“帕尔马契”为首批复员部队，下令解散了它的三个旅。古里安旧怨难释的心态表现无遗。“帕尔马契”4名司令官中的2名和12名旅级干部中的6名相继离开了部队，他们以集体辞职的方式表示抗议。但这正中古里安下怀，他迅速提拔那些从英军中召来的犹太军官，顶替他们的空缺。而原“帕尔马契”的现任总参谋长多里，竟是卖力执行古里安旨意的干将。拉宾在哈雷尔的旅被解散后，给多里去过一信表示不满。想不到多里竟气急败坏地说“不管怎么说，你是不能再当旅长了，我们已把你定为送到国外学习的第一候选人”。拉宾对自己的军队恋恋不舍。南方军区司令伊加尔·阿隆知道后，很不高兴，他知道这种砍他胳膊的事是冲着他来的。恰好他要去法国访问，便以指定拉宾代理他的职务的方式把他暂时留了下来。

但是，阿隆不可能在法国不回来，这样代理也不是长久之计。拉宾再一次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命运还掌握在别人手里！

4 心胸坦荡的拉斯科夫

就在拉宾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总参训练部长钱依姆·拉斯科夫出面拉了拉宾一把。

拉斯科夫是古里安重用的那批英国犹太军官中的一个，早先他也是反“帕尔马契”的急先锋，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他觉得对这批英勇善战的“乡巴佬”军官下手无聊得很。他见拉宾被压得抬不起头的样子，便主动邀请拉宾负责他主办的营长训练班的工作。更使拉宾难以置信的是，拉斯科夫竟然大胆地说：“叫所有帕尔马契军官都参加训练班。我

保证他们中所有想留在军中的人都可以进这个班，当教官或当学员均可以。”拉宾对拉斯科夫将信将疑，但事实证明他确是一个心胸坦荡的君子。

拉宾原想等阿隆回来后再走，没想到古里安连他最起码的奢望都不让实现。趁阿隆在法国访问，古里安提升原作战部长雅丁为总参谋长，任命达扬为南方军区司令。这样一来，阿隆除了递交辞呈外，别无选择。阿隆战功卓著，威信很高，又是帕尔马契首领。南方军区帕尔马契官兵特多，因此，选择这样的机会夺他的兵权是最佳时机。当达扬兴高采烈上任时，军区司令部里的气氛冷漠得怕人。拉宾对阿隆有着深厚的情谊，他连仪式也没举行便把指挥权移交给了达扬。达扬是一位资历和战功比在场任何人都高的人，他感受到了不友好。但他毫不怯阵，他大大咧咧地当场宣布，凡是不愿在他手下干的人都可以走，他决不挽留。他又转向拉宾，以杀鸡给猴看的方式，以解雇的语气说：“多谢了，但这里不再需要你了！”

拉宾好比受了重重的一击。当天晚上，他便默默无言地离开了南方军区，投奔拉斯科夫去了！

5 “集会事件”

拉宾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为感谢拉斯科夫的好意，拉宾竭尽全力地干。他的组织才能引起许多高层人士的重视，他们中许多人都向古里安说了拉宾的好话。但拉宾清楚，古里安对他的印象不是几句话可以改变的。

事情就出在那次所谓“集会事件”上。当时拉宾还在南方军区任职，大批“帕尔马契”准备离开部队，战友们准备开一个送别集会。想不到总参谋长多里发布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不准现役军人参加集会。这惹恼了拉宾等人，他们认为太过分，决心即使受处分也要参加。

集会定在晚上，但那天一早拉宾就被多里叫到特拉维夫市汇报工作。接着又被古里安找去谈话。拉宾驱车赶到古里安家里，和他谈了以埃边防军交火的情况。古里安对他很热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后来，他们又把话题转到了对一些高级将领的评价方面。拉宾不想在这方面卷入太深，他想早点回去。于是，他直截了当地提问：“本·古里安，我能直率地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谈呢？”

拉宾不顾一切地问：“为什么总参谋长要在您知情或奉您指示的情况下禁止我们参加集会呢？”本·古里安在听了以后，脸上的神色马上严肃起来，但马上又恢复了常态，并留他共进晚餐，其用意是想拖住他。拉宾借口有事要办，便匆匆离去。

赶回家，他换上便服，带着利扬便往会场跑，赶到时，会已开始一段。集会上，一些人表明了不满情绪。几天后，军事法庭就传讯了他，主审官竟是多里，他像教训新兵一样教训拉宾，并宣布给拉宾个人记入档案的警告处分。这件事尽管过去了很久，但它实在让拉宾难忘。他将此事记在心里，随时以它为傲，告诉自己从中悟出人生的道理和为官的操行。

第六章 走向成功

1 出任作战部长

拉宾深知拉斯科夫对自己的恩情，他决心以出色的成绩报答这位伯乐。由于他的拼命工作，留下的是一片叫好声。1950年，总参决定开办旅长训练班，他又被认为是最合适的办学人选。但是，新任总参谋长雅丁看中了他，请他出任总参作战部长。尽管拉斯科夫舍不得让他走，他也不愿离开拉斯科夫，但军令难违，他只得走马上任。这一年，拉宾只有28岁。

以军总参，统管着部队的组织、训练和作战指挥大权。总参谋长，是军内的最高职位。总参谋长在防务决策上受文职的国防部长领导，但实际上他的意见最重要，他经常出席内阁会议，反映军方的各种看法。作战部是以军总参中最重要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作战、保安和后备役方面的工作。在以军中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作战部长是总参谋长职位的首要候选人之一。这次对拉宾的任命，是古里安批准的，令拉宾感到意外。但实际上，古里安很清楚拉宾的价值，是拉宾坚决执行了他进攻北京的“伊尔贡”部队的命令；尽管拉宾对“帕尔马契”的处理有意见，但他没有随大流闹事。何况，拉宾算得上是一个听话而又能干事的人。

随后一桩事的处理，又让拉宾辉煌了一次，使古里安对他刮目相看。当时，穆斯林国家的大批犹太移民向以色列涌来。与欧美移民不同的是，这些人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但都幻想着一夜之间就过上富足的生活，稍不如意就怨气冲天。在经济困难、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把这项安顿工作交给军队，雅丁又把它交给拉宾。拉宾的任务是“改善移民居转运营的各方面条件，向移民提供教育、医疗和生活上的服务；使他们能学到谋生的一技之长；把10万移民安顿好，不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困难是较大的，尤其是使移民掌握一技之长，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等，不是说到就可以做到的事。恰在这时，又出现了罕见的暴雨和大风雪，难以数计的帐篷刮倒了。拉宾及时命令军队迅速抢救，官兵们在风雪中重新树起帐篷，脱下衣服给移民们穿上……这一切，使移民感到了依靠的力量，人们奋斗的意识复苏了。在以色列建国史上，1950年末和1951年初的这场没有枪炮声的战斗被称为“转运营之战”，古里安称官兵们为“民族的使者”。

拉宾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头头们的好感，而且为军队赢得了声誉。拉宾被一致推荐送往英国坎伯雷皇家参谋学院进修一年。他带着妻子利扬和女儿达莉亚在那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2 回国以后

对于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当了两年作战部长的拉宾来说，进修算是难得的，理论上的收获是很大的。但转眼一年就过去，拉宾得考虑回国以后的事情。

在他进修期间，总参谋长换成了莫得恰·马克莱夫，作战部长是达扬。他们俩的关系很僵，马克莱夫希望拉宾早点回去取代达扬的职务。

但不久，古里安即任命达扬为新的总参谋长，想起达扬过去对自己的态度，拉宾心里直发怵。在一次达扬出访路过伦敦时，拉宾特意拜访了他。达扬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派头，在谈到拉宾进修后的去向时，拉宾说：“学完以后回以色列。”达扬回答得很干脆，没有恶意，但脸上有了笑容：“那你就回去好了。”

回国以后，达扬让他出任训练部长，为此，拉宾大为感动。在他的任期内，拉宾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亲自编教材，把以军的第二次大整编工作做得很完美，达扬很满意，以致到美国考察时也把拉宾带去见见世面。由于许多训兵、用兵、带兵的观点一致，他们的感情距离越来越近，拉宾钦佩达扬各方面的能力。

1956年4月，即拉宾的二儿子出生后不久，达扬即任命34岁的拉宾为北方军司令，军衔晋升为少将。从多年的参谋工作，到执掌一方重兵的大军区司令，他深为感激和振奋。北方军区是拉宾军旅生涯的启始点，但此时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很慎重地处理着一切。

1956年秋，达扬通知各大军区，在叙利亚和约旦不参战的情况下，以色列准备进攻埃及，英、法协同行动。拉宾的北方军区没有参战，他为没有参加苏伊士运河战争感到遗憾。在此之前，北方边界局势很平静，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北方边界围绕非军区土地的耕种权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的摩擦。曾爆发了激烈的边界交火。但双方激烈指责，频繁交火，却并没有大打出手。

尽管各种事态变化多端，拉宾始终留意着总参的人事变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拉宾始终瞄准着总参谋长的职位。

3 近在咫尺

到1957年后期，事情变得有点微妙了，因为达扬任期将满，谁出任下一届总参谋长成了将军们关注的问题。

琢磨不透的是，达扬在一次“民意测验”时有意提拉宾为候选人。与会者谁也不吭声，因为同意拉宾就意味着自己将失去机会。而其实，这是一场很无聊的游戏，因为总参谋长的任职是古里安说了算，古里安后来任命拉斯科夫为总参谋长。拉宾并没有为自己近在咫尺的好事失去了感到不满，反而对此十分高兴。因为他在拉斯科夫手下工作一直非常愉快，更使他兴奋的是拉斯科夫支持他去美国哈佛求学，录取通知书也寄来了，他准备于1959年夏季赴美留学。但是，1959年4月的一个意外事故又使他的留学梦成为泡影。当时总参准备搞一次全国性的大演习，但组织工作出了问题，事到临头大家还一无所知。出事那晚，拉斯科夫和一批高级将领正在欣赏一场节日音乐会。这时，传令兵闯进会场把拉斯科夫请了出去。拉宾等人不敢怠慢，跟着出去了。跑到街上一看，一伙带枪的后备役人员正在满街找顺路的车；广播电台正用数十种暗语召集后备役人员奔赴部队。

等事情弄清后，反对党和各种舆论的抨击像暴雨一样倾向工党政府及军队；阿拉伯国家更像掌握了“铁证”一样，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古里安发誓一定要严惩渎职人员。最后，作战部长和情报部长成了替罪羊，均被撤职。

也就是这一桩意外事故，使拉宾又改变了自己的道路走向。尽管总参谋长之位近在咫尺，却为他人所有；而就是这么一次阴差阳错，拉宾却又一次出任作战部长。

4 第二次出山

拉宾第二次出任作战部长，是拉斯科夫提名的，古里安迅速批准了这项任命。第二次出山，不比他第一次任作战部长。这时，国际形势严峻，中东上空战云密布，得有打大仗的准备。

而当时的形势对以色列不利。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爆发了卡塞姆政变，阿拉伯世界决心与以色列决一胜负。而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苏联东欧集团公开地站在了阿拉伯一方，向埃、叙等国提供大量的重型武器和经济援助，使它们的力量大增。而以色列，当时的英、法只卖一些武器给它，不承认它的盟友关系；美国的态度则很暧昧，对阿以双方“不偏不倚”，并不愿卖武器给以色列。也就是说，以色列在大国中没有可靠的朋友。

面对现实，拉宾十分焦急，他力主从美国寻找支持。因为当时主要武器供应国法国随时有可能卡断对以的供应，法国武器与当时阿方拥有的苏制武器的性能是不能相比的。但当时的一些军政要人却不这么看，如佩雷斯和魏兹曼。

在古里安去美国访问时，拉宾陪着拉斯科夫紧急求见古里安，力主打破美国的封锁，他还越级递交了一份武器求购清单。古里安很有同感，答应一定尽力在访美过程中解决雷达预警系统及其他应急武器的求购，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开端。

60年代初期，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袖纳赛尔给以色列来了一次考验性的神经战，使以军总参谋部出了一身冷汗。事情发生在1960年1月19日，以军总参收到一份语焉不详的情报，声称有一个埃及装甲师正在苏伊士运河以西地区集结。总参派侦察机侦察，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接踵而来的情报却使大家大吃一惊，原来埃军的主力已秘密穿越西奈半岛逼近以色列，而当时以军可与其对阵的只有二三十辆坦克。原因是叙利亚自1月初炮击以色列居民点以后，以色列在叙以边界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此叙利亚深感不安，纳赛尔便于1月14日至19日到叙视察，当他从苏联人那里得知以军准备进攻叙利亚的情报后，遂下令埃军向西奈半岛纵深推进，等以色列人明白过来时，埃及人的数百门大炮已指向了他们的脑袋。

这时，手忙脚乱的以军早已慌作一团。好在拉宾在接到第一个情报时，就已给第七旅旅长打了电话，使其有所准备，总算把130辆坦克调到了前线应急。但埃军只是对峙着，却不开火，直到3个月后撤出运河西岸。埃及的宣传机构却大肆自豪地宣称：埃及军队的大胆行动，阻止了以色列进攻叙利亚。而其实，以军的行动部署已全被打乱了。只能像哑巴吃亏似的吭不了声。但埃军的这次行动却使以色列人学会了聪明，他们深深感到：第一，美国预警系统要尽快到位，不能等对手到了面前才有反应；第二，必须有应付对方类似神经战的有效方法，不能老让对方牵着鼻子走。对于拉宾来说，他求购美国武器的想法被进一步证明是

对的。

5 失之交臂

在认真处理好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的时候，拉宾始终没有忘记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尊敬的拉斯科夫总长的任期将满。拉宾盯着这个位置，就连在同事面前也不隐瞒这一观点。可是古里安却让他的好梦成了空，他安排了副总参谋长佐尔担任了这一拉宾梦寐以求的职务。这样，拉宾自然有气。在佐尔就职那天，古里安会后把拉宾留下了，并直截了当地问拉宾：“听说你对我任命佐尔为总参谋长有意见，是吗？”

拉宾毫不隐瞒，气哼哼地说：“确有此事。不过，你的任命有你的理由，用不着向我解释。”

本·古里安也提高了声调：“但我要告诉你，你有一次违抗了我的命令，这不影响我对你的看法。你一贯小心谨慎，我很欣赏你，佐尔只是职位比你高一点儿才先走一步。我若任命你当总长，他肯定要辞职，这样我就对不起他。”

古里安语气诚恳，眼神中流露出一种父爱般的情感。拉宾深知古里安对他的偏爱，于是他想使点小性子：“既然你又提到集会的事，我想把话说明了。我是出于责任才留在军队中，如果你认为我应该离开军队，我会默默走开的。”

这一招还真行，古里安火爆地喊：“谁想赶你走啦？你必须留下来！我要怎么才能说服你？”见火候已到，拉宾毫不客气地要求古里安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以此确保下一任总参谋长职务非他莫属。古里安真的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以后的事情并不那么顺畅，拉宾和佐尔的关系很快就变得很不协调了。说到底，拉宾只佩服能力比他强的人；同时，佐尔也少不了对他加以防范。但拉宾总认为佐尔背后有人在为他出点子，这人便是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佩雷斯以前因购买武器之事和拉宾大吵一场，从此两人产生龃龉；另外，佩雷斯才是最想当总参谋长的人。

到1963年初，佐尔和拉宾的关系僵得已结了冰。最后佐尔请拉宾辞职。事情闹到古里安那里，他让佐尔再干一年，同时又很爽快地告诉拉宾：“我答应过你做下一届的总参谋长，你会当上总参谋长的。”拉宾感激不已。

和古里安谈过之后，拉宾又找佩雷斯开心。拉宾在自己房间用香槟酒招待佩雷斯。佩雷斯在知道古里安答应拉宾做下一届总参谋长时，感到一阵惊慌，脸色刹时变得苍白，嘴里喃喃地说：“他真的这么说了吗？”拉宾举着杯说：“当然是真的。干杯！”……

6 如愿以偿

提升拉宾当总参谋长的事原说是一年以后，但一个突发事情把时间提前了。1963年6月，本·古里安突然决定辞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人们知道皆震惊不已。此时，佐尔在法国访问，参加航空博览会，代总参谋长拉宾立即带领一批高级将领去本·古里安家中探望。

拉宾发表了令人感动的长篇讲话，他在历数了本·古里安对国家和军队的非凡贡献后，描述了以色列面临的困难。他噙着泪水说道：“难道在这种紧要关头，你会把以色列国防军丢下不管了吗？”

古里安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发表了讲话，他内心的感情波澜使在场的人都能体会得到。他没有为自己辞职的原因作解释，但动情地赞扬了为国防献身的男女官兵。最后，列维·艾希科尔接任了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离任前，古里安告诉拉宾：“我答应过你当下一任总参谋长，我已经与艾希科尔谈了，我相信他会尊重我的意见。当然，其他的事我已办不到了，请原谅。”拉宾退后一步，立正，向古里安行了一个军礼。一切感激之情，全都包含在一个军礼之中。

新任总理艾希科尔没有忘记本·古里安的嘱托，他决定不再延长佐尔的任期，正式任命拉宾为总参谋长，任期从1964年1月开始。那一年，拉宾年方42岁，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总参谋长，他仅用了23年时间。上任以后，拉宾即全身心投入到军队的整军备战工作中去，他决心为祖国施展好自己的才华。

第七章 战云密布

1 为水而战

就整个中东的所有战争而言，其根源一是宗教，二是水资源，其他次之。拉宾走马上任时，以色列的“国家输水工程”即将完工。但由于该工程是从约旦河上游以叙边界的加利利抽水输送到缺水的中部和南部，每年可给以色列多带来 3 亿立方米的水供应，而叙利亚、约旦却将受到损失。因此，叙、约两国也纷纷在上游兴修截水工程，这样就将减少约旦河下游的水流量，受害者反而是以色列。于是，以色列和叙利亚及约旦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1964 年 11 月，叙军炮击了以色列边界定居点，以空军当即轰炸了戈兰高地上叙炮兵阵地，一场叙以之间因水资源而发生的战争开始了。为了彻底压制对方，以色列悍然开炮轰击了叙利亚水利工地的施工机械，最后迫使叙利亚停工。在打掉了阿方的约旦河改道截水计划以后，以叙边界有过一段相对的平静，但到 1967 年 4 月，以色列空军一口气打下了 6 架叙利亚的米格—21 战机，使得两国边界又紧张到了危险的地步。以色列的“空中骄子”们乐得手舞足蹈，但拉宾却显得忧心忡忡，因为要是真的打起来，以军的武器装备比阿方还差着一大截。在空军上，以军的装备比阿方强；但在装甲兵实力上，以色列则居于劣势，它们手头没有可与苏制 T—54 和 T—55 型相匹敌的坦克，而且连旧“谢尔曼”式坦克数量也不足。拉宾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些方面超过阿方，在装备上决不能叫阿拉伯人占了优势。

6 月份，总理艾希科尔访问美国，拉宾强烈要求他一定从美国人那里搞一些“空中之鹰”战斗轰炸机和性能先进的坦克。艾希科尔回国后，带来了一个可以让大家兴高采烈的消息：美国总统约翰逊已答应向以提供所需的飞机、坦克，只等国会的批准了，而批准则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但没过多久，另一个消息却足以使以色列人满脸愁容。那就是约旦也要求美国提供同类武器，侯赛因国王扬言如果美国不卖的话就去找苏联。这样的话，着急的自然是美国。因为约旦是中东为数不多的亲西方国家之一，它要是投入苏联怀抱，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了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约翰逊政府为了摆平此事，特意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考麦尔和资深外交官埃弗里·哈里曼为特使，做说服以色列人的工作。

考麦尔和哈里曼都是精通此道的老手，他们在与以色列人的交往中，分别熟练地轮流扮演着白脸和红脸的角色。可是以色列人似乎吃了定心丸，就是不买他们的账。通过多番的唇枪舌战，最后还是以色列的细胳膊拧不过美国人的大腿，因为它讨价还价的本钱太少了，真与美国人闹翻了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最后，以色列勉强同意了美国向约旦出售武器，条件是美国以会谈纪要的形式代表约旦保证这些美国坦克不得越过约旦河。以色列代表最后只好悻悻地离开了谈判桌，他们似乎看到了纳赛尔乐不可支的笑脸。因为以色列人知道，侯赛因的这一招绝对是纳赛尔出的。

尽管以色列人在谈判中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美国尽快提供的武器已令拉宾眉开眼笑。美国提供的“空中之鹰”战机，约 250 辆 A—2C 和 A

—I 型坦克、坦克引擎备件及 105 毫米口径的大炮等重型武器装备，很快就运到了以色列，解除了他沉重的思想负担。有了这些装备，拉宾觉得腰杆一下子长粗了，他足以威胁整个阿拉伯世界，使之不敢轻易妄为。

在此之后，拉宾很快整改了军队，把军队分为防御与进攻两大部分，并大力提高了部队的突袭打击能力。

2 逼出纳赛尔

当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纳赛尔充当着精神领袖的作用，阿拉伯世界的每一次大的举动，几乎都与纳赛尔有关。

1967 年 5 月 14 日，拉宾在总参收到埃军不寻常调动的情报；次日，他正在参加阅兵式，又收到大批埃军正向西奈纵深推进的报告。大家最初的反应是埃及人又在搞神经战，情报部长亚里夫也认为：埃及人在重演 1960 年“罗梯行动”的老戏。其目的是逼近以色列，让以色列慌忙动员、戒备到对峙持续一两个月，耗尽以色列的精力以后，再撤军，然后大肆宣传自己的胜利。拉宾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只是在埃及第四装甲师逼近时动员了以军的一个后备役装甲旅作准备。

但后来才清楚，是苏联 5 月 12 日提供的“情报”才促使纳赛尔增兵西奈。5 月 16 日，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两国边界撤到加沙和沙姆沙伊赫，摆出一副开战的架势。想不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也给他玩了一个绝招，在同一天，他要求纳赛尔作出明确选择：要么，联合国部队原地不动；要么，全部撤走。被将了一军的纳赛尔一咬牙，于 18 日通知吴丹：联合国部队全部撤走！这样，吴丹后来竟遭受到指责，说是他把纳赛尔推上了与以色列开战的道路。其实，纳赛尔不想打仗。这一点，拉宾、达扬等少数以军将领是清楚的。纳赛尔曾对叙利亚人说过：“埃及决不会因为一个北部非军事区里的拖拉机或边界事件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但是，纳赛尔很难把这种观点坚持到底，阿拉伯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有人公开笑他是躲在联合国部队后面的反以“英雄”。他是不允许兄弟们这样说的，他得有所表示；况且，苏联人的情报说得活灵活现，说以色列将进攻叙利亚，他不能对叙利亚兄弟见死不救。纳赛尔是有一本难念的经，迫不得已才出这一着险棋。同时，以色列的一贯方针是把纳赛尔从幕后引出来，以便一举毁掉他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形象。

纳赛尔已经被逼了出来，拉宾就得准备打仗。但是，决策责任至关重要。要打，就得速战速决，联合国及当时大国是不允许以色列打的，尤其是长时间的打。但不打，静观局势，时间拖得越长，形势对以色列就越不利。光是长期动员后备役也会把国家的经济拖垮。为此，拉宾分别向一些权威人士征求了意见。

当时外长埃班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一旦打起来，没有哪个大国会真心帮助以色列，以色列将会十分孤立，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很快强制以色列的，以色列将捞不到半点好处。但是，达扬却看得很透彻：纳赛尔的举动完全是以色列给逼出来的，以色列对叙利亚、约旦的行动过火了，纳赛尔除了铤而走险之外无路可走。他还认为：纳赛尔会很快封锁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到时候，以色列惟一的选择就是打仗！

3 尼古丁中毒与“宫廷政变”

决策意味着责任。为着是否打的问题，拉宾度过了一段难挨的时光。埃及、叙利亚加紧备战的消息接踵而来，拉宾便也加紧备战。

5月23日凌晨3点45分，埃及果真封锁了蒂朗海峡，随后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又增兵以待。早上8点，艾希科尔来到总参掩体地下指挥所与将军们会晤。在大部分人一再催促早打的情况下，艾希科尔表示了必打的决心，但得向美国通报一下情况，以示尊重，因为美国政府要求以色列不开第一枪。中午，艾希科尔召开了扩大的内阁防务会议，应邀出席的有梅厄夫人、贝京、达扬等。会上，拉宾汇报了形势最新动态并讲解了初步拟定的作战方案。拉宾在会上发现：无论是内阁部长们还是反对党领袖，都没有急于打仗的愿望，大家寄希望于外长埃班的欧美游说，幻想着以政治和平手段解决这场危机。当晚，拉宾在总参召集了各部部长和各军区及兵种司令的联席会议，商讨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大家达成了共识：即不管仗怎么打，首先必须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空军司令莫蒂·霍德对此信心十足，但他担忧埃及空军会轰炸以色列人口稠密区，因此，必须首先把敌方轰炸机炸毁在地面。拉宾听了，脑海里一再浮现的是特拉维夫被炸成废墟的情景，其他的什么也听不进去。

而最令拉宾动摇信心的还是全国宗教党党魁夏皮拉。在一次内阁防务委员会上，他公开反对先敌开战，并从历史的角度陈述了不必先开战的理由，端出了本·古里安是怎样有把握才开战，是怎样化解危机的。最后，他很轻视地质问拉宾：“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当然要为生存而战。但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我们就要自己承担责任。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拉宾不知当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夏皮拉鄙夷地哼了一声就摔门走了。一想到这里，拉宾感到脑袋“嗡”的一声，背脊渗出了冷汗。责任！责任！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兴亡的责任就在那一纸决策上，弄不好就是千古罪人！

总参会议结束后，拉宾很晚才回家。一到家便倒在沙发里，心里一阵阵作呕，头晕目眩，额头直冒冷汗。为了打仗，几天来他几乎没有合过眼，在考虑打起来会出现的薄弱环节。他甚至设想了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以色列防线被突破，阿军坦克群向特拉维夫、海法区冲去，以军无法抵挡，犹太人打着白旗向阿拉伯人走去……他边想边抽烟，常常是烟灰缸的烟头像小山一样；白天在办公室，晚上在家，好像和谁抽烟比赛；梅厄夫人和拉宾的下属及内阁部长们都一样；在拉宾的各种会议室里，烟雾弥漫，白天也需要开灯才行。

夫人利扬用湿毛巾给拉宾洗了脸，让他感觉舒服些，但古里安的“你要为此负责”和夏皮拉的“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的声音轰隆隆向他袭来，使心力交瘁的拉宾有点绝望，他只好请来作战部长魏兹曼，向他倾诉一下内心的迷惘：“魏兹曼，你认为我是不是应当让出我的位置？”魏兹曼忙说：“总参的全体同志会帮助你度过难关的，好好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说。”

魏兹曼走了以后，他要利扬叫医生来检查一下，结果是：疲劳过度与尼古丁中毒的综合症，需要很好休息一下。拉宾一睡便睡到了24日。就在这一整天，总参使有人以“宫廷政变”的形式想把他拉下去。拉宾

所信赖的魏兹曼，跑到艾希科尔面前去说“拉宾信心和精神已到了崩溃的时候”，随后还大模大样地自封为代理总参谋长，并召开了各部门首脑会议。人们的印象是：拉宾已不能工作了，他已请魏兹曼接任，艾希科尔也是不反对的。25日拉宾上班，人们从背后投来异样的目光，他感到不解，后来才知道一切。接着他也猜想：“艾希科尔本人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他决定见见艾希科尔。艾希科尔私下接见了，并打消了他的一切顾虑。拉宾很感激地看了艾希科尔一眼，发现他也是不堪重负的神态。

当拉宾再一次回到总参时，他用洪亮的嗓音通知各部、各兵种的首脑来开会。会上，他信心十足地分析着以军的优势和敌人的劣势，对克敌制胜深信不疑，令将军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昔日“帕尔马契”的老兵。只有魏兹曼心里清楚，拉宾的此番动作是给他看的。他心里也不是滋味，烤熟的鸭子又飞了。

4 作出最后决定

在封锁了蒂朗海峡以后，纳赛尔就没有了动静，他把球踢给了拉宾，他要看看拉宾是怎样踢这个球的。拉宾没急，他把球带着走，寻找最佳位置。当时，以色列有一首民歌的歌词里有一句“纳赛尔等候着拉宾”。而当时情形不仅如此，相互等候的人有一大串，他们是：纳赛尔等候着拉宾动手——拉宾等候着艾希科尔的决断——艾希科尔等候着他的部长们点头——部长们等候着埃班带回来的消息——埃班等候着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真是一个大连环。等得让人有些着急。

拉宾病倒那天，魏兹曼与将军们制订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即不仅要占领加沙和阿里什，而且要占领整个西奈半岛，挺进到苏伊士运河岸边。拉宾开始没同意，认为胃口太大，会招致国际反对；但考虑到自1956年之后，西奈已变成埃及进攻以色列的一块跳板，遂同意了这一计划。但艾希科尔在25日严令军方在27日前不得采取行动。

25日，拉宾得到了埃及在西奈已集结了4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的消息，叙利亚也把大军集结在边境上，并把伊拉克作战部队编入战斗序列中。而内阁的部长们却眼巴巴地等候着埃班的回国。26日，拉宾下令，各大军区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并进行总动员。至此，整个以色列就变成了一架隆隆作响的战争机器。

魏兹曼和亚里夫是拉宾手下的干将，他俩对总理不准动手的决定极为不满，一再请拉宾施加压力。拉宾考虑再三，遂和副手巴列夫还有亚里夫向艾希科尔进言：“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顾虑由谁来承担先动手的责任。难道你真相信我们能使美国宣布，进攻以色列就是进攻美国吗？如果你认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已丧失了战略上的突击优势，如果再等下去的话，我们连战术上的突击优势也没有了！”艾希科尔见拉宾带着军人口吻说话，他不高兴了，沉下脸宣布道：“在政治解决的努力没有彻底失败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得发动袭击。”话已说到这一层，拉宾等人只有服从。

26日下午，埃班发回了人们望眼欲穿的电报，电报告诉大家：美国承诺担当起保卫以色列的生存权的义务。山姆大叔的一句承诺，使部长

们欢呼。但是，随后而来的消息却又似迎头泼来的一瓢冷水：“一、美国没有得到埃及有进攻意图的情报；二、未经国会批准，美国总统无权对以色列的安全作出承诺；三、以色列不可挑起事端；四、总统正谋求组织一支国际舰队去打开海峡封锁。”人们得知后，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一封喜报的欢快高潮还没有过，又一瓢冷水浇了过来，部长们一个个都慌了，都问拉宾怎么办。拉宾成了主心骨，他得拿出主见。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说，一天也不能拖了，必须下决心早打。时间越往后拖，埃及准备得就越充分，以色列丧失的优势就越多，付出的代价将会越大。可是夏皮拉不信这一套，他以种种理由阻拦：“如果我们进行伤亡惨重的进攻，而全世界又因此摒弃我们的话，我们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同时，埃及和叙利亚可以得到苏联人的军火供应，以色列到哪里去搞军火呢？”部长们的意见仍然得不到统一，仍未作出开战的决定，只是授权艾希科尔和拉宾在以方遭受袭击时有权作出“适当的反应”。27日更是难熬的一天，约翰逊订好26日会见埃班，结果拖到27日中午才会见，他带给埃班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别先动手，否则后果自负。当晚，艾希科尔又传来了苏联总理柯西金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同样的警告。部长们更加丧失信心，而埃班这时也从飞机场赶到会议室来凑热闹，告诉大家约翰逊让以色列等三个星期，他去斡旋。这下子，将军大声疾呼不能再等，而部长们却主张等，夏皮拉则表示，如开战的话宗教党的内阁成员将集体辞职。最后投票表决：9票对9票，戏剧效果，令拉宾哭笑不得。散会后，艾希科尔又告诉拉宾，工党部长埃班也提出了夏皮拉一样的辞职威胁，然后他摇着头走了。埃及人1000辆坦克的炮口已对准了以色列，以色列却闹起了内阁危机，真是不可思议！

对于艾希科尔，拉宾是有感情的，是前者提拔了他，维护和爱护了他。但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及军队的统帅，艾希科尔的素质比本·古里安差，尽管他赞成早打，但他缺乏一种治国安邦的能力。在以色列，政界、军界及公众舆论，都一致呼吁改变现状和推举能人。

内阁一再寄托于美国的斡旋，将领们却急不可待地等着进攻。就在以色列争吵不息的同时，埃叙、埃约等阿拉伯世界已团结起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拉宾手下的将军们，窝了一肚子火。这时，拉宾既要安抚下属，又要在艾希科尔面前陈述己见，同时又要顶住部长们的压力，更主要的是需洞察整个局势，把握住军队的稳定。给他的条条框框那么多，真好比捆住手脚跳舞。

内阁无休止的讨论和争吵毫无意义。拉宾在视察部队时，发现前线官兵们对政府的不满已达到了极点，他们甚至提出了“政客们是否要毁掉这个国家”的尖锐问题。31日，退休多日的摩西·达扬，提出了重返部队，他甚至自己去部队视察了，这给军队和新闻界无疑加了油，立时获得一片叫好声。但对拉宾来说，确实出了一道难题和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艾希科尔失去了最后一点自信心和自制力，他最后把国防部长的职务也交给了公众拥戴的老将军达扬。

1967年6月1日，“山姆大叔”又给了艾希科尔一记沉重的耳光。原先埃班说美国准备用两到三个星期时间，组织国际舰队打破海峡封锁以色列的防线。当时，内阁们都当了真，老老实实地准备等下去。可这一天，约翰逊的发言人声称：那是人们误解了总统的意思，美国不可能

做到那一点。当消息传到以色列，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到底埃班和约翰逊，谁是撒谎的人呢？真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紧随着，一股汹涌愤怒的浪潮席卷了以色列，人们厉声质问，为什么政府要把以色列的命运寄托在美国人那不值钱的许诺上？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希望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

面对这种情况，拉宾和达扬加紧了军队的行动。6月2日，拉宾在总参掩体中召开了内阁防务委员会与总参的联席会议。部长们关心的是防务，将军们关心的则是达扬发表什么样的高见。事实再也容不得人们喋喋不休地争吵了。达扬指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大国制止这场战争之前，以军能打多长时间。”他认为：只有三四天，如果早下决心打，埃军防线的漏洞会更多一些，以军就能在这几天内取得更多的战果，反之，以军突破埃军防线的就会延长，更没有时间去扩大战果。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以前拉宾也多次强调过，但达扬却获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战争是惟一的选择！已容不得半点不同看法了，整个会场被浓厚的战争气氛所笼罩。

6月2日中午，艾希科尔、达扬、拉宾、埃班、阿隆与赫尔佐格，在总理府作出秘密决定：在6月5日之前不发起攻击，给内阁两天时间作出开战决定。3日和4日，拉宾视察了参战部队。他对部队的准备感到满意，当他从南方军区返回特拉维夫时，遇到了达扬。达扬告诉他：“内阁刚刚批准了次日凌晨发动进攻的计划。”拉宾很高兴，当即和达扬把所有的计划细节又查了一遍，看是否有漏洞。随后，便把空袭时间定在6月5日凌晨7时45分。

当他回到家里，已经很晚。利扬知道他近来心力交瘁，看他酣然入睡，心里也感到高兴。但她看到丈夫那额头上的皱纹和已开始花白的头发，心中便涌起怜爱之情。她知道：丈夫是自己的，但作为军人，他也是祖国的，他把自己已交给了祖国。

第八章 “六天战争”—— 第三次中东之战

1 “闪电计划”——空军首战告捷

战争，使达扬和拉宾成为英雄！但在“六天战争”中，“闪电计划”的实施成功，首功应是霍德的。拉宾也一直这么想。

空袭时间是根据空军司令莫蒂·霍德的建议确定的。霍德用了两周的时间，摸清了埃及空军的活动规律。他们是“天刚拂晓就起飞进行巡逻，持续时间为一个半小时左右，然后飞回基地吃早点。在7点到8点之间，那里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达扬对霍德的奇袭方案很赞赏，他只是稍有改动，即初期不要进攻加沙地带，以免以军在人口稠密区被拖住手脚；也不要进攻到运河岸边，以免引起国际上过大的干预；关键是早点拿下沙姆沙伊赫。整个奇袭方案称作“闪电计划”，其特点是赌博式的孤注一掷，要一口气派出200架战机中的188架，在3个小时内解决问题。拉宾承认：他们都抱着一种赌博心理，只不过霍德胆子更大。要是计划失败，那么，以色列就只有剩下的12架飞机去抵挡数百架叙利亚和约旦的战机，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6月5日凌晨，以色列军、政首脑会集在空军司令部。7点45分，第一批40架以军战机起飞，接着是第二批、第三批……人们紧张地静待消息，无线电通讯网没有传来任何信号，连飞行员交谈的声音也没有。因为为了保密，空中指挥员严禁下属打开通讯设备，就是被敌人击落也不准吭气。飞机一起飞，惟一的是希望成功，担忧和后悔都是无用的。到11时，四分之三的埃及空军力量已被摧毁，304架飞机在燃烧。空军首战告捷了，以军夺取空中优势的任务完成了。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的空军也相继遭到以色列空军的袭击。这一天，阿拉伯国家总共损失了374架飞机及许多导弹基地和雷达站。损失最严重的是埃及，它的空军基本上没有了。在解决了埃及空军的巨大威胁以后，以军又于6月6日同力量较弱的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空军再一度较量，到6日黄昏，歼灭阿拉伯飞机的数目是惊人的，总计达416架，其中397架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以色列共损失26架飞机，21名驾驶员。以色列空军使用了一种法国人设计的穿透弹，使多数受到攻击的机场被摧毁。

6月5日晚，以色列小规模海军的潜水蛙人设法探测塞得港和亚历山大港的港口，并加以破坏。由于他们的各处活动与破坏，使埃及海军丧失了进攻特拉维夫和海法地区的信心，解决了一大后顾之忧。

2 “分割包围”——装甲兵大显神威

在战争发动之前，达扬和拉宾对兵力的部署是这样的：埃及边境集结65000人，坦克650辆；在叙利亚边境集结25000人，坦克100辆；在约旦边境集结5000人，坦克350辆；还有许多兵力作为后备队，用来增援各条战线。就在空军采取攻击的同时，南方军区司令部也接到了“纳赫肖，行动，祝你顺利”的行动密语命令。

在夺取了绝对的制空权后，以军的装甲部队开始“分割包围”。歼

灭西奈半岛上的埃及军队，空军辅助实施。

整个战争的部署是：先集中重兵痛击南面的埃军，争取在短时间内打垮敌人并扩大战果；排在第二位的是东面的约旦，目标是攻占整个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东北面的叙利亚放在最后，最好是消除它的炮火威胁。主要目标是占领海岸线以东约 30 英里的阿里什，同时切断加沙地带。阿里什是从苏伊士运河上的坎塔拉到加沙铁路的一个重要车站，也是埃及补充西奈驻军的必然基地。第二个目标是阿布奥格拉，它处于埃及边境约 15 英里，离海岸 30 英里的内陆沙丘，它处于俄国防卫体系在纵深设重兵的一个阵地之间。它控制着阿里什大约往西 20 英里的利卜尼山，以靠近以色列境东约 20 英里的库塞马延伸的各条公路为交接点。因此，它阻止了以色列从内格夫中部进入西奈中部的所有通道。就是说：拉法—阿里什的突破，是整个战争的关键。

担负这一战役的，是配备约 250 ~ 300 辆坦克的最好装甲军团。尽管面临着埃军的地雷、炮火，还有这次战役中埃军的顽强抵抗，以色列装甲兵团还是勇敢顽强地实施了战役计划，尽管受到了较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在整个中东战争中是一场大规模的装甲军大会战。次日黎明，以色列军队即以血的代价攻克了拉法—阿里什。

6 月 6 日晨 8 点 30 分，已变得求稳怕乱的达扬沉不住气了：“沙姆沙伊赫到底怎样了？”他问拉宾。拉宾劝他不要着急，建议 7 日以空、海军配合行动并占领它。因为实际证明，光有步兵不行。达扬同意拉宾的看法。

6 月 7 日，以军以海、空、陆三军配合，果然攻占了沙姆沙伊赫。6 月 8 日，以色列进抵苏伊士运河。

以色列对约旦的进攻是在对埃及进攻后不久开始的。以色列耍了个外交手腕，它声称不管如何，以色列将不与约旦为敌。因此，在整个战争开始以后，约旦司令部一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原来前来助战的伊拉克军队的一个师又未能及时赶到约旦河西岸地区，所以一开始就被动了。6 月 5 日午后，以色列装甲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同时对南面的耶路撒冷旧城和北面的杰宁城展开攻击，当地守军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加上没有空军的掩护，只好且战且退。而部署在约旦河西岸的两个约旦坦克旅，在 48 小时内即被击溃。6 月 7 日，以军南北两路都已进抵约旦河西岸，占领了面积约 4800 多平方公里的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同日，以军各路军士，均已入占了整个耶路撒冷。中午，达扬和拉宾及许多军士，都到哭墙前祈祷，并庆祝全体犹太人新的胜利。其他两大宗教的信徒，只能在以军的军乐羊角号声中忍气吞声。达扬在向军队讲话时表示，整个耶路撒冷现已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它的人民无意与它再分开，或者说不会同他们的圣地再度分开。达扬的讲话在军队中引起了狂欢，他们说：“我们就是为圣城而战！”

与此同时，也就是 6 月 8 日至 9 日，以色列部队到达了伊斯梅亚对面的运河区，甚至到了小苦湖南端，以及这里和陶菲亚港之间的沙卢法对面的地方。再往南，以军还到达了埃及在萨达尔角的油田附近的红海岸边。埃军已变得毫无士气和组织，以军势如破竹。

就军队的士气和能力而言，正如拉宾所说：“以军完全可以同时进攻叙利亚。”但是，达扬有所顾虑，他怕由此引起苏联的干涉，因为苏

联的军事顾问就在叙利亚的前线军队中。直到两天以后，达扬才决定对叙利亚采取行动。6月9日上午，以色列一面伪装同意“停火”，一面对叙利亚发动了全面进攻。以色列军队在通往叙利亚的库奈特腊至大马士革公路以北，兵分三路向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戈兰高地攻击。叙军英勇顽强，但以军还是以沉重的代价打开了叙军阵地的缺口。激战延续到6月10日，以军占领了戈兰高地的大片土地，包括库奈特腊要地，从而控制了通往大马士革的几条主要公路，夺取了阿拉伯地区最后到达黎巴嫩的输油管。

以色列在三条战线上同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部队作战，以一次罕见的闪电战，获得了“辉煌和决定性的胜利”。战争前后共6天，以色列以少胜多，可以说创造了奇迹。3个阿拉伯国家受到重创，埃及官兵死亡11500人，受伤和被打散3万多人，被俘5500多人；约旦军队死亡和失踪6100人，伤700多人，俘400多人；叙利亚军队死亡2500人，伤5000人，被俘600人。而以色列只死亡809人，伤的也不多。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侵占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城的约旦管辖区、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达6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战争中侵占的土地，相当于以色列原有土地的4倍。

以色列之所以取胜，主要是思想动员得力，战略战术周密；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也是制胜的主要原因。阿拉伯三国，明显存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而三者配合不好也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六天战争”后，拉宾和达扬成了举国上下的英雄，拉宾在军界声名鹊起，他的训练、组织、计划工作完美无缺。自此，以色列有了安全感。

3 神秘的爆炸——“自由号”被毁

在“六天战争”期间的6月7日，有几份电文不仅震动了以色列的高层领导人，而且所涉及的事情险些引起美苏之间的一场核冲突。事情的起因是阿里什附近的海面上发生了一起神秘的爆炸。

第一份电文是一条简短的消息：“在阿里什附近的海面上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拉宾看后十分纳闷，阿里什早已拿下，且又向西推进了五六十英里，为什么他们身后又发生爆炸呢？难道埃及人从海上登陆了？想到这，拉宾命令海军和空军联合行动。但就在命令发出后一小时，第二份电文又到了，说是在阿里什海面上发现一艘不明身份的船只，以军多次侦察它的身份，并主动发讯联系，在始终得不到回答的情况下，根据颁布的攻击身份不明船只的命令，以军战机和战舰猛烈地冲击了这艘船。但这艘船究竟是哪国的呢？这时第三份电文又到了，电文让拉宾大惊失色。因为以军攻击的是苏联间谍船。拉宾等人坐立不安，这不是明显的捅马蜂窝吗？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人们的头顶上。这不是逼着苏联参战吗？战前美、苏均在地中海聚集了重兵，单苏联舰艇就达70多艘。现在埃、约已败，苏联会不会以这个事件为由参战呢？无论如何，以色列是没法抵挡苏联的进攻的，而“挑衅”的责任却在以色列。最后又会不会导致美国的参战呢？人们议论纷纷，越想越害怕。此时，第四份电文又到了，一切均已弄清，原来那船不是苏联的，而是美国的监听船“自由号”。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但

却免不了有一丝丝的苦涩和尴尬。原来，开战前数小时，以色列就通知美方，为防止海上袭击，以军将攻击西奈附近海域上的任何船只，为此，要求美方撤走这一海域的舰船，来不及撤的应向以方明确位置，以免误击。美方把这一通告转达给第六舰队，但由于某些官员玩忽职守，“自由号”竟没有得到通知，结果大难临头了。

“自由号”是艘监听船，职守于间谍工作，它的船长也就没有向询问的以军飞行员说明情况，以军又不明身份，于是实施了攻击。从而产生了第一份电文所说的“巨大爆炸”。而更荒唐的是，以军实施攻击时，“自由号”在未弄清攻击者身份时，就惊慌失措地向第六舰队司令部报告并呼救：他们遭到了苏联空、海军的野蛮攻击。半小时后，约翰逊总统就收到苏联人攻击“自由号”的报告。约翰逊在他后来的自传中写道：“在接到那份报告后的几小时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必须在吃哑巴亏和命令第六舰队进攻苏联地中海分舰队之间作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其后果很可能是两个大国间的核战争！”当时，在美国人也明白了真象以后，感觉和以色列人一样：轻松，但又夹杂着令人尴尬的苦涩。值得人们庆幸的是约翰逊总统没有马上发出攻击苏联的命令，否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所难免了。

4 不失时机——逼纳赛尔称臣

当时的纳赛尔，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怎样使纳赛尔在精神上彻底崩溃，是整个战争的关键。当埃、约败局已定时，叙、伊（伊拉克）军队正在跃跃欲试，埃、约军队也在重新集结。能否早日结束战争，对以色列也是十分重要的。拉宾看准这一点，因此，他主张尽快攻击叙利亚，以达彻底击垮纳赛尔的目的。但是，达扬坚持不予攻击叙利亚，原因是美国人没有保护以色列的承诺，再攻击叙利亚，将使苏联人丢尽面子，致使苏联参战，那是可怕的。倘若一旦成熟了条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攻击的。拉宾也了解他这一点。

6月6日，戈兰高地的叙军炮击以色列边界定居点，以军还只是境内还击。但机会很快就来了。7日晚10点安理会的停火决议生效，9点时纳赛尔便予以拒绝，理由是决议没有要求以军从所占土地上撤走。对此，拉宾和达扬大喜过望，因为纳赛尔又给了他们进攻的宝贵时机。此时进攻，苏联人是没有理由参战的，因为是他的盟友不肯住手。这时，达扬和拉宾忙指挥以军彻底向苏伊士运河岸边挺进；同对，挥军进攻叙利亚。见形势不妙，纳赛尔又于8日晚同意立即停火，但是拉宾和达扬已彻底改变了初衷，进攻仍然进行着。9日，以军全线进攻叙利亚。叙军在以军的攻击面前，打得极为顽强，以军的许多进展则是靠残酷的肉搏战一寸一寸夺来的。直至9日夜间，叙军的抵抗才开始减弱。原因是出在叙军司令部，为保护大马士革，它命令部队撤出库奈特拉城以北。以叙停火协定于10日下午6点30分生效，但11日和12日以军继续抢占地盘，直到控制了赫尔蒙山战略高地，纳赛尔再三敦促安理会督促停火，低下头来首先在停火协议上签字。

这场历时6天的战争结束了，纳赛尔无可奈何地俯首称臣。以色列

人颇为这场用 6 天时间连克数敌的战争感到自豪，于是把第三次中东战争定名为“六天战争”。

第九章 大使生涯

1 如愿以偿做大使

“六天战争”结束后，拉宾任参谋长的期限也就届满了。今后将何去何从？这是拉宾战前就已开始琢磨的问题。再留在军中是不可能的了，朋友们劝他去从政，他自己也这么想，从政应是他最好的选择。不过，他不想从军界直接转入政界，这样太生硬，应有所垫铺。于是，他想到了做大使，而且是做美国大使。这样，他既是政府官员，又可以在做大使的过程中进行从政实习和积累经验，同时还可以积累政绩。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他认为美国历来是以色列的靠山。在那里做大使，可以同美国当权者联络感情，今后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寻找更大靠山的机会。

拉宾的考虑用心良苦，但当他提出来时便首先遭到总理艾希科尔的反对。艾希科尔从椅子上起身走到拉宾面前，很幽默地说：“你想去当大使，而且还是驻美大使，你不觉得这是一个你并不适宜的工作吗？当然，你那些不会打领带之类的笑话我早就忘记了。但你想想，你习惯于出席那些没完没了的酒会吗？你会文雅地与那些场合的太太小姐们周旋吗？你熟悉谈判技巧吗？不，你不适合干这种工作。听我说，你不是一块干外交官的料。”拉宾听了，毫不退缩。正因为他不适合，他才选择去干，以弥补不足。“但我准备去学，而且我相信我也学得会！我更不会害怕那些鸡尾酒会的。”他很诚恳地说。接着，他又解释了为什么要去当驻美大使的原因，他强调了美国的作用正在中东突出起来，但以美关系还很薄弱，须大力加强，而自己的总参谋长的军事和政治背景是有助于这项工作的。艾希科尔显然被拉宾的理由所打动，他答应和外长埃班谈谈，但没有当场拍板。后来，拉宾又多次找艾希科尔要求，但每次艾希科尔都说埃班保留意见。也就是说，他是同意的。对此，拉宾毫无办法，埃班在工作上几乎每次都与拉宾争吵，由此个人关系也变得很微妙。在关键时刻，工党总书记、实权人物梅厄夫人为拉宾讲了话，使他当美国大使的事在1967年10月间定了下来。

在去当大使之前，拉宾很好地思考过对美外交的目标。他通过一番调查后，给自己定了四个目标：一、确保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二、与美国协调有关的中东政策；三、谋求美对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四、谋求美国运用其遏制力量防止苏联的军事干预。当他把这一切交给外交部时，他得到的是外交官员们典型的外交微笑，好像在说：“很好，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本事吧！”

1968年2月初，拉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以色列驻美大使，他带着妻子利扬及12岁的儿子尤瓦尔来到了美国。大女儿达里亚因正读高中一年级，高中毕业后还得服两年兵役，因而没有同行。从此，拉宾又走上了当大使的生涯。

2 实现自我的价值

在拉宾的思想意识里，人生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纯粹的个人利益和个人目标的实现，体现出自我的价值；另一种是把个人利益和个人目标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目标结合起来，体现出自我的价值。拉宾选择的是后者。

到任初期，拉宾几乎无法开展什么活动。因为：他初来乍到一切还较生疏，而约翰逊政府则为越战和大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无暇关心中东问题，因而谁也没有想起过多给拉宾活动的机会。对此，拉宾没灰心，而是寻找契机和突破口，以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地位。他从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了解美国内外政策的实质。当时美国公众最关心的有两件事：一是越战，二是大选。美国人在越战中难以自拔，年复一年，战争总没有结束，而从战场上返回的只是失利的消息和用塑料裹尸袋运回来的尸体。战争是继续下去还是结束，美国人意见分歧，形成两大营垒，因而社会形势急剧动荡，人们对美国的强大和政府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这个问题无疑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

他想起了基辛格博士的一次谈话，他深深地敬佩博士先生对国际问题的渊博知识和精辟分析。基辛格指出：“越战对美国有百害而有一利，这一利就是它使美国获得了处理位于冲突地区的盟友关系的经验。”从此之后，美国决不会轻易卷入冲突的漩涡中去，因为陷进去就很难拔出来。相反，苏联将会大力利用美国的这种谨慎小心和孤立主义倾向来对外扩张。在当时，拉宾看出持以上观点的美国人占主流。拉宾认为，战争的目标是胜利，胜不了就撤，这是常识。而美国人对越战既没有明确目标也没有能取胜的整体计划，在蒙受惨重损失后又迟迟不撤出来，叫人很难理解。美国人是崇尚英雄的，拉宾是有名的英雄。以色列那么小，可以横扫数敌如卷席；而美国那么强大，却对付不了小小的越南。因此，许多美国人对他很感兴趣。美国大选时，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的竞选班子特地邀请他会谈留影，拉宾因当时脱不开身乃至肯尼迪被暗杀而失去了这个值得珍惜的机会。拉宾知道，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展开激烈的总统宝座争夺战时，肯尼迪能主动上门相邀，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拉宾为失去机会深感遗憾。拉宾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总统选举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因而他很快便把注意力转到了两党的竞选活动上。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坚持参加两党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所有大会。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分别确定下来以后，拉宾决定对两党候选人尼克松和汉弗莱摸底。他多次去会晤他们，观察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以及他们在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战斗轰炸机问题上的立场。汉弗莱的态度比较暧昧，话说得很含糊，叫人摸不清脉搏；再加上芝加哥市市长达利的反犹态度，使拉宾感到民主党的新人很难从约翰逊政府的旧框架里摆脱出来。相反，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的亲以态度却比较鲜明，他表示支持向以色列提供这种先进的飞机。到了后期，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和选票产生了作用，反应机敏的尼克松马上向美国犹太人领袖保证，坚决支持以色列，并答应在上台后立即向以色列提供50架“鬼怪式”飞机。拉宾强烈地希望尼克松上台，因为敢说支持以色列的人总比不说的人态度要好得多。而犹太人在美国，历来是民主党的传统选民赞成者。可共和党的尼克松却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他自信鲜明的亲以态度，会给共和党和以色列及自己带来巨大的政治收益。其实，尼克松早在“六天战争”之前，就和拉宾交上了朋友。尼克松在当上总统之前曾

两次访问以色列。第一次访问，尼克松受到以政府的接待规格是较低的，而拉宾邀他去军队时，却以“红地毯”的规格隆重接待他，以致尼克松再三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拉宾也不会忘记，尼克松在参观戈兰高地时，竟然脱口而出“如果我是个以色列人的话，我是决不会归还戈兰高地的。”当尼克松第二次访问以色列时，以色列领导人已估量出了尼克松的政治分量。所以，当他来到总理府时，上至总理下至部长们，都毕恭毕敬地恭候着他。

通过一番努力，拉宾不论在军界还是政界，都使美国人不敢轻看他一眼。尤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大选面前都认识到了他的分量。这样，拉宾的自我价值便得到了肯定和实现。

有两件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美国国会要否决军队提出的配备惊人的武器要求时，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便毕恭毕敬地请拉宾出来支持军队。有一次，许多显要的参议员反对为海军造一艘航空母舰。这时，将军们请拉宾去参加论证会。论证会结束后，参议员比考夫热情地与拉宾握手，“拉宾先生，您说服了我，您愿意将您的观点写进一个备忘录吗？”拉宾很快就把一个备忘录给了他。看过备忘录的另一位议员约翰·斯特恩尼斯见到拉宾时感慨地说：“您知道吗，您的这份备忘录比海军的那份报告更有说服力！”国会满足了海军的要求，并在决议上特别提到了拉宾的备忘录。素以“智多星”著称的基辛格，也常为一些军事问题向他求教。有一次，基辛格找他，原来是美军已摆好阵势准备迎击北越军队发起的一场攻势。拉宾听取了一位将军对战区各方面情况的简介后，默默地看着地图思考着。最后，拉宾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标出了北越军队可能进攻的位置。基辛格吃惊地扬起眉毛：“你是我问过的将军中惟一这样看的人。”当事实证明了拉宾判断完全正确之后，基辛格对将军们说：“你们知道吗？在我请教的人当中，惟一能够精确地预测敌军突击方向的将军是以色列驻华盛顿的大使！”

3 繁忙的外交活动

在大选投票之前，拉宾觉得有必要再到尼克松那里去落实一下军售问题，因为战后以军的军火供应出了麻烦。法国已停止向以色列供应军火，美国政府也停止了对以的军火出售。尼克松听了拉宾的要求后，态度爽快，俨然以一个总统的口吻说：“你放心，我答应你。我支持以色列变得强有力，你们会得到飞机的！”尼克松不但赞成提供武器，而且认为一个强有力的以色列可以在美苏之间起一种平衡作用。尼克松还把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向拉宾交待清楚了，他强调，他和汉弗莱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美苏之间就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中东问题，达成谅解是必要的，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六天战争”的胜利，在美国博得一片叫好声，但约翰逊政府对这场战争却很不以为然，认为它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因此美国不愿意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约翰逊随后提出了五项原则：一、承认每个民族的生存权。二、公正解决难民问题。三、制止中东的军备竞赛。四、确保战时中东的通行权。五、尊重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文字上看，不偏不倚，它既要求阿方不要试图以战争消灭以

色列，也要求以方从阿拉伯领土上撤出。显然，这对以色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得从被占领土上撤出。但是，以色列还是于1967年6月19日作出四点决议来响应。一、以色列准备撤到以埃国际边界。二、以西奈非军事化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及保证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的自由通航权。三、以色列准备撤到以叙边界，以戈兰高地的非军事化确保以的安全。四、西岸、加沙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将另行考虑解决。然而，以色列内阁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战争成果卖得太便宜了，急忙在同年8月修正了这一立场。可笑的是外长埃班对自己的驻美大使保密，以色列对美国保密。直到1968年5月，拉宾及美国政府还以为以色列是准备撤出被占领土的。

拉宾始终是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位的。当五项原则和四点决议没有执行时，联合国的242号决议也随后成为一纸空文。但不久，书呆子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向埃及外长递交了一份后来称为“腊斯克的七点倡议”文件。拉宾对美国不与以色列商量就与没有外交关系的埃及直接打交道，瞒着以色列私下与埃及进行交易的作法，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并当即提出抗议。随后，拉宾又与腊斯克等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直到1969年1月15日，即腊斯克把一封内容为“中东的和平只能随着各方的谈判进程来达到……”的信，交给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时候，美国在中东和谈问题上，才赞同并站到了以色列的立场上。拉宾为改变美国的立场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他还为以色列搞到了50架“鬼怪式”飞机。

1968年10月9日约翰逊在大选的压力下宣布卖给以色列50架“鬼怪式”战斗机，但随后又开始扯皮。拉宾多方软缠硬磨不生效，也只好亮出了一张令约翰逊望而生畏的王牌——美国犹太人的压力。拉宾通过各种渠道把“鬼怪式”交易的阻力告诉了美国犹太人组织，那些民主党的支持者们立即掀起了责问约翰逊的声浪。三四天后，约翰逊屈服了，他下令国防部立即无条件地向以色列出售这批飞机。

1969年1月20日，共和党的尼克松宣誓就职，拉宾将要与之打交道的核心任务是停火。尼克松上台后的美以关系会如何发展呢？拉宾对此充满信心。

4 以美关系的春天

尼克松坐上了总统宝座，拉宾自然高兴，因为尼克松上台就意味着一个以美关系春天的到来。果然，尼克松上台后，很快便开始实现他的诺言。他让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顾问基辛格具体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尼克松认为他适合处理这方面的事务，拉宾也认为与基辛格一起好办事。

他们首先讨论了“六天战争”以后以色列和邻国的边界问题。尽管双方的观点有分歧，但美国政府决定推动中东和平的进程还是拉开了序幕，美国同四大国共同合作，也希望以色列拿出些具体设想。以色列外长埃班是1969年2月上台的梅厄夫人新内阁中的原任人员，拉宾具体安排他的访美事宜。不过，梅厄夫人安排埃班访美的目的是联络感情，并没有具体讨论问题的任务。而此时的拉宾，真可谓忧心忡忡，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频繁会晤，他们商谈中东问题，

却不同以色列商量。很明显，他们谈判的结果将强加在以色列的头上。拉宾没有等闲视之，为了争取主动，他开始私下活动。一方面，他向美国提出抗议；另一方面，他又密切地注意着事态的发展。通过分析，他认为美国非常害怕这样消耗下去。埃及人打仗的目的表面上看为了重创运河东岸的以军，实际上是苏联人在怂恿埃及人继续打，这样能使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大大增加，中东的发展局势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复仇，激进主义在中东占了上风，巴解组织在约旦站稳了脚跟，利比亚也落到了激进的卡扎菲手中，连保守亲美的沙特也出现了局势不稳的状况，而这一切，都与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对峙有关。因此，美国人极其不安，这场消耗战时间越长，坚决支持阿拉伯人反以斗争的苏联影响就会越大，而向以色列提供大量飞机大炮的美国的影响则会逐步缩小。拉宾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因为西斯科的一席话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对以色列承担的义务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以色列所作的一切。让我们坦率地告诉你，如果我们的友谊仅仅导致美国被中东世界所抛弃的后果的话，那将是美国政策的一个灾难的挫折。我们必须致力于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因为它是惟一能捍卫我们在那个地区全局利益的途径。”拉宾清楚西斯科的话，是美国核心领导层的真心话。

然而，即使美国用切断武器供应的方法强制以色列停止消耗战，同样加强不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埃及肯定要继续打下去，整个阿拉伯世界将为纳赛尔欢呼，苏联的影响将会更大，美苏谈判时美国的地位将会更不利。因此，拉宾在1969年9月19日写报告要求梅厄政府放开手脚大打，并用飞机轰炸埃及腹地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损纳赛尔的地位和削弱苏联的影响，才会使以美关系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不出所料，以色列加强攻势已使美国深信，以色列是自己在中东摆脱不利地位的重要工具。很快，切断武器供应的方法停止了，第一批“鬼怪式”飞机在9月底飞抵以色列。1970年1月7日，以色列飞机袭击了埃及腹地。也就是这一天，美以关系出现转折。当苏联要求美国让以色列停止这种空袭时，尼克松当局觉得自己腰杆硬了起来。尼克松在对议会讲演中甚至不提中东和罗杰斯计划，整个美国当局亲以倾向明显，舆论界亲以的气氛特浓，尼克松的心腹——司法部长米切尔甚至公开发表亲以言论。

这一切，是与拉宾的仔细观察和分析以及卓有成效的工作分不开的。

5 停火，是为了下一次开火

在以色列强有力的攻势下，纳赛尔支持不住了。1970年1月底，纳赛尔秘密飞往莫斯科求援。1月31日，苏联强烈要求美国迫使以色列停火，否则，将向埃及提供更先进的武器。此时的尼克松暗自高兴，他警告苏联人不可蛮干。而拉宾更是高兴地告诉梅厄夫人：“我们已大大地改善了在美国的地位，进一步改善则取决于我们对埃及心脏继续空袭的结果。”

美国当局无意制止这种空袭，并且在已提供的50架“鬼怪式”战斗机的基础上，决定再向以色列提供24架“鬼怪式”和24架“空中之鹰”

式战斗机，尼克松将在 30 天内决定是否出售这 48 架飞机。苏联人知道，这 30 天是看他们的反应。拉宾对此却极大不满，两个超级大国的较量，以色列只是一个砝码，也随时有可能成为牺牲品。拉宾愿意看到的结果是：无论何种情况下，48 架飞机按时飞往以色列。于是，他派助手去基辛格的助手黑格将军处摸底。黑格要求以方等待，不要对尼克松总统施加压力。

“不要施加压力”？拉宾听了，计上心来，他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他依次走访众议院少数党领导人福特、参议员戈德华特和杰克逊、工会领袖米尼等人，向他们倾诉自己的不满。这些著名的亲以派人士果然发怒了，开始向尼克松发难。

这一招果然有效，3 月 12 日基辛格紧急邀请他去白宫参加一个听证会。听证会上，基辛格告诉拉宾，尼克松决定以一揽子计划中的三个步骤来处理向以提供武器问题。第一步由政府宣布暂停对以的武器供应，但同时申明如果军备失衡将恢复对以的供应。第二步即美国改变以前那种卖一批武器要申请和批准一次的做法，改为按照保持中东军备平衡的原则向以色列补充其报废的武器。第三步即通过尼克松给梅厄夫人的信件，承担保证以色列安全的义务并提供以所需的武器。没等拉宾作出反应，基辛格又向他通告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一个新建议：以、埃实行不加宣扬的停火；相互停止空袭；以方不回击。拉宾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明明埃及人没有能力对以空袭，却要“相互”停止，而且还要以色列打不还手。拉宾想：基辛格谈苏联人的建议，莫非想把停火与武器挂起钩来？他一下子警觉了，他警告基辛格：美国人正在干蠢事，因为苏联给了埃及先进的防空导弹，正需要时间把它们安装和部署起来。基辛格显然为难了，因为尼克松受到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很大的压力。后来，基辛格请拉宾把一封尼克松的亲笔信转交给梅厄夫人，请求以色列同意为期 60 天的停火。3 月 18 日，耶路撒冷的消息说：大批苏联人已经到达埃及操纵防守开罗的萨姆—3 型防空导弹。拉宾很愤怒，当晚便和基辛格去见尼克松。

晚上的会见只有尼克松、基辛格、拉宾三人。尼克松说：“请不要对美国承担对以色列的责任及向她提供防务所需武器一事有任何怀疑。但是，我们迄今为止采用的办事程序并不好。每当你们提出武器要求，尤其是飞机要求时，各种新闻媒介马上发出一片鼓噪、评论声，并且人人都瞪圆了眼睛，观察着政府的决定，这往往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另外某些行政部门也激烈反对在目前的状况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我不指明它们是哪些部门，但请相信它们在尽力说服我。你可以确信我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但我将通过其他方式做到这一点。以色列需要武器时可通过基辛格来找我，我会找到克服官僚恶习的方法的。”拉宾听了这番话，茫然若失。从目前情况看，不要说什么安全承诺了，就是 48 架飞机的到位都成问题。总统的保证不是没有过，但总出问题，让人把以色列的政治让步联系起来。他想到自己的责任和梅厄夫人的厚望就感到不寒而栗。他坦陈了自己的观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减少，苏联人和阿拉伯人就会得寸进尺。他最后恳求说：“总统先生，我再次诚恳地呼吁您，作为惟一信任、同情和理解我们以色列的人，给我们所需的武器吧。”拉宾的这番乞哀求怜的话，竟一时使尼克松陷于不知说什么好

的困境，房间内长达两分钟没有什么声音。会谈结束后，拉宾把谈话内容通知了梅厄夫人，梅厄夫人指示拉宾拒绝接受建议。基辛格不但没有沮丧的神情，反而高兴，因为说到底以色列人拒绝的是苏联人的建议。

3月底，埃及各大城市周围均已部署好了萨姆导弹网，以色列只得停止了对埃及腹地的空袭。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打击，今后自抬身价的本钱没有了。4月7日，以军情报部长雅里夫心急如焚地飞到华盛顿求援，但西斯科却用美国不允许以色列处于军备劣势的空话来敷衍他。尽管拉宾发了火，梅厄夫人有给尼克松的信，但一样没有起作用。美国人正忙于越南和柬埔寨的战争中，他们并不在意苏联飞行员已开始飞行在埃及领空的事实。

从骨子里说，美国是不甘退出舞台的，他们是很想教训苏联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的。在埃班5月访美时，尼克松当着埃班和拉宾的面说：“每当我听到你们深入他们腹地揍他们时，我就感到满足。我们愿意帮助你们，而你们必须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我们不能从其他地方搞到石油，我们必须站在中东稳健的国家一边。我们将在军事上支持你们，但不能允许军备竞赛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我们得做一些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什么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呢？原来是指罗杰斯6月19日提出的“停止射击，开始谈判”的一揽子计划。埃及、约旦、以色列三国，必须执行联合国242号决议，相互承认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同时以色列要撤到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在7月1日至10月1日期间相互停火。美方表示，以色列能不能得到武器，要看它执行决议的态度。

拉宾对此极为沮丧，他完全可以跳起来骂美国人的娘，但因为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只好克制住自己。6月29日夜，苏联埃萨姆导弹群移到了运河以西30公里处，由埃及人操纵的一些导弹连则越过了30公里这条红线靠近了运河区。这意味着挑战，但糟糕的是以色列攻击导弹连的行动失败了，一些“鬼怪式”飞机被埃及人打了下来。美国人对此提出了严重警告，但苏联人则我行我素，嗤之以鼻。

随后，为执行停火决议，美国、苏联、中东三国、以色列都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对抗。怒气冲天的梅厄夫人与西斯科展开了一番论争。但争归争，决议还是要通过的。决议的通过，导致了以色列联合政府的解体，贝京领着他的党的部长们，全部退出了内阁政府。

闹归闹，停火终于在8月7日午夜开始生效了。按以色列人自嘲的话说，停火是为了下一次开火。8月9日，拉宾回国参加内阁会议，他想弄清楚内阁是否准备按美国编好的程序进入和谈，但一直到散会他也不要要领。苦恼中达扬的三言两语为他解开了疑团。达扬分析道：“梅厄夫人不能从以色列议会8月4日声明的立场上后退，与此同时停火却生效了。现在美国人惟一的出路是建议雅林把阿方同意的方案搁置一边，而在242号决议基础上重新开始他的使命。因此，以色列最好不要公开批评雅林的信件。”拉宾忙返回美国和西斯科谈达扬的建议，刚要去白宫时达扬的电话来了，说是埃及人正把导弹开进禁区内。拉宾把情况一并通知了西斯科，西斯科不但不恼，反而懒洋洋地问：“真有此事吗？这可麻烦了。早先我们在停火前提出过派U—2型飞机去核查停火的提

议，你们拒绝了，你们的将军还威胁说要打下我们的飞机。这下可好了，我们手头上什么证据也没有，怎么去跟埃及人说呢？我总不能你说什么我信什么吧！”拉宾要求美国公开予以谴责，西斯科也一笑了之。不过，他以为达扬的建议可行。

拉宾又去找了基辛格和尼克松，梅厄夫人也来了，但毫无结果，尼克松他们仍然用空话打发。尼克松的态度很清楚：美国公众渴望和平，你们总得让我向他们表明我能带来和平。

直到9月下旬，美国人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其原因是约旦出现了危机。

6 约旦危机

9月18日晚上8点多，拉宾正陪同来美国访问的梅厄夫人在纽约希尔顿大饭店向三千多名美国犹太人发表讲话。突然，来人把拉宾叫出去，到一个电话亭里听电话。原来，电话是基辛格从华盛顿打来的。他告诉拉宾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约旦侯赛因国王来电，要求我们把他的请求转达给你，请你们派空军攻击约旦北部的叙利亚人。我需要你们给一个快的答复。”

原来，约旦遭到了叙利亚大规模的进攻，招架不住的侯赛因国王，不得不向以色列求援，以防止自己的垮台。叙利亚之所以进攻约旦，是因巴解而引起的，“六天战争”之后，大批的巴勒斯坦人逃到了约旦，汇入到数十万难民之中。侯赛因最初是同情和支持巴解在约旦发展的，他的许多军官和官员都是巴勒斯坦人，他需要他们的支持和效忠，况且巴解是要打击抢占土地的以色列人。但两年之后他就不安了，因为他的影响和王位受到了威胁。驻在约旦的巴解武装力量常派突击队在约、以边境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或从约旦渗透到以色列境内发动袭击。而以色列则以打击约旦境内目标进行报复。时间一长，贝都因将军们发出了抱怨和警告，但国王压住了他们的不满。到1970年8、9月间，事情恶化了，“法塔赫”和人民阵线已控制了不少地盘，“法塔赫”还给自己的汽车发放巴解牌号；巴解战士已接管了安曼一部分警察的职务，俨然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巴解负责人公开把安曼比作“阿拉伯人的河内”。阿拉法特宣称：“只要侯赛因国王让我们行动自由，他就可以稳坐王位。”随即又发生了枪击王室成员座车的事件。侯赛因大惊，这时，掌管着最精锐的坦克部队的贝都因将军们把国王围了起来，迫使他与巴解摊牌。侯赛因还在犹豫间，哈巴什的“人阵战士”又一口气在安曼附近的机场上炸毁了3架劫持来的外国班机。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侯赛因国王怒吼起来：“这是阿拉伯人的耻辱！”贝都因将军们立即对巴解发动猛攻，这就爆发了“黑九月事件”。

贝都因坦克部队的进攻和巴解战士的抵抗都十分残酷的，但巴解的轻武器是无法与约军的坦克大炮对攻的。于是，一座座难民营失陷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倒在了血泊中。在阿拉法特的呼救声中，叙利亚的装甲部队和空军部队越过叙、约边界，对约旦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招架不住的侯赛因只得在绝望中通过美国请求以军来解围，以防止他的政权垮台。

该是拉宾拿架子的的时候了，他对基辛格嘲讽地说：“美国像个邮差似地向我们传递这个信息，真让我吃惊。在我了解你们政府真实的想法之前我不会把这个请求转告梅厄夫人的，你们是不是要建议我们去救约旦人？”基辛格听了腔调都变了：“你可真让我为难了，现在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但赌气归赌气，事关大局，拉宾岂可儿戏。他挂上电话后，忙把梅厄夫人从酒会上请了出来，并告诉了这一消息。两人稍议，便电话把这一事态通知了代总理伊加尔·阿隆，征求他的意见。之后，梅厄夫人和达扬也通了话。阿隆同意出兵，达扬却相反，他担心苏联人会借机从运河方向进行干涉。核心人物意见不一，拉宾却急了，他建立立即派飞机侦察战区情况，并尽量与约军司令部联系，以便应急。

不久，基辛格又打来电话，他一直想隐瞒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只是说：“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和支持约旦的请求。”一副老大的口吻。拉宾看准后，穷追不舍：“你们是不是建议由以色列干这件事情。”“是的。”基辛格无可奈何地承认。

事情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变成了美国人求以色列，整个气氛不一样了。基辛格派来了专机接梅厄夫人和拉宾，到了华盛顿，拉宾陪着梅厄夫人驶往肯尼迪机场，然后梅厄夫人乘自己的专机回以色列。随后，拉宾也乘基辛格派来的专机到达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又坐最豪华的专车回到家中。这时已是凌晨3点半了，心满意足的拉宾这才给基辛格打电话。交谈中，他感到基辛格旁边还有一人，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尼克松。

以色列军方早就作好了一切准备，当拉宾接到通知时，他像个精明的商人，马上与基辛格、西斯科谈起价来，并要求以备忘录的形式存下来。对于武器要求，美国完全满足需要，但对于苏联的威胁提供“保护伞”时，基辛格变得吞吞吐吐了，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要冒核冲突的风险。

以色列并没有直接出兵对攻叙利亚，而是以策应的方式来援助约军。以军大量集结戈兰高地，一个装甲旅的坦克纵队疾驰掀起的尘埃在大马士革一目了然。与此同时，以军战机也呼啸着在叙利亚领空作示威飞行。叙军的进攻马上弱下来。美军第六舰队也虎视眈眈。叙军万不得已，在22日下午6时撤回了本土，约旦危机就这样结束了。

由于以色列在约旦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对美以关系的加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是美以关系及美国中东外交的转折点。一方面，使美国认识了以色列的价值和盟友的信赖程度。另一方面，美国认识到与苏联打交道决不能一味迁就。这就使美国的外交天平倾向了以色列。9月25日，基辛格代表总统给拉宾打电话，并请转告梅厄夫人：“总统永远不会忘记以色列在防止约旦局势恶化以及粉碎推翻约旦政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总统说美国对在拥有像以色列这样的盟友深感荣幸，美国在未来的事态发展中将会充分考虑这一点。”

这天晚上，拉宾心情高兴，利扬和孩子已入睡了，拉宾还在书房饮酒，毫无倦意。他很清楚，美以关系将出现新的一页，但美国并不是会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美国有自己的利益，美国的全球及中东战略要求尼克松尽可能把阿拉伯世界拉到自己一边来，因此，美国会继续推进其中东和平进程，至少会去探索一条和解途径。

7 选择和平

由于以色列策应，叙约之间发生的战斗暂时平息了。但侯赛因心中之气难以消除，他扬言，适当时机将在几个小时之内消灭阿拉法特。同时，阿拉法特也说，他们打垮侯赛因也只要 7 小时。这时，纳赛尔总统出面调停了，他希望双方放弃战争和平共存。由于纳赛尔的努力，一个由 10 位阿拉伯总统和国王参加的首脑会议终于在开罗召开了。8 天的会晤中，充满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切矛盾，纳赛尔却充当了调解的角色。那些准备拼个你死我活的国家，最终还是以阿拉伯特有的方式，拥抱亲吻了。纳赛尔作为调停人，侯赛因和阿拉法特之间也达成了协议，停火为友。

由于长期致力于中东和平和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纳赛尔总统心力交瘁，就在阿拉伯兄弟正需要他带领大家继续前进之际，他却于 1970 年 9 月 28 日猝然去世了。一时间，阿拉伯世界震惊了，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这位伟人的最崇高的敬意。

纳赛尔去世后，他的助手安瓦尔·萨达特接任了总统职务。人们对这位一副农民相的新总统所知甚少，就连以色列的摩萨德这样一流的情报机构也未能向内阁提供多少他的背景材料。美、以等舆论界及政府要人甚至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味道的评论。对于这一切，萨达特都忍受了。但不久，他就让世人明白：他是一位在中东政治舞台上的超级明星，他那纵横捭阖的手法和极为大胆的举动使那些曾笑过他的人深感自惭形秽。

到 12 月，以、埃停火 90 天到期，但又很自然地延长到次年的 3 月 6 日。在 1971 年 1 月，萨达特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他通过一位信任的将军向美国人传达了一个信息：埃及愿意重开苏伊士运河国际水道，条件是以军从运河东岸后撤 20 公里。美国政府认为这一建议很有建设性，西斯科把这一建议通报了拉宾。拉宾知道，这一建议内容以前达扬也提出过，但现在再提，确有新的内容，同时也确实值得一谈。但他了解到：美国从其本身利益来说，不愿这么做；但从整个中东和平进程来说，它倒赞成以色列和埃及谈判。因为：一、这可以减轻雅林和谈停滞对以的压力；二、运河问题谈成后，以、埃单独媾和的事情就好办了。从国内的情况看，也倾向于和谈。然而，联合国特使雅林却突然扔出一颗政治炸弹。2 月 8 日，雅林向以、埃双方提出了非常简短和明确的问题。于他提出的和平方案，他不希望双方长篇大论地诉委屈讲条件，只要求双方立即回答“愿意”或“不愿意”。一时间，国际焦点集中在以、埃两国身上，尤其是以色列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拉宾恼怒地向美国官员大发雅林已经严重越权的牢骚，但美国人总是不紧不慢的那句话：你们千万不能首先表示反对。

双方通过多种途径的协商，愿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以色列内阁还搞了一个决议。决议赞成和埃及和谈，然后强调了两国在边界和难民问题上还有分歧。其中的阴谋逃不脱罗杰斯和西斯科的眼睛，他们告诫拉宾：“美国政府认为，以色列的答复是推诿性的。”拉宾为此大叫：“我们的答复是认真和负责的。”同时，他还指责他们违背了尼克松不压以色列撤军及解决难民问题的诺言。见拉宾如此，罗杰斯、西斯科也

动了肝火，他们一口咬定埃及是积极的，以色列是消极的。在争吵中，罗杰斯愤怒地高喊：“你们被迫用让步来谋求和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其实，决议一定，拉宾也认为不行，深感失望。但西斯科和基辛格没有放过他。西斯科认为这种作法只会再次败坏美国的声誉，且打击了开罗和安曼那些想单独与以媾和的人的威信。西斯科不无忧伤地说：“20年来，你们不知和平为何物。如果你们再这样任性干下去，以色列就永远不会有和平的那一天。”基辛格则更干脆地说：“如果美国切断军援，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到那时还会坚持你们自己的立场吗？”尼克松也表了态，他对来美访问的扎尔曼·夏扎尔总统说：“你们应当记住，你们的军备输送渠道是有可能干涸的。只要我还在总统之位上就不会这样，但我不能总是总统。”

面对这种局势，反应敏捷的萨达特立刻火上加油，他指示埃及宣布，停火期限到3月6日后不再延长了。这样一来美国急了，决定敲打一下像顽石般的以色列人。于是当埃班访美时，基辛格毫不客气地对他采取了居高临下的语言：“我尊敬的先生，您能不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您的洗耳恭听的朋友们。”话语中不无讥讽之意。“你们真正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们是否准备撤到国际边界来换取和平？是，还是不？假如你们不想撤到国际边界，那么你们打算后撤多远？”基辛格越说火气越大，拉开嗓门喊：“老实说，没有人了解你们，也没有人知道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人们现在的确认为你们尽力避免与对手达成和解，这样你们就可以赖在占领的土地上不走了！”最后，基辛格迫埃班回答，埃班只好敷衍，因为梅厄夫人嘱咐他，尽量避免正面回答，万不得已时就说7到10天内答复。当他后来合盘端出后，气得基辛格跳起来：“你们究竟打算与美国保持一种什么关系？你们要求与我们保持一种紧密的、坦率的和亲近的关系，但你们却不告诉我们，你们在想什么或要什么。要知道，亲近只能建立在相互坦诚的基础上。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至少把你们的全面或部分解决方案告诉我们。”3月20日，罗杰斯又同样训了埃班一顿。

见美国人上下齐心，埃班头一次与拉宾取得一致，决定由埃班写报告给内阁，说明对埃及建议予以回复的必要性。但内阁一点不急，没予理睬。这时，美国上下对以色列一片指责声，就连一些犹太人领袖也有同感。拉宾却无能为力。他认为以沉默对抗的方法是很笨拙的，起码可以提一个反建议，这样可以求得主动。

当最后内阁把答复端出来时，拉宾哭笑不得。基辛格看完后，重重地一摔，厌恶地说：“这是什么东西？”答复的内容有：运河要对以色列开放；埃及保证永不开火；和解后以军后撤一点；运河开通后埃军不得入运河区；埃及减少其在运河西岸驻军；签约15天后埃及释放以色列俘虏……完全是一副蛮横无理的嘴脸。拉宾自己也这么认为。在拉宾与基辛格交往的较长时间内，基辛格从来还没有发这么大的火。拉宾自己明白，以色列政府太过分了。拉宾看基辛格一直在生气，便想缓和一下气氛，于是轻声地问：“我可以给您留一份文件的副本吗？”基辛格气哼哼地说：“你高兴留多少就留多少，这跟我没关系！”无计可施的拉宾，只好如实向梅厄夫人汇报；但梅厄夫人似乎全无感觉，毫不在意地命令拉宾：“把它交给西斯科！”

5月，为加速美国导演的中东和平进程，罗杰斯和西斯科等要员对埃及等中东国家进行了访问。在访问过程中，西斯科对达扬印象很好。同时他对萨达特的印象也很好，他告诉拉宾：“我发现萨达特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他想与以色列达成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必须是他能够向阿拉伯国家作出解释并证明是正当的。”这话引起拉宾注意，由此看来他比纳赛尔的胆略显得更突出。9月，西斯科告诉拉宾，他已把达扬撤得更远一点的表态转告了埃及。拉宾听为一惊，这事要是梅厄夫人知道了，一定会大吵大闹一番。10月2日，他找基辛格单独谈了这件事。这一天，基辛格情绪不错，他指出若是没有美苏两家点头中东是不会有和解的，他承认自己很怕失败。他还说：“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包括处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我已树立了能达到目的声誉。我决不会去处理那些显然不能成功的事情。”这几句话，对拉宾来说很有用，他深深地记在心里。后来他当了总理，就是遵循这一原则去处理棘手的事情的，效果很好，为树立自己的威信确实起了作用。

扪心自问，拉宾与内阁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不赞成以色列持僵硬的态度，他赞成和谈。当基辛格追问他以色列到底可以后撤多远时，他说在吉迪和米特拉山口以西保持在以色列手中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可以后撤30公里。事后，拉宾向梅厄夫人作了汇报，并承认自己越了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拉宾肯定地说了以色列惟一的选择只有和平。梅厄夫人给予默许，但一个星期以后却又来电批评。拉宾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轻率举动，差一点弄得梅厄夫人下不了台。

就在12月1日梅厄夫人访美时，基辛格突然打出了拉宾提供的炸弹。尽管拉宾在此之前一再强调梅厄夫人不赞成自己的主张，但基辛格还是问她：“您对拉宾的部分解决方案有何看法？”梅厄夫人很恼怒地停了两分钟，然后克制地说：“那并不完全代表以色列的立场。有两点我们必须坚持：埃及军队不能进入我们撤离的西奈地区；我们只能撤到西奈山口的西端。”基辛格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像犯了傻似地追问：“大使先生提出来的想法能否构成解决问题的基础呢？”拉宾气得咬牙切齿，基辛格啊，你到底想干什么？是让我当众出丑还是想让梅厄夫人再骂我越权？梅厄夫人已经从只撤几公里的立场上大大后退了，难道你还不肯罢休？但梅厄夫人却给了他一个惊人的回答：“埃及平民技术人员和警察可以越过运河进入东岸地区。”基辛格听了满意地笑了，拉宾也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1971年12月2日，尼克松举行圆桌会议，梅厄夫人、拉宾等出席了会议。为了迫使以色列作出更大的让步，美国实施了大国强权政治。

8 强权政治

尼克松耍了一个手腕，他许诺满足以色列最近提出的“鬼怪式”飞机的要求，接着就转到政治话题上来。他表示了对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的不安，待来年5月美苏首脑会晤中将和苏联人谈论这个问题。他指定基辛格与梅厄夫人共同协调美以立场，以便到时有个对付苏联的统一立场。拉宾对此十分不快，难道梅厄夫人就是为了到华盛顿来听基辛格的几句话吗？好在梅厄夫人久经沙场，她忍下这口气，却又抓住机会，

严肃地指出：“以色列认为罗杰斯计划已经寿终正寝，最好不要再用了。以色列将会毫无顾忌地表述自己的看法。如果无视以色列的利益，美苏就是达成交易也是白搭。”老练的尼克松很会自己找台阶，马上表示同意梅厄夫人的看法。

基辛格与梅厄夫人就以埃部分和解方案于12月10日达成共识：以色列撤退到西奈山口的西端地区；停火期再延长一年半到两年；埃及的技术人员及“穿制服的部队”可以在方案允许的范围内越过运河。除此以外，美以还达成以下谅解：美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迫使以色列按照罗杰斯计划去达成部分或全面和解的协议；授权西斯科和拉宾探索以埃对话的可能性；美国应在1972年和1973年计划供应的基础上再向以色列提供额外的“鬼怪式”和“空中之鹰”式飞机。至此，大家方感到松了一口气，尤其是美以谈判人员，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梅厄夫人尽管有过不高兴，但还是满意地回去了。以色列在大国强权政治的压制下，尽管挽回了面子，但还是作出了撤退的让步，美国人也打开了军火供应的大门，双方皆大欢喜。

事情解决了，基辛格对拉宾说：“苏联人正忙于印巴战争，出于全球战略，美国并不急于与苏联达成中东问题的谅解。”他还认为：埃及人不会在1972年重开中东战争，因为它需要苏联支持。中东形势一好转，美国人立即放慢了为以色列提供飞机的速度，由原来的每月两架改为每月一架了。

但梅厄夫人对领土问题的敏感神经并没有半点放松。1972年1月间，基辛格在与拉宾的一次例行会谈中，说到了自己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会谈，他以打招呼的形式告诉苏联大使：以色列坚持在前国际边界之外的存在，但具体范围有待以色列与有关国家谈判解决。拉宾以电讯的形式发回了国内，梅厄夫人很快回电：“解释一下基辛格在西奈地区国际边界之外存在是什么意思？”拉宾是很有主见的，他对自己政府真正意图是什么也不清楚，所以他回电：“我们的立场是不明确的。请授权政府发言人公开声明以色列并无意吞并西奈地区任何部分或将其置于以色列的管辖之下，它只希望控制那些地区。此外，我本人也要求澄清这方面的立场。”见拉宾也不了解自己的思想，梅厄夫人很恼火，她回电训示道：“以色列的政策是致力于对埃以边界作相当大的变动。它意味着主权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一个以色列的存在。我们不使用‘吞并’一词，因为它具有消极的含义。”拉宾却不喜欢这种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作法，他要求总理明确地告诉他以色列到底想吞并哪些地区。梅厄夫人告诉他，想吞并的地区包括加沙地带、沙姆沙伊赫以及连接以色列和沙姆沙伊赫的陆上通道。拉宾后来只好对基辛格说：“以色列要求边界变动，你可以告诉多勃雷宁。”基辛格毫不犹豫地说：“苏联根本不会同意边界变动，你可以跟总理说清楚。”此话传到总理府，梅厄夫人一下子变得忧心忡忡，她忧郁地告诉拉宾，尼克松曾当众同意以对边界进行变动，但拉宾怎么也想不起来。

年老了，梅厄夫人已显得不堪一击，基辛格此时玩起了心理战攻势。2月7日，他以警告的口气对达扬说：“我很难说尼克松总统在与勃列日涅夫的首脑会晤中会达成什么共识。”3月7日，基辛格神秘地告诉拉宾，苏联人提了一揽子交易：苏联人撤出埃及，以色列人撤回到6月4日线

上。但后来基辛格又对拉宾说他不该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其实是北越军队向美军发动了凶猛的攻势，挨打的美国人宣布取消莫斯科会晤。局势稍好后，基辛格又飞往莫斯科为会晤作准备。在整个美苏会晤中，作为对苏联抑制北越的回报，美国不可避免地会牺牲一些以色列的利益。这就是大国政治。梅厄夫人被搅得寝食不安，香烟消耗量上升到了每天两包半，她怕美国人在会谈中把以色列给出卖了。

但后来的美苏会谈并没有损害多少以色列人的利益，拉宾惊喜地发现，除了 242 号文件语言外，苏联人竟然同意了可对边界进行美苏双方同意的变动。双方的分歧是：苏联不同意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与阿拉伯国家直接谈判。而美国人则不同意按有关联大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份纪要还将作为今后美苏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对此，拉宾是十分高兴的，梅厄夫人那边更是喜形于色。但并不是美国人在实践维护以色列利益的诺言，而是尼克松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长达三个小时“狂轰”中给激怒了，他历来吃软不吃硬，还在当副总统时，就和赫鲁晓夫进行过激烈的“厨房辩论”，因此，在苏方的强硬态度面前，他也变得强硬起来，直把苏联人顶了回去，才有了会晤纪要的结果。

但埃及萨达特不允许苏美两国决定埃及的命运。7月11日，他决然宣布把苏联军事专家驱逐出埃及。这是一桩举世震惊的事，搞得苏联人乱了手脚，就连美国人也十分惊讶。随后，以色列的日子好过了。

拉宾的大使任职到 1973 年 3 月 10 日期满，尼克松在当年 1 月份的一次送别性质的会上表示，希望 2 月底来访的梅厄夫人能带些新建议来。可糟糕的是以色列在梅厄夫人访美前夕，又在西奈上空击落了一架利比亚的民用客机。因此，1973 年 2 月 28 日在梅厄夫人访美的第一天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鲁什以及国防部长就让梅厄夫人碰了一鼻子灰。美国人三管齐下，使得梅厄夫人情绪低落，她对拉宾说：“总统若是这样，我看不如早日回去。”拉宾劝其忍一下，不妨搞个新的建议。但梅厄夫人想不出什么新内容，拉宾只好自己搞了一个提纲去见基辛格。晚上 7 点 30 分，基辛格带着洞若观火般的神情会见了拉宾，他以不加掩饰的快意说：“我想总理夫人一定度过了艰难和令人沮丧的一天。”他好像是躲在暗处偷看似的，一切都知道。拉宾不无愤怒地说：“你把我们总理请来仅仅是为了让她空着手回去！”见拉宾动怒了，基辛格才说起 1968 年 3 月的会谈，他当时就提醒以色列应重视实际安全而不是条文。他谈到他与埃及外长伊斯梅尔在“安全对主权”原则上达成了共识。这个原则意味着以色列必须接受埃及对整个西奈拥有主权的事实，而埃及则接受以色列在西奈某些地区保卫安全的军事存在状况。基辛格说，只要以色列接受这一原则，飞机之类的事好说。最后，梅厄夫人在拉宾的陈述下，接受了这一美、埃共同制定的原则。等手下人把戏演够了，尼克松才登场，他说了一通热情支持以色列之类的话来完成一个大善人的角色。

忙于紧张谈判的拉宾，忘记了当天是自己的生日，当尼克松拿出一件铭刻有自己名字的纪念品送给他作生日礼物时，他才如梦初醒。尼克松在梅厄夫人面前大赞拉宾能干，问拉宾回去后给个什么职位。梅厄夫人故作玄虚地说：“那要看他的表现如何了。”尼克松说：“那好啊，要是你们不想要他的话，把他留在这里好了，我愿意用他！”这是拉宾

以大使身份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谈，5年来他头一次感到轻松，仿佛全身神经都放松了似的。

9 耶路撒冷，美国犹太人的眷恋

美国与犹太人之间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美国独立以前，备受歧视的欧洲犹太人便开始移居于此。美国独立时，大约已有二三千犹太人。美国内战时期，犹太移民已达15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增加到300万。目前，美国犹太人约有600万，约占美国人口的3%，占犹太人总数的38%。

美国犹太人从早期开始，便依靠自己的智慧，艰苦奋斗，使其势力渗透到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工商业、娱乐界、宣传界等，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已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具影响的犹太社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犹太人又有大批迁往美国，科教、文化、法律、经济等许多部门已成为犹太人的传统领地。在获得诺贝尔奖美国人中有28%是犹太人；把美国带入核时代的是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泰勒、纽曼等；美国东部名牌大学的教员中30%是犹太人；美国宇航工业的专家中，犹太人的比例最高时曾达60%；70年代，美国每5名律师中就有一名犹太人，司法部里犹太律师的比例则高达30%。70年代末，犹太人已掌握着美国钢铁工业的25%，皮毛工业的90%，粮食加工业的60%，屠宰场、餐馆、酒吧、娱乐场所的52%以及电影业的40%，并控制着许多宣传和新闻工具。好莱坞八大公司之一的华纳公司就是犹太人经营的。据1986年的统计，在美国最具实力的企业家中，近1/4是犹太人。

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也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仅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犹太人就有：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司法部长里维、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伯恩斯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等人。担任州长、市长和国会议员的犹太人也不少。美国第93届国会里，犹太议员有15名；第94届增加到23人；到第100届时已达到36名。这些人是最能有力地保护以色列的利益，他们同时也是维系美以特殊关系的监护人。美国犹太人的力量还体现在为总统竞选人提供巨额的资金和至关重要的选票。到1974年，犹太人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候选人分别提供了60%和40%的竞选资金。在支持卡特竞选的私人捐款者中，有一半是犹太人。身为犹太人的拉宾，来到美国后自然不会放弃同各阶层犹太人的接触，以寻求他们的支持。

由于历史的原因，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国成立之前，犹太人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为建立自己真正的家园，他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迁往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他们为建立自己的家园——以色列国，可以说是战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在以色列国成立以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又纷纷迁往以色列，回归自己的家园。像在美国的犹太人，虽然没有迁往以色列，但他们占住美国社会各个重要的部门，心向着以色列。这样，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国，就形成了一股支持以色列的力量。而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是这样形成的；拉宾在美国的

五年里，经常出入白宫和国会，与美国上层人物交往，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美国社会，了解美国人的生活，不失时机地开展外交工作更加强了美以关系，同时为他以后当上总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十章 第一次当总理

1 埃及的进攻，把拉宾攻上了部长席

在五年的大使生涯中，拉宾自认为无愧于自己的使命和祖国。无论是美以关系的加强，还是为以色列拉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他都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宣传树立以色列形象，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为以色列找支持朋友等方面，他做了非常尽心尽力的工作。

在他任驻美大使期间，梅厄夫人三次说要调他回国任部长，但三次都食言了。原因是没有空位。1973年3月11日，拉宾大使任满回国时，工党领袖们却给了他当头一棒：没有空位，就不可能让他当部长，同时也没有其他适合他的位置，只好暂等一段。对此，拉宾很快便清醒过来，自己尽管过去战功卓著并且驻外成就斐然，但与工党的一些资深元老比，自己算不了什么。到部长这一级，光凭梅厄夫人一句话是上不去的，得干出个样子来，让其他元老看重自己。因此，他打算一切从零开始。

转眼就到了秋天，选举开始了。拉宾以当年“帕尔马契”新兵的劲头开始了为工党拉选票的竞选活动。他奔走于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在新朋老友中搞得风风火火。他的卖力效劳，感动了工党元老，于是他的名字列入了工党候选人的名单上，但只是第20位。这样的排位要当上部长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当国会议员。这时，拉宾的倔劲又来了，他总是从不放弃自己。为工党工作了30多年，50多岁了才捞了个议员，但他并没有灰心。

后来的形势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萨达特总统突然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战争加速了拉宾一步步往上晋升的过程。10月6日早上8点30分，拉宾在家中接到总参的电话，请他下午3点与前任总参谋长去见国防部长达扬。原来埃及人在犹太人的安息日，也是犹太人最神圣的“赎罪日”，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下午2点钟，大街上响起了空袭的警报，3点钟他和其他前总参谋长们已在听达扬述评前线局势。

这一次萨达特与阿萨德用“六天战争”同样的手法回敬了以色列人。尽管以色列人在战前有所察觉，但没有启动战争机器。因为高级将领们不相信阿拉伯人敢于发动战争。在“六天战争”之后，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安全，被打得望风而逃的阿拉伯人，至少要一二十年才能爬得起来，想不到6年后就以同样的手段来回敬以色列人。埃及人的2000门大炮同时开火，炮弹铺天盖地一般飞向以军阵地；200架埃及空军超音速飞机呼啸着越过运河，袭击了以色列阵地。20分钟之内，埃及飞机和炮弹即摧毁了以色列的西奈指挥部、空军指挥部、防空和雷达干扰中心、导弹营、炮台等。90%的预定目标被击中，埃及大获全胜，仅损失了为数不多的飞机。以色列军遭到了严重创伤，军事通讯系统被破坏，以至通讯中断好几天。阵亡将士2550多人，是苏伊士运河战争的10倍，“六天战争”的2.5倍。在战争的头几天，拉宾被叫去陪总参长去前线视察，但后来又被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叫去为国库紧急筹款，拉宾的工作让萨皮尔十分满意，这为以后萨皮尔支持拉宾奠定了基础。

人们从战争的创伤中苏醒过来，郁积在心头的沮丧、悲痛、失望的

情绪汇集为愤怒的指责浪潮，人们要求查明谁应为这次被动挨打负责。于是，在一片指责、揭短和拆台活动中，在议会和党内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与这次战争责任毫无关系的拉宾，开始受到人们的注重。作为争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物，拉宾在党内的地位开始飞快地上升。

12月底的大选对工党是个沉重的打击。工党一下子丢了5个议席，而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却增了13个议席，执政25年的工党根基动摇了。如果梅厄夫人能组成一个团结有威望的班子，工党则可重振雄风。可她感情用事，执意达扬进入内阁。结果使组阁之事一再难产，自己也被掀下了台。

达扬是国防部长，对这次战争的创伤负有重要责任，自然成为人们怨恨的焦点，也成为反对党、新闻界、党内反对派指责的焦点，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达扬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他的同僚、司法部长夏皮尔落井下石，他在议会里煽动说：“你们大家一定很有兴趣知道国防部长在战争爆发时正在忙些什么吧！告诉你们，他正忙着改组飞机工业公司的董事会，从而获得以霍德将军为董事长的多数！”议员们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了，人们狂怒地吼叫着要把达扬从台上拉下来。在这种时候，梅厄夫人的核心内阁仍然是达扬和佩雷斯，工党内外一片哗然。而两人均拒绝入选，弄得老太太下不了台，只好声称要让拉宾出任国防部长。达扬竟不理睬梅厄夫人的激将法，使得梅厄夫人在中央委员会上坚决要求达扬和佩雷斯入阁。这时拉宾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耍了一顿。他恼羞成怒地当众顶梅厄夫人：“我认为选举不是开玩笑。如果我们希望防止内部分裂的话，我们必须严肃地组织内阁。”掌声四起，但结果却是达扬等两人又同意入阁。在3月10日宣布内阁名单时，拉宾被任命为劳工部长。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拉宾即由一名议员坐上了部长的位置，升得真快，但拉宾却觉得职位太低，他的追随者也为之忿忿不平。

但是，拉宾的部长也没当多久。就随本届内阁一块下台了。原因是人们并没有因新内阁组成就不追查战争了，全国要求追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待调查结果出来后，责任全在军队情报部门失职和总参谋长的判断失误，没有启动战争机器，以至惨败；作为政府官员的达扬不应对此负责任，而公众却一致要求他辞职，没有余地。这时，达扬才明白，人们已不再需要他一个“独眼将军”了，这不是有责任或无责任的问题。看到大势已去，达扬毅然地递交了辞呈。

很快，感到众叛亲离和身心交瘁的梅厄夫人也在1974年4月11日向议会宣布了辞职决定，总理的辞职就意味着整个内阁的辞职。于是，拉宾的部长也当不成了。驶不远的旧船，不如沉了新造。拉宾想。

2 当不成部长当总理

梅厄夫人一倒台，便意味着工党要重新排定领袖次序，便意味着要组织新内阁。拉宾尽管从政资历较浅，但政绩不错，因此他信心十足。同时他十分喜欢本·古里安的名言：“凡不相信奇迹的人都不是现实主义者。”拉宾相信奇迹，他当上总参谋长是奇迹，他当驻美大使是奇迹，他当部长也是奇迹。他预感到有奇迹在等待他。

梅厄夫人之后，工党权贵一致认为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是最合

适的总理人选。他资历深，人缘好，遇事冷静果断有威信，只要他点头，总理非他莫属。但他坚持拒绝了总理候选人的提名，这就为觊觎总理宝座的人开辟了竞争的道路。佩雷斯最先出马，他资历不浅，颇具实力；曾是国防部副部长，以后一直担任各种部长职务；有口才有能力，也有一批朋友。但是，拉宾自觉不比他差，自己与佩雷斯比，虽然资历要浅，但战功和政绩比他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奇迹。

这样一来，工党内便出现了两人竞选的局面。佩雷斯经验老道，他为了稳住拉宾，便邀请拉宾共进午餐，并对拉宾说：“最后的结局是我们两人竞争总理职务，让我们从年长的同事那里汲取教训吧，不管谁输了，都应以大丈夫的气概接受结果，并保证忠于取得胜利的人。”拉宾并没有被他的话麻痹，也不愿入选他的内阁，但同意了他的这种君子协定。但后来拉宾就心虚了，因为不是看不看得起佩雷斯的问题，也不是他愿不愿意参加竞选的问题，而是工党中央委员是否愿意推荐他这个初出茅庐的人去当总理的问题。关键时刻，奇迹出现了。

首先是财政部长萨皮尔站出来表态支持拉宾。他的表态至关重要，他有一大批忠实的支持者。他自己不当总理而举荐拉宾，大家认为有他的道理。接着，梅厄夫人也表态支持拉宾。这样，党内的两个实力派人物的力量统一了，形势一下变得对拉宾有利起来。他们俩人举荐拉宾，是因为工党政府需要一个新人来主政，而拉宾符合条件。但佩雷斯的支持者也不弱，在表决前，在民众中很有威信的埃泽尔·魏兹曼披露了拉宾在“六天战争”之前即1967年5月23日的表现，说拉宾是个在紧要关头信心不足的胆小鬼，结论是不宜担当总理重任。但是，人们不相信一个“六天战争”的英雄会是一个胆小鬼。

1974年4月22日的秘密投票表决，结果很玄，拉宾仅以298票对254票的微弱多数战胜了佩雷斯。当不成部长却当上了总理，这便是奇迹。

散会后，鲜花和祝贺潮水般涌来，家中的电话没有停过，支持者纷纷表示庆贺，新闻记者把他和妻子利扬当成焦点人物摆弄到深夜。他在送别几个最亲密的朋友时坦率地承认，他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由一名新议员急速地上升为总理确实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实，真是一个奇迹。

在组阁和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拉宾感到每一件都很棘手。他走路来步履维艰，这是因为工党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总理的担子是沉重的，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新考验。

3 带镣铐的跳舞

拉宾奇迹般当选总理，对他本人来说是个奇迹，对整个以色列领导层来说，则标志着领导权已由早期东欧移民创业者转移到了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下一代人手中。也是这种经历和背景，早期那种近似独裁的统治作风难以为继了，在古里安时代，内阁的大事基本上是他个人的意志；梅厄夫人时代，要改变她个人意志是很难的，她甚至在厨房里决定国家大事，因此有“厨房内阁”之称。但到了拉宾当总理，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切大事得由党内头面人物集体决定，甚至联合政府中其他小党的意见也得尊重。因为，他们都是些有实权的资深领导人。拉宾的组阁工作，

可以说是带镣铐的跳舞。

带给拉宾麻烦的首先是工党多年的合作伙伴——全国宗教党。他们变得保守和右倾，且对与工党联合组阁要价太高，尽管在 10 月份他们加入了拉宾联合政府，但只能使内阁政权更加脆弱。其次是拉宾自己根本无权挑选中意的部长，总是党让谁当部长谁就可以当，拉宾只有接受的份。如拉宾让自己的挚友阿隆当国防部长，但拉菲党坚持要让佩雷斯担任此职，最后，拉宾只好让阿隆担任外交部长。

经过许多的幕后交易和明火执仗的斗争，拉宾终于在 6 月 3 日代表工党向议会提交了内阁名单，议会批准了他的提名，他的政府才开始运转。他为自己的政府规定了内外政策的纲领。对外：把以、阿间的政治谈判继续下去，但要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不能让以色列总是作为美国或阿拉伯方面倡议的响应者，自己也得有新倡议。同时还应继续加强以、美关系，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从美国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枪和钱，只有拥有强大的力量才能使阿拉伯人相信谈判是惟一的出路。此外要继续加强打击国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对内：要医治战争创伤及重振经济。要加快建设速度，防止移民人数的下降。在上述目标中，拉宾认为重要的是使以色列摆脱与阿拉伯邻国的战争状态。在这方面有利的条件是以、埃军队脱离接触的协定已经实施，5 月底以色列又与叙利亚人签定了同样的协定。

拉宾就职不到两个星期，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来访了。尼克松是拉宾的老朋友，在国内，他正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但他的中东政策的成功，无疑是他值得炫耀的外交成就。他想借访问中东之行以改变自己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拉宾准备充分满足他的这一愿望，同时也与他谈一下中东和谈及武器供应问题。

尼克松先访埃及，在埃及时，他受到萨达特组织的 300 万人的欢迎。6 月 16 日，尼克松来到了耶路撒冷，欢迎的人群从机场一直排列到市中心。虽然人数不及埃及，但尼克松知道：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的最隆重的场面。因此，他一再向沿途的人们招手致意，并一再高喊：“谢谢你们！”在专车内，尼克松也掩饰不住高兴地与拉宾说：“他们知道我为以色列作了些什么！”在后来的会谈中，虽然强调了和谈的进程及原则，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因为尼克松已被“水门事件”搅乱了思绪，也无心对以色列的安全作什么承诺了。回国后，尼克松仍然被赶下了台，成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弹劾的总统。对于拉宾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遗憾，因为尼克松毕竟是一位亲以的总统，他给以色列提供的武器和经济援助，要比以前的几任都多得多，他也从来不以强制的手段来迫使以色列按自己画的圈圈办事。

尼克松的这次访问，对拉宾来说是有帮助的，一可以树立他在国民中的形象，二可以让国民看到，拉宾时期美以的安全保障纽带是牢固的。

4 以总理的身份访美

尼克松下台了，新任美国总统福特上了台，这并没有改变美以关系的根本格局。拉宾想借访美之机，一来向福特表示祝贺，二来借此沟通一下双方的观点和感情。

1974年7月10日拉宾以以色列总理的身份携夫人利扬访美，受到美国人隆重的欢迎。

拉宾和福特也是老朋友了，那时，一个是大使，一个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现在，两人的身份都变了。在亲以的态度上，福特一点不比尼克松逊色。会谈是诚挚友好的，一些建议切合实际。拉宾为了进一步把武器供应渠道拓宽，一口气提了三份武器供应清单，一份是急需的短期的，另两份是长期的。福特和基辛格对此都没有明确表态，拉宾的心悬着。

当晚，福特为拉宾举行了国宴招待会。在一通热情洋溢的致词和答词之后，宾主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享用夜宵，并尽兴跳舞。福特是个舞迷，他几乎把利扬包了。拉宾却是个舞盲，曾因此闹过笑话，却不想在此又要出丑了。他本想跟福特夫人解释自己不会跳，但福特夫人却起身来相迎，并爽朗地答应教他。拉宾只得硬着头皮跳，好在后来基辛格为他解了围。

第二天，基辛格送来了福特批准的紧急供应武器清单。拉宾一看，发现大部分要求都批准了，其中包括集束炸弹、武器部件、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大炮等，价值7.5亿美元，将在7个月内运到以色列。拉宾对此十分感谢，并赞成基辛格在10月到中东再次推进以埃和谈。

在以埃达成临时协议问题上，拉宾主要考虑两点。一是以色列能再后撤多远，二是埃及给以色列什么回报。拉宾认为以色列还能再后撤30~50公里，但他希望埃及作出终止交战状态的回报。他手中有两张可供讨价还价的好牌，一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西奈阿布·鲁迪斯油田，另一张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吉迪和米特拉山口。

这一切的落实，都等待着基辛格的中东之行。

5 天马行空的基辛格

拉宾访美归来不久，美国便派基辛格国务卿来到中东，开始了推动以埃谈及中东和平进程的外交活动。基辛格此行，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基辛格在访问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之后，于10月12日到达以色列。基辛格告诉拉宾：阿拉伯国家不急于与以色列达成临时性的和解协议，它们等待着拉巴特首脑会议的讨论结果。而拉宾则不愿等什么拉巴特会议，他想先与埃及单独达成协议。萨达特则对以色列只后撤30~50公里不满意，同时他也不愿放下阿拉伯兄弟走得太远。因此，尽管基辛格在1974年10月至1975年3月间多次进行穿梭外交，以埃单独和谈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1975年3月，以埃双方终于都表示愿意推进和谈的姿态。比如，它们都对基辛格表明了愿意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冲突的诚意，双方都降低了战争宣传的调子，一些挂着外国旗子的以色列轮船通过了苏伊士运河等。在这种情况下，福特让基辛格务必使以埃两国能够单独达成临时和解协议，从而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同时也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于是，基辛格又一次穿梭飞行起来，在拉宾和萨达特这两个愿意成交但又锱铢必较的顾客之间，充当起“诚实的掮客”来。在撮合中，基

辛格发现拉宾这一方更难缠，不要足价钱绝不轻易点头。为使双方能够谈成，基辛格使出浑身解数来往奔波，极力压低以方的要价促其成交。

基辛格穿梭于拉宾与萨达特之间，无异于天马行空。1975年3月，基辛格带了一幅埃及国防部长贾马斯将军标注的西奈地图，向以方提出了埃及的新建议：以军后撤到山口以东、国际边界以西15~20公里的一线；在埃、以两军之间设立一个防止冲突的缓冲区。美国对此持赞赏态度，但以色列却不同意。拉宾、佩雷斯、阿隆组成的谈判班子坚持以军后撤线只能画在山口以东。但他们采取灵活的态度，如果埃及同意结束两国交战状态，以色列可以撤到阿里什——拉斯·穆哈默德一线，即山口以东地区；如果埃及愿同以色列达成部分或全面和解协议的话，以色列愿意把绝大部分及至全部西奈半岛都归还埃及。

萨达特听到此话后沉默半晌，他考虑到阿拉伯兄弟的利益，毅然否定了单独与以媾和的可能性。但他在另一次会谈时又告诉基辛格，如果以色列同意撤到贾马斯线上的话，埃及可以考虑终止埃以交战状态。这可喜坏了基辛格，他一来劲，他的专机便开始频繁地在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来回飞行，他根本不管人们公认的休息时间，他起飞或降落的时间总怪得出奇。这可苦坏了拉宾，他常常在被窝里被叫起来，长谈一夜是常有的事。这样，拉宾的谈判班子被基辛格牵着鼻子走，计划全被打乱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基辛格有着无穷尽的精力，当拉宾等人快睁不开眼睛的时候，他却像刚睡了十多个小时似的，精神抖擞，侃侃而谈。

功夫不负有心人，埃、以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新方案。3月20日，埃及提出的方案含有两种选择，但实际上是要求以军后撤50~70公里，而埃军则前进20~30公里，并且能收回油田。以方的方案是以军撤至山口地区的中部地段，埃军至多可前进到以军撤走前的那条线上。此方案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设在乌姆·哈什瓦山顶的雷达站。在基辛格的压力下，以方又作了些让步：以军撤至山口地区东段；把油田以一块肥地的形式划归埃及；埃及保证不使用武力。萨达特对此表示顶多能忍受两年，过期后埃及将要求收回整个西奈。

天马行空，穿梭折腾的时间一长，又没有实质进展，基辛格烦了，他对拉宾说：“这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挫折，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总统本人如何看待此事。苏联人会为此感到高兴的，他们和阿拉伯人将会要求重开日内瓦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我难保美国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福特很快来信证实了此话，他对和谈没有进展及以色列的态度表示失望。他警告这将影响以美关系，并说他已下令重新研究美国的中东政策。但此话毫无效果，反而激怒了以色列内阁，他们一致要求谈判班子坚持自己的立场。

至3月22日，基辛格的斡旋宣告失败，最痛苦的莫过于基辛格和拉宾。在基辛格的外交生涯中，是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失败的。对于拉宾来说，自己在美国拼搏的成果有可能付之东流，他感到沮丧和痛心。更使他难过的是他与基辛格多年来建立的友情，因对以色列安全的看法不同而受到损害。他动情地对基辛格说：“我充分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充满着危险，这对我本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我对于每一位以色列士兵都像对儿子那样负有责任。你知道，我的儿子是驻守在西奈前线的一位坦克排长，我妹夫在那里指挥着一个坦克营。我清楚仗一打起来

他们可能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但以色列不能按照目前的条件去签订协议。现在我除了肩负起沉重的国家和个人的责任外，无其他路可以选择着走。”基辛格被这番肺腑之言感动了，他哽咽着说不出话，只是用右手轻轻地拍着拉宾的手背。说再见时，基辛格热泪盈眶，拉着拉宾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在场的人都感动了，两位记者竟放声大哭。

基辛格走了，拉宾却不肯离去。他承认自己对基辛格的感情既复杂又深沉。他代表以色列，基辛格代表美国，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时他们谁也不让谁，拍桌子瞪眼睛是常有的事情。但基辛格有这样的本事：他能在挖苦和训斥了你之后还让你喜欢他。他机智、幽默、聪明和博学，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国王、总统和总理被他的手腕、才能和风趣所倾倒。他有个阿拉伯人厌恶透顶的犹太人背景，但阿拉伯的国王埃米尔和总统们却张开双臂欢迎他。他让以色列得到了实惠，又使阿拉伯人认为自己获得了尊严，因此他永远是个受尊敬和受欢迎的人。

基辛格空手而归使福特大为不满，他随后正式宣布要重新估价美国的中东政策并宣布在 1975 年 3 月到 9 月这半年里，美国将拒绝同以色列签订新的军售合同。美以关系似乎进入了最僵的时期，但拉宾及其内阁对此已有应变措施：一是策动美国国内及世界一切可以改变这种局面的力量；另外就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处惊不乱。这也是拉宾做大使时惯用的手腕。这样一来，萨达特首先作出反应，他要求美国作为中介，使埃、以谈判继续下去。福特见有台阶，马上走了下来。于是，他邀请拉宾 6 月 10 日访美，并具体进行讨论。

拉宾访美中，明显感到了华盛顿的不满。原因是 76 名参议员联名写信给福特，要求美国支持以色列，福特对美国犹太人这种赤裸裸的施压极为反感。基辛格在会谈中告诉拉宾，埃及表示出新的灵活性，同意将双方临时协议及以撤军的时限延长。拉宾却直截了当地回复，如没有希望达成一项以埃临时协议的话，以色列就不感兴趣。福特在会谈中却软中带硬，玩弄虚张声势的试探性把戏，想看看以色列能“硬”到什么程度。拉宾一眼中的，他想：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总不至于把刚从埃及挤走的苏联又请回来。于是，他明确告诉福特，要想让以色列回到 1967 年 6 月 4 日线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阿拉伯军队的大规模调动会导致以军的先发制人的进攻，即使是在福特总统所说的日内瓦会议上，以色列的这个立场也不会改变的。

剩下的场面又得基辛格来收拾，他在 6 月 12 日与拉宾会谈中说：“你们坚持控制山口东段使得外交努力无法继续，日内瓦会议已变得势在必行，那时我很难说美国会采取什么立场。”拉宾听他这么一说，也顾不得友谊和面子：“请不要用日内瓦会议吓唬我们，我们不屈从任何压力，我们将反对任何危及我们安全的决议，即使决议是多数票通过的。”会谈在不愉快中结束。

拉宾越想越生气：美国人为什么总要提日内瓦会议呢？他们要怎样才能满意？想到这里，他又来了倔劲，又爬起来去问基辛格。基辛格穿梭于各国好比天马行空，处理起事来真有点高深莫测。他看着拉宾，世故地笑了：“我以前没具体谈过，现在你也不会听到。我希望当决定以色列边界的时间到来之际，我已不再是国务卿了。”访美就这样以失败告终，而且进一步加深了福特等人对以色列政府很顽固的看法。拉宾明白：

这样对以色列没什么好处，美国公众最终也会怀疑以色列占领埃及领土的真正动机。

为了打破僵局，以色列自己开始行动。在众多的建议中，拉宾赞同以军总参的方案，即：以军撤至吉迪山口以北和米特拉山口以南，但控制两山口东面的山坡。这样既满足埃及坚持控制山口东端的要求，又保证以色列不失去对山口通道的控制。对此，基辛格认为可以接受，但福特却不点头，因为这样将要求美国派人接管以色列在山口地的预警雷达站，患上了“越战恐惧症”的美国公众反对再派军队去国外冲突地区。但不管怎样，终于使美国政府又相信了以色列的诚意，基辛格又开始了天马行空的中东斡旋。

6 终于有了临时协议

到了耶路撒冷，基辛格便与拉宾协商，定下了以色列的原则立场：以色列在控制山口周围地区及保持乌姆·哈希瓦雷达站的条件下把整个山口还给埃及；埃及军队不得越过缓冲区进入以军撤离地带。然而，正当基辛格 8 月下旬的这次调解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之际，一场反对他致力于以阿和解的风暴又在以色列掀起来了。

反对基辛格调解阿以冲突的势力在以色列是一直存在的。早期反对的是军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流血夺得的地盘又被基辛格还给阿拉伯人，同时也担心这种退让会鼓励阿拉伯人卷土重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军们改变了看法，他们懂得了把刺刀尖伸到埃及人鼻子底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的反对者主要是极右的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他们是从恢复“大以色列”的版图和保卫“神赐之地”的角度来看待退让问题的。美国帮助埃及建的核电站，在以色列掀起一片责难声。一些反对者甚至辱骂基辛格是“犹太孩子”、“一个异教徒的女人的丈夫”，还包围了议会。

拉宾重视这次谈判，福特也十分重视，他派了一个美国地理和地形专家小组一同来到以色列。他们在以军军官的陪同下，查勘了整个要谈判的地区。在美国卫星和专家们的努力下，绘制出山口及附近地区的精确地图，从而为谈判作了周密的准备。基辛格就是拿着这份地图在耶路撒冷和开罗之间奔忙的。以埃双方是以米为单位进行讨价还价的，曾出现过为 100 米长的一段沙地，面红耳赤地争吵了 5 个小时的情况。这几乎是一种耐心、恒心甚至体力的考验。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为几米、几十米的沙地而争，若是打仗，那只不过是坦克踩一下油门的事。实际上争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看：看，我们为了民族的利益可是在寸土必争的啊！而基辛格却为双方耐心地撮合着，使之一英寸一英寸地靠拢。

皇天不负有心人。1975 年 8 月 31 日，以埃临时协议终于定稿了。协议把西奈半岛两山口以西地区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沿苏伊士运河东岸一条较宽的地区埃军可以进驻；中间是更宽的缓冲区；山口以东细细的一条也归还给埃及。山口地段设有三个预警雷达站，以方在西边，埃方在东边，中间为美国人管理。之后，拉宾又老道地要求与基辛格再签一个保证协议。目的是要美国给钱作为以色列让步的报酬，同时担保它的安全。在这个附加协议中，拉宾又为以色列搞到了约 20 亿美元的军事和经

济援助，美国答应提供包括最先进的 F—16 战斗机在内的各类重型武器。在政治方面，美国答应不强迫以色列与约旦也搞一个类似的临时协议，并保证不与巴解组织谈判。9 月 1 日，以色列批准了这两个协议。1976 年元月，拉宾访美又为以色列搞到了 5 亿美元的美国武器，可谓战果辉煌。

拉宾的果敢和惊人的智慧使他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能取得出人意料的结果。半年后，他又在营救 80 多人质的过程中，指导总参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行动。

7 “大力神计划”在行动

1976 年 6 月 27 日上午，拉宾在总理府主持着一个例行的星期天内阁会议。突然，他的军事助手匆匆走进会议室，神色紧张地递给他一份刚刚收到的情报。原来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 139 次班机在雅典重新起飞后被武装分子劫持，机上有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内阁会议开不下去了，人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突发事件上。随后摩萨德等情报机构送来了详细报告：该机上有 230 名乘客，其中有 83 名以色列公民，飞机将在利比亚加油，但飞行终点和劫机者的要求还不清楚。对此，拉宾迅速组成了一个处理劫机事件的应急班子，除他之外另有副总理兼外长阿隆、国防部长佩雷斯、运输部长雅柯、司法部长扎多克和不管部长加利利。

凭直觉，拉宾认为此次行动是总部设在巴格达的瓦迪亚·哈达德博士组织干的。他的组织与西德的巴德尔—麦因霍夫集团、北爱尔兰共和军、日本的赤旗军等恐怖组织联系密切。为防止恐怖组织的袭击，拉宾上台后即下令对以色列易受袭击的目标采取“软贝雷帽”防范措施，伪装成乘客的保安人员都身怀出枪快和首发命中的绝技，他们已多次粉碎了恐怖组织的企图。但外国航空公司反对这样做，恐怖组织则看到了这个可乘之机。

恐怖分子采取的是“以人质换同志”的策略，即用手中的以色列人质去交换他们被关押在各国的成员。以色列对自己的公民是会尽一切力量去保护的，哪怕是一具死尸也在所不惜。拉宾对待恐怖分子历来是强硬的，他认为谈判只能是被动。因此，一遇此类事件，他总是派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去解决，除非没有可能才选择谈判。

摩萨德不断送来新的消息：飞机已在利比亚的班加西起飞了。苏丹当局拒绝了与劫机者合作的要求。飞机降落在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乌干达独裁者阿明表示支持劫机者行动。劫机者要求以人质换取有关国家关押的 53 名“自由战士”。其中以色列有 40 名，西德有 6 名，瑞士与法国各 1 名，其他国家 5 名。以色列电台的播音员不断地播送有关这架飞机的消息，全体以色列人的心都揪紧了。

拉宾在 6 月 29 日下午 5 点半召开了应急班子会议，会前把正在前往西奈途中的总参谋长莫塔·古尔也叫了来。拉宾问古尔：“以色列国防军能不能通过军事行动救出人质？行的话，则是第一选择；不行，则应考虑谈判。”古尔还没回答，老对头佩雷斯已坐不住了，他说：“国防部还没考虑，我还没与古尔讨论……”他没敢说完，因为他看到了拉宾

眼中的火苗。以色列公民被劫持 53 个小时，而主管他们安全的国防部长居然还没想去如何救他们。古尔见状赶紧出来救驾，他说在会议之前他已命令作战部长去研究营救方案，但乌干达元首阿明的态度是极大的障碍。直到 7 月 1 日早上，古尔还拿不出方案，拉宾望着这员猛将额上的汗珠，不知说什么好。他不想责怪古尔，古尔是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

佩雷斯先后提了两个建议：一是武力解决，但没有具体实施行动；一是派阿明的老师达扬去谈判，但阿明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也是个虐待狂，这已有过多次先例，他号召北非与以色列断交，一同反对以色列就是一例。因此，拉宾予以否决。万不得已，拉宾同意了谈判的方案，但同时也要尽快研究武力营救方案。用在押恐怖分子换人质的谈判方案，获得内阁部长的一致通过，在民族危机面前，反对党领袖贝京也表态全力支持拉宾，佩雷斯由鄙夷变为惊讶，他内心受到震动。

7 月 1 日格林威治时间 10 点许，以色列愿谈判的消息被恐怖分子获悉，他们欣喜若狂，他们以为以色列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最高兴的还是阿明，他深为自己领导的非洲“反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狂欢使恐怖分子忘乎所以，他们释放了 148 名非以色列人质，并把谈判时间延长到 7 月 4 日 11 时。当拉宾得知恐怖分子又给了 72 小时，他眼睛一亮，击掌叫好。也就是说：军方营救的可能性增大了。时间一分分地过去，各种应变机构都开足马力运转。摩萨德与西方情报机构合作，很快搞清楚了这次劫机行动是欧洲最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头目卡洛斯与哈达德博士共同策划的。他们的行动目的之一是要向各国合作组织和部下证明自己是说话算数的，即凡在行动中被对方捕获的组织成员一定会被营救出来，这对属下效忠组织和甘愿卖命起着重要作用。被恐怖分子释放的 148 名非以色列人质，自愿配合摩萨德，反映劫机者的情况，其中一大胆者甚至偷拍了照片，所有信息一汇集，使摩萨德很快清楚了对方的情况，为武力营救又提供了保证。

7 月 2 日早 10 点半，古尔匆匆来到总理府，他交给拉宾一份代号为“大力神计划”的武力营救方案，即派 150 名精干官兵分乘四架“大力神”飞机前往营救，有每一个详细环节的方案，救出人质后即一块同机撤回，连途中的一切细节包括加油等均安排好。拉宾看完，当即拍板定案，马上行动。为了民族，他愿冒极大的风险，甚至做好了承担行动失败的责任准备。

古尔从以色列国防军的精锐部队中挑了 150 名官兵组成突击队，由伞兵司令丹·肖姆隆将军带领。突击队在一个空军基地马上投入了突击训练，他们的每一个步骤完成时间是以秒来计算的。摩萨德的特工们不厌其烦地让突击队员们牢记恐怖分子的相貌和守卫的位置，他们的同事伪装成清洁工，把劫机者和人质周围的环境用拖把中的相机照了个遍。扣押人质的地点是恩德培机场旧候机大楼的顶层，第二层是乌干达士兵，7 名恐怖分子分散在顶层、二楼及底层候机厅中。古尔观看了最后一次演习，7 月 3 日早晨他向拉宾报告：“我建议内阁批准这个计划。”应急班子立即予以批准，最后是内阁的问题了。

7 月 3 日下午两点，拉宾召开内阁会议表决批准。一开始，他就告诉部长们，由于时间太紧，他已下令突击队的飞机起飞了，如果同意，即按计划行动，如不同意，即下令撤回。之所以选择武力营救，是因为谈

判也难以取得成功。大家没有反对，一致通过。阿隆说：“正因为这个计划看起来是毫无成功的可能。因此它才是完全可行的。”最后，古尔详尽地介绍了“大力神计划”。

行动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为了迷惑劫机者，3日晚上拉宾与阿隆给以色列驻法大使打了长途电话，他们指示大使们要努力进行谈判，要不惜一切代价使人质获释。电话时间之长，足以被人窃听，恐怖分子会得到以色列愿付更多赎金的消息。

第一架大力神式运输机分秒不差地抵达恩德培机场上空，它被安排在两次正常的航班之间降落在跑道上。驾驶员用纯正的曼彻斯特口音回答了机场指挥塔的询问，他声称自己的飞机出了点小故障，需要小修一下。飞机降落后，后舱门打开了，像母鸡下蛋似地从飞机肚子里滑出了一支车队。打头的是一辆英式“兰德·罗维尔”吉普车，车上是几个荷枪实弹的黑大汉。跟着是一辆豪华型防弹奔驰轿车，里面是乌干达人望而生畏的“阿明”。车队在机场绕了半个圈子后直向旧候机楼驶来，守卫大楼的卫兵忙把举起的枪放下，举手敬礼。但他们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便在“扑扑扑”的短促响声中倒下了。脸上涂着黑油彩、手持装了消声器冲锋枪的“卫士”们迅速地抢占了位置，并由七八个人簇拥着“阿明”向大厅走去。这时，第二架大力神已降落，它的任务是控制新候机大楼，以便必要时开辟一条后撤的路线。至此，整个机场已控制在摩萨德特工们手中。

战斗十分顺利，突击队员用希伯来语高喊：“卧倒！”一边往前冲，用震荡手榴弹炸。以色列人质纷纷卧倒，阿明的士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成为站立的靶子被打倒了，只有一名恐怖分子抢先开了火。整个突击行动中打死了四名以色列人，总的说是十分成功的，从第一架飞机降落到最后一架飞机起飞，总共只用了42分钟。

当满载着胜利的大力神机群临近以色列之际，被激动的播音员鼓动起来的人们高兴得发了狂，人们纷纷奔向机场，去欢迎人质和凯旋的将士们。拉宾也带着他的内阁班子，来到了机场欢迎勇士们和受难的人们，他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花。整个以色列，到处是人们载歌载舞的欢庆场面。以色列政府用铁的手腕回击了恐怖主义者，以军官兵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奇迹般的胜利一扫人们的疑虑。拉宾认为自己领导的这场斗争胜利的意义在于给丧失了斗志的人们注了一针兴奋剂。

然而，他的老对头佩雷斯则利用报界的朋友，大为自己造舆论，他的发言人拉维甚至发表讲话，大造反对拉宾的舆论。拉宾仅仅把这一切看作是政坛的恶习，而没发现平静的水面下已经出现湍急的暗流。就在拉宾沉浸在他与埃及达成了脱离接触的第二个临时协议以及救出人质的喜悦中时，就在他全力为摆平各种国际关系及为民族振兴而废寝忘食之时，各种倒阁力量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发难了。大难临头，拉宾却全然不知。

第十一章 天有不测风云 拉宾含辱下野

1 “安息日”给拉宾带来厄运

拉宾对佩雷斯一伙人的表演本来不当回事，他总相信事实最能说明问题，自己上任以来的政绩明摆着。趁着阿以和谈的停滞和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动乱及美国总统的换届选举等时机，拉宾大大地充实了以色列武器库，实力增强一倍。飞机数量增加 30%，坦克增加 50%，自行火炮增加了 100% 以上，装甲运兵车增加 700%，但是，事情往往出人意料，殊不知从美国飞来的几架飞机却引起一场风暴，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1976 年 12 月的一个星期五的黄昏，拉宾和内阁的几位部长前往一个空军基地，迎接从美国飞来的 F—15 型战斗轰炸机。星期六是犹太教徒的安息日，而安息日是从星期五傍晚日落时算起，直到星期六晚天空中出现第一颗星止。在这段时间内，犹太教教规规定，人们不得进行非宗教活动以及以车代步。所有人不得例外。所有虔诚的教徒穿着黑色或灰白色的束腰长袍，头戴宽边的黑天鹅绒帽或白色小圆帽，跟着几十位拉比在社区狭窄的街道上呼号前进，其颂赞上帝的声音在曲折的小巷里久久地回荡着。为防止车辆行驶，一些宗教狂徒用铁链把大街小巷都封锁起来，一些好斗的信徒则手持石块守在路口，准备砸来往的车辆。如果谁破坏了这一规定，下至民意上至法律，都将予以反对甚至惩罚。拉宾他们参加欢迎仪式的时间并不长，但太阳很快下山了，他和部长们在天黑后才驱车回家，这就捅了大漏子。之所以要举行欢迎仪式，是因为总参坚持，也因为拉宾从美国总统福特手里搞到的第一批 F—15 型飞机，这种飞机美国连“石油龙头”沙特阿拉伯都不肯给，却优先给了以色列，也需要这么个仪式表示感激。之所以选在星期五黄昏，这完全是由美国人定的，他们并不太了解犹太教的法规，只是尽量去方便自己的飞行员。这样，却弄得拉宾下不了台。

议会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一些极端宗教派“以色列正教党”分子以这个欢迎仪式是拉宾政府故意违反安息日教规为由，对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尽管拉宾作了详细解释，议会最后还是对不信任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前，拉宾自信联合政府会挫败这一议案，因为工党联盟及入阁的小伙伴有超过半数票的优势。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内阁中两名全国宗教党的部长无视组阁协议投了弃权票。这样，支持政府的票就少两张，反对政府的就正好多出一张。形势于是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正教党的不信任案以超半数的票通过了。当可怕的唱票结束后，反政府议员们跳起来欢呼他们的胜利，议院如开了锅似地沸腾了。拉宾一下子被击懵了，他不明白怎么了，记者们七嘴八舌的提问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拉宾脑袋里乱成一团，他不相信是真的，自己就像玩游戏一样地下了台。现在他除了命令两个突然倒戈的全国宗教党的部长立即辞职以及自己向总统递交辞呈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要离开议院时，他忽地站起来，高声宣布立即解散议会，并在次年 5 月举行大选。此言一出，刚才还在狂欢的反对党议员立即乱作一团，纷纷咆哮起来，一个个气歪了脸，

大骂拉宾利用职权搞阴谋，妄图用提前选举的办法重新夺回总理宝座。

当拉宾离开议院时，他已不是总理了，仅仅是个看守政府的首脑而已。但他对重新上台充满信心，他认为自己的政绩会让公民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然而，自工党政府统治以色列 29 年以来，公众变得越来越不满了，主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自己在经济上没有得到与辛勤劳动相符合的收入。工党政府中一批腐败官员私吞了他们的成果。而实际上许多基布兹的平等社会主义分子的子弟成为“资本家、技术专家或军队领导者，他们带着右派观点，虚情假意地应付着劳工运动”。工党统治集团大约包括了 250 个显赫家族。随着“六天战争”结束，大量外援涌入，以色列开始出现了一批蛀虫，社会中形成了一个“黑色经济”现象。人们在相差无几的收入和稳定的物价生活中，忽然看到一批人过得奢华或有了小汽车而感到很气愤，大家会心照不宣地得出结论：看，这家伙准在哪儿捞了一笔黑钱。以色列的第一批百万富翁是在承包“巴列夫防线”工程中出现的。人们工资收入不高，物价上涨，各种税收繁多，已苦不堪言。子女入学有的已交不起学费等。被鼓动起来的对工党不信任情绪，一时达到了高潮，以拉宾为首的工党政府，受到了连珠炮似的袭击，丑闻一件接一件被抖了出来。

新闻界揭出第一件丑闻是：政府存放在不列颠—以色列银行中的一笔巨款不翼而飞了，嫌疑犯是以方总裁米切尔·佐尔，他与工党政府高级官员交往密切。

第二件丑闻是：以色列工总“患者基金会”负责人阿谢尔·亚德林因涉嫌贪污而被拘留，拘留前拉宾刚刚任命他为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经查，他的贪污竟是为了资助工党。

第三件丑闻是：现任住房部长阿夫拉罕·奥佛尔在担任以色列工总的“希昆奥伏丁”房产公司经理期间曾有数额惊人的贪污行为。作为部长，他被新闻界反复渲染，加上检查机关的反复折腾使他心理承受能力快到了极限。最后，他在自己办公室自杀了。但查出的结果是他毫无贪污行为，完全是新闻界的捕风捉影，有意而为。但人死了，没有人表示歉意。

其实，新闻界与拉宾及其内阁的仇恨已久。早在 1975 年，专栏作家马蒂·戈兰写了一本关于基辛格中东外事活动的书，把基辛格写成一个两面三刀、处心积虑损害以色列利益的政治流氓。因书的内容极大地损害了基辛格的声誉并影响美以关系，检查官沙里上校及上司决定禁止出版此书，并没收全部手稿及有关资料。因书中的大量机密资料是从总理办公室、外交部及国防部传出的，内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要对戈兰采取法律手段查清泄密的渠道。整个新闻界则大喊大叫，抗议政府践踏人权。在这场较量中，新闻界赢了，书也出版了，但它却记下了挨过拉宾整的仇。从此，新闻界就对拉宾政府怀有报复的心理。

“安息日”没给拉宾带来好运，看来夺回总理宝座也不是一时的事。

2 老对头佩雷斯善挖墙脚

家贼难防。在反对党猛烈抨击工党政府的同时，老对头佩雷斯又使

出了善挖墙脚的手段，展开了窝里斗，与拉宾唱开了对头戏，好使自己当上党内一把手。没等党的中央委员会开会推举工党联盟的总理候选人，他就急不可耐地展开了个人选举活动。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与拉宾对着干，并尽可能把内阁的不同意见捅到社会中去，以一个反潮流者的身份来博得广泛的支持，而在新闻界他又有着广泛的人缘关系。

1977年2月，拉宾与佩雷斯的第二次公开较量拉开了序幕。这时，工党联盟举行了重新推选党的领袖，也就是总理候选人的选举。面对参加投票的3000名代表，拉宾与佩雷斯都心中无底，最后的结果却使两人深受教育。选举结果是：拉宾以1455张对1404张的微弱多数票胜了佩雷斯。佩雷斯对此十分沮丧，他认识到在党的山头上拉起敌对的旗帜是不得人心的。拉宾也认识到自己支持率减弱，主要是平民和普通党员，把经济看得比外交更重要；而事实上，以色列人是以他们的钱包和菜篮子的充盈情况来评定政府和领袖的好坏的。只有战争例外，打赢了战争，人们会忘记政府的治国无能，让它多干几年。

佩雷斯与拉宾斗，他攻击得最猛烈的是拉宾在犹太移民定居点问题上的立场。工党联盟反对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上除“安全定居点”外再造新的定居点。宗教势力和利库德集团则极力主张在这些地区上尽量安置新移民，他们干脆把约旦河西岸地区称之为“朱迪亚和萨马利亚”，即古以色列时该地区的称谓。拉宾对此又硬不起来，他明白继续在巴勒斯坦人聚居区附近设立定居点是极不得人心的，不仅全世界会反对，而且堵死了与阿拉伯人和解的路。但是，占人口多数的东方犹太人“塞法拉迪”支持无限定居政策，工党联盟又需要他们的选票。佩雷斯揪住拉宾的这个弱点，公开站在利库德集团一边向工党联盟发难。在此，他为自己赢得了有限的几分。就连不久前发生的恐怖分子劫机事件，和拉宾访美时批评佩雷斯的话题，也成了佩雷斯攻击拉宾的事实，并利用他在新闻界的优势，大造舆论。而最终却没有赢得胜利，不能不使他感到懊恼。

3 贤内助利扬存款生是非

不管是党内还是反对党，对拉宾的攻击是一个接一个，但对拉宾来说都不是致命的，因为这些攻击都是政治方面的。而政治好比一个戏剧性的足球，它是艺术的，关键是怎样玩法。没想到的是有个攻击是致命的，关系到他个人的品质问题。这就是拉宾很有口碑的贤内助利扬的存款问题，这桩是非致使拉宾失败。

1977年3月，拉宾刚从美国访问回来，以色列《国土报》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拉宾在美国一家银行中拥有外汇存款！这是一条可怕的新闻。当时以色列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在国外拥有的存款都是非法的，这是因为：一、以色列外汇短缺，公民们出于爱国心应把自己的外汇存在国内银行支援建设，二、这是一种防止私营业主和腐败官员把他们的非法所得转移到国外的措施；三、一心为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移民所信奉的。为此，整个社会闹得沸反盈天，人们认为自己被总理骗了，总理要求人们干的事自己却首先违犯了，他们无不感到梦幻破灭般的痛苦。因此，人们的愤怒难以平息。《国

土报》把这事像美国新闻界对付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一样，不仅详细报道了拉宾在那家美国银行中的存款数和账户号码，而且调集了最能干的笔杆子慢慢煎熬拉宾，报纸上常见的醒目大标题是“拉宾—利扬银行账户”。在该报发表的大量尖酸刻薄的报道中，不厌其烦地证明拉宾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在多次社论中指出：在以色列处于与邻国交战状态的危难时刻，拉宾先生注重的是谋取他个人的私利。这样的引导，无疑给拉宾夫妇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拉宾早已被一个个的攻击搞懵了，不知如何反击，就连解释也很含糊，先是予以否定，当《国土报》公布了账号和存款数以后，他又说是当大使时夫人利扬省下来的生活费用。但这个解释立即成为反对党和新闻界的辫子，他们声称拉宾在存款问题上对全国人民撒谎，先说没有后来才承认。事情越闹越大，把工党联盟搞得丧尽人心。拉宾考虑到辞去党的领导职务，但他接受了不管部长加利利的意见：等等看！

总检察长巴拉克是个两面派人物，他为了把审查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一方面安慰拉宾，另一方面他又夺了财政部长拉宾诺维奇的调委会审查权。看到自己落在这样一个两面派手里，拉宾明白自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果然，当调查委员会的审理结论出来时，确认了拉宾与利扬违反了政府的有关规定，决定对他们两人进行罚款处分。但巴拉克要给拉宾以厉害，他提出一个新的决定：如果财政部长同意审查结论的话，此后在法庭上他不能出庭为拉宾夫妇进行辩护。司法部长立即表态认可，使得财政部长也只得认可。继而，巴拉克决定只对拉宾进行一次“象征性”的罚款，而利扬则必须接受法院审判。表面上是给拉宾以面子，实际上是巴拉克更阴险毒辣的一招，他要让前总理大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夫人出庭受审而无可奈何。这是拉宾无法容忍的侮辱，他决定向社会公开自己的收支账目，在几位好友劝住以后，他在茕茕孑立的情况下，作出了三条决定：一、立即撤回自己总理候选人的提名；二、誓与利扬共同承担外汇存款一事的责任；三、立即辞去看守政府总理职务。

在利扬受审的日子，拉宾坚持要出庭陪伴妻子，起码给她一点精神上的支持，因为利扬在接到受审通知后，精神快垮了。尽管好友纷纷劝他：“别固执了，伊扎克，你千万不能出庭。那样，审判就会变成一出尽力羞辱你的大闹剧。”拉宾仍气愤地说：“不！我不能撒手不管她！我要看看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听我说，伊扎克，”利扬也劝阻他，看着他的眼睛平静地说：“相信我，我受得了，你不要陪我去。想想看，我们经历的风浪还少吗？”最后，还是利扬劝住了他。

审判的最后结果是：利扬须付一笔 25 万以色列镑的罚款，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为 24000 美元。为了摆脱这种痛苦的纠缠和不幸的遭遇，拉宾夫妇什么也不说，接受了法院的判决。

4 虎落平川志在高山

存款风波过去后，拉宾夫妇过上了平静的日子。但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与贡献，以色列人们是没有忘记的，常常使拉宾激动。

利扬被重罚以后，数以千计的人们给他们打电话来信表示支持，不

少人还寄来支票帮助他们，有的甚至愿意替利扬坐牢来拒付那笔罚款。利扬整日感动着，坐在房间回信和返寄支票。最使拉宾感动的是一位老人对他说的话：“听着，孩子，把头抬起来。我的儿子就埋在这里，他比你小不了几岁，作为一位阵亡者的父亲，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说的是，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你是问心无愧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当他在法海纪念烈士集会讲话时，一位烈士的母亲对他说：“伊扎克先生，你一来我就认出你是谁了，我们为你而感到骄傲！好好干吧，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千秋功过，人们给予了公正的评说。

当5月17日大选投票的第一批结果出来时，工党联盟为自己的窝里斗而不顾大局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历史上第一次用选票把工党政权赶下了台，利库德集团领袖梅纳赫姆·贝京当选了新的政府总理。6月21日，拉宾与贝京在总理府会晤，在简短的仪式后，他把权力移交给贝京，随后互致敬意。

自此，拉宾被从总理宝座上拉了下来。但是，他仍然不愿离开政坛，除了还是反对党的工党议员以外，更是在密切注视着政局变化。就是他与妻子坐在宽大的壁炉旁，享受着芳香的咖啡，轻声细语交谈往事时，也不忘总结一下自己所走过道路的得失。平时，他就看书写回忆录，有时就参加一些讲演，思考一些问题。这样，他的视野反而更开阔，看问题也更清楚。

按中国话来说，拉宾好比“虎落平川，志在高山”。在相隔十几年以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命运之神又安排了他另一次崛起的机会，使他东山再起，重新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5 逐步恶化的巴以关系

自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以后，国际关系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杰拉尔德·福特这位临时总统，有着他的不稳定性，严重地破坏了基辛格在外交上作出的努力。只有萨达特没有泄气，他一方面努力改变现实，另一方面也在等待机会。当1977年1月吉米·卡特出任美国总统之后，萨达特决定同这位佐治亚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从一开始他就留给卡特这样的印象：他期待同以色列和平共处，而和平的内容应包括以色列人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完全承认以色列。萨达特还清楚地表明，他理解以色列对安全的需要，因而任何一项和平协议都应包括以色列的安全保证内容。

萨达特与卡特关系确实密切起来，俩人书信往来频繁，都笃信宗教，都来自下层，相互尊重和信赖，其相互影响也是很深的。

萨达特在卡特的影响下，致力于中东和平。1977年11月19日，他访问以色列，因此打破了中东和平僵局，令世界震惊，更令阿拉伯世界震惊。在迎接萨达特的以色列政治领袖队伍中，拉宾也以其特殊身份参加，他是为萨达特访以而感到自豪的人之一。因为，他曾为这一天的到来付出过不少心血。

然而，萨达特的和平之举，同样受到来自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反对势力的威胁。萨达特曾在沙漠中粉碎过一支企图暗杀他的阴谋，但他最后还是为和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倒在和平的曙光出现之前；为

此，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曾为他致哀。拉宾真正认清萨达特，是在萨达特访以以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位曾和以色列兵戎相见的阿拉伯领导人站了出来声称他理解我们对安全的需要，因而必须找出办法满足我们的合法权益，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看作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革命。”可这时，拉宾已不在台上，但他对于萨达特后来的死，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怀念，他在回忆录中说：“一颗和平的太阳陨落以后，人们将在黑暗中怀念他。”

当拉宾下台以后，一个曾被他和达扬重用过却有着野马一样个性、极端仇视阿拉伯世界的以色列将军，再次被以色列军方和当局重用，他以“冷血动物”的暴行来对待巴勒斯坦人，企图以他挥舞的大棒来征服其他民族，这人便是沙龙。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不但没有征服反而更加激起了巴勒斯坦人以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以色列人们的反对。反抗的烈火越扑越旺，以色列国内反对他及当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色列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孤立，巴以关系到了有史以来极为恶化的地步。

时局发展到 1982 年 6 月，当时沙龙正指挥以色列大军围攻贝鲁特西区，准备把那儿的巴解总部来个一窝端。自然，这一行动受到了来自孤立无援的阿拉法特的巴解战士的顽强抵抗。后来便导致了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死亡 2000 多人的“贝鲁特大屠杀”。当新闻记者左德曼把这极其悲惨残忍的一幕向世界报道以后，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消息，便立刻像闪电一样传遍了整个世界。以色列的老百姓全被惊呆了。几十年来他们在电视中看到的这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发生的种族灭绝的场面，竟重演在以军占领的贝鲁特。他们勒紧裤带供养的士兵竟然跑到黎巴嫩去杀人放火，而且杀的净是些妇女和孩子。因此，沙龙成了众矢之的，以色列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大示威，参加者 35 万人，占以色列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沙龙的住宅前面，是一片“耻辱”和“要和平”的口号声。

后来在 1987 年底到 1992 年中，以军仍然杀死了 1775 名扔石头表示反抗的巴勒斯坦人，数千人被打伤或致残。没有人认为以色列有必要这么做，不管它的敌人还是它的朋友，就连美国人的抗议声也越来越刺耳，一直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社团领导人也主动与巴解组织会晤了。以色列领导人感到了阵阵孤立的寒意。1991 年 7 月初，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出面向沙米尔施加压力，要他放弃僵硬立场参加马德里中东和会。他于 7 月 1 日对记者说：“我想有许多人不知道中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到这里布什把话头压住了，他想给以色列政府留点面子。沙米尔自然知道这句话后面的含意，如果以色列再不顺从，美国就会把老底揭出来，告诉全世界 242 号决议就是要求以色列撤出侵占的领土。这样，沙米尔政府终于屈服，同意参加中东和会。

此后以色列国内的局势，为拉宾的东山再起提供了机会。当年，人们推举利库德集团，只是出于一种对工党执政 20 余年的厌倦，借此换换口味而已。而现在，人们早已不喜欢利库德集团的口味，尤其是它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毫无建树，造成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第十二章 东山再起

1 再次决战

1992年，是以色列的大选之年。这时，人们已不像当年那样拥戴利库德集团了。对于工党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最好的机会。

在工党内部，竞争总理候选人的斗争也在激烈展开，对手自然是拉宾和佩雷斯。两个老对手的再次决战，结果是拉宾胜利。当上了工党领袖和获选总理候选人，拉宾为此精神振奋。

拉宾与佩雷斯的竞选是再次决战，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也是再次决战。从竞选开始，工党的支持者们即想尽一切办法决心要帮助拉宾再登总理宝座。利库德集团则让一头可怜的毛驴驮着一个大招牌上街游行，上面写着“拉宾先生，以色列人不是蠢驴！”后面则跟着宣传车，告诫选民：“千万不能把那个‘六天战争’中的胆小鬼，华盛顿外交界中酒鬼及在国外有存款的撒谎者选上台。”工党则针锋相对，他们赶着一群毛驴，驮的招牌是“只有蠢驴才不懂得该换个政府了！”拉宾遇到的挑战是严峻的，在捉摸不透的气氛中，6月23日选民投票。结果在120个议席中，工党获44席，利库德集团获32席。这样，1977年令人耻辱的惨败记录正好翻了过来，那一年利库德集团是以43比32击败工党的，使工党15年来饱尝了在野党的辛酸。

这次大选，工党最大的收获在于敢于亮出自己的旗号，明确提出了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及停止在约旦河西岸人口稠密区建立居民点的主张，从而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全民性的表决。

2 为实现和平而努力

以色列第13届议会对拉宾提出的组阁名单进行了表决以后，又顺利地通过了对新一届政府的信任投票。拉宾当即发表了充满自信和激情的演说，他着重谈了争取和平的问题。他建议应把“和平进程”一词改为“实现和平”，因为“和平进程”一词用了10年而和平毫无进展。他呼吁阿拉伯领导人以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为榜样，大胆地迈出和平的步伐。他还邀请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来以色列议会演讲。他在自己的演讲中引用了以色列诗人的话：“尽管目前看来遥远，我确信在将来国与国之间出现平静和相互祝福之际，和解的日子就来临了。”

拉宾动情地向巴勒斯坦人呼吁走向和平，同时他又警告好斗分子，在谈判期间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他们的暴力及恐怖活动将会遭到严厉的打击。

拉宾阐述了加强以美关系、加速国营企业私有化和妥善安置新移民等问题后，他动情地说：“各位议员先生们，西奥多·赫茨尔说过，人们的成功源于他的梦想，不管我们经历了种种困难，不管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非议，我们通过梦想和斗争已建起一个安全的犹太人天堂。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旨。几代人的梦想已变为现实。”他的演讲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他的呼吁、倡议，在国内外获得赞赏和欢迎，尤其是阿拉伯世界。

但是，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强调对拉宾要听其言观其行，看他能否言行一致。阿拉伯报刊一致指出，对拉宾来说“以土地换和平”的时候到了，这是对他声称的“诚意”的真正考验，战争使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认识到一个真理：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首先是阿以双方都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消灭对方，因此，惟一的选择就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阿以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正如一位以色列人士所指出的“战争只能导致痛苦、灾难、死亡和仇恨”。以色列不可能打败和消灭阿拉伯人，这是显而易见的，阿拉伯方面有如此众多的国家，有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民，以色列要永远霸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是不可能的。

拉宾说到做到，上台伊始他就宣布冻结 100 多个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这包括为新移民建造的 6000 套住房工程。他还派遣军警阻止犹太移民“自发”的建房行为，驱逐在沙米尔当政时期在耶路撒冷占领阿拉伯人住房并强建定居点的犹太人。他保证在 1993 年允许巴勒斯坦人选出在西岸和加沙地区的自治机构，5 年后就被占领土的最终地位进行谈判。为表示诚意，他吸收了两名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头面人物担任内阁副部长，还允许巴勒斯坦著名领导人侯赛尼重开他的“阿拉伯研究中心”。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准备修改或废除不准与巴解组织接触的法令，并表示不再反对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中东和谈。9 月 10 日，他又迈出突破性的一步，首次表示以色列从戈兰高地部分撤出的可能。他还拒绝保证不拆除以色列建在戈兰高地上的 32 个定居点，他要求人们“放弃以色列是宗教圣地的主张。”7 月 17 日，拉宾和平地解决了 3000 名巴勒斯坦学生与以军僵持了 4 天的问题后，7 月 20 日，美国作出了向以色列提供 100 亿美元贷款的承诺。这充分表明了布什政府对拉宾的姿态和措施给予了充分肯定。不仅如此，拉宾一上台，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急忙赶到耶路撒冷来表示祝贺。美国新闻界指出，这标志着被沙米尔搞僵了的美以关系的重新解冻并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

拉宾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和平”外交攻势，使中东各国政府感到目眩、兴奋、吃惊和不安。同时，在国内也引起一些反对派的抵制。在阿拉伯世界，他的外交行动使各国急忙调整它们对以色列的立场，埃及和约旦认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叙利亚、黎巴嫩、巴解组织则认为：拉宾的让步还差得很远。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明白：拉宾伸出的手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不能轻率地拒绝，否则这种机会很可能真像拉宾说的那样一去不复返了。但接受了就意味着自己也必须作出让步。它们感到进退两难。同时，阿拉伯国家都害怕拉宾施展“各个击破”的手腕，有意识地和邻国分别成交，到那时自己就会变得孤掌难鸣。拉宾看透了这种心态，便于 12 月 6 日指出：“我认为，我们在 1993 年是会达成一项协议的。即使不能与所有的阿拉伯代表达成协议，也会与某些代表达成协议。”对于国内的反对势力，拉宾是心中有数，他曾作过民意调查，“和平”代表着 80% 以上的民意，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已厌倦了战争，他们生活在以色列，是要过上富裕的生活的，而不是要打仗。

因此，拉宾以土地换和平的态度是强硬的，在发生了一些定居者反对他准备把大部分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的示威后，拉宾声色俱厉地说：“以色列是一个民主、主权和法制的国家，有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政

府的决定必须得到所有公民的尊重，因为我们永远不能使每个人都感到满意。”

即使后来利库德集团和极端的宗教党派也没能闹起什么轩然大波来。

3 轰动世界的时刻

阿以关系之所以牵动整个世界，我们可以从以下思路去思考：从整体上看，阿以冲突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的冲突；但从具体意义上看，主要是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争端，其焦点就是在被占阿拉伯领土和巴勒斯坦人的权益问题上。作为美国，它有着自己的优势，可以通过自己的关系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它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美国之所以这样，是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的，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拉拢美国犹太人垄断巨头的需要。因此，联合国安理会的 242 和 338 号决议，在没有付诸实施的情况下，只能是一纸象征性的空文。同时，由于沙米尔政府自以为手中有一张可以讨价还价的王牌，即以色列不能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坐在一块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以一拖再拖，使得和平进程毫无进展。

在以色列国内，解决阿以冲突的阻力也很大，从 80 年代初起，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相互影响，以色列社会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抬头，对阿拉伯人的偏见加深了，尤其表现在占绝大多数人口的东方犹太人和年轻的犹太人身上。其社会背景是极右的利库德集团得以上台执政 14 年之久。他们在意识和行动上的影响是相互的。此外，巴解下属组织的一些恐怖活动以及海湾危机引起的阿拉伯阵营的分裂，苏联移民对“生存空间”需求的压力，都对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拉宾毕竟是有远见的外交家、政治家。他从漫漫长夜中看到和平的曙光，他从民意的潜意识去获取力量。正如上一节所说的，他完成了组织新内阁的工作并得到议会批准后，就发表了那篇轰动世界的精彩演说，表明了自己和平的观点。有人说：他发表演说是轰动世界的时刻。这样评价一点也不过分，不但以色列国内、阿拉伯国家乃至全世界在一片震惊中看到了和平的希望。

通过漫长的谈判，到 1993 年夏，终于签定了奥斯陆协议。而 8 月 13 日“华盛顿中东和平协议”的签定时，又一次轰动了世界，全球各大电视台都事先赶到白宫的南草坪，实况转播这一事件。观察家们认为：“这是中东和平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协议规定：

——以色列从 1993 年 12 月 13 日到 1994 年 4 月 13 日撤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镇；以军撤出后将重新部署在约旦河西岸的居民区周围，负责以民的安全；

——巴勒斯坦将在今后 9 个月内选举产生自治委员会，对教育、经济、文化、卫生、环境保护、税收和旅游、社会福利等方面实行自我管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的行政和军事管辖权将一并取消；

——巴勒斯坦将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队，被占领土上的巴解组织战士可作为警察部队；

——在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实行自治的过渡期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将就巴勒斯坦永久自治协议进行谈判，以解决耶路撒冷地位、边境、遣返难民、以色列定居和军队驻扎等问题。

中东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阿拉法特和拉宾第一次把手握在一起了。

拉宾颤抖着，把心中的闸门向世界打开了：“今天，我们要用响亮的、清楚的声音对大家说，血和泪已经流够了，够了，我们无意报仇，我们不怀怨恨，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正常人，是想建造房屋、种植树木、谈情说爱以及与你们一起生活的人。今天，我们正给和平一个机会，当我们可以说‘永别了，武器’的那一天，和平的日子就来到了。”当然，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分歧仍然很大，许多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还得双方静坐桌边来谈。但和平的曙光在望了。

4 鹰爪鸽派

无疑，拉宾是一位为中东和平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他上台后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行动上，都为缓和中东局势作出了努力。然而，他对阿拉法特的“恐怖分子”的偏见却依然没有消除。因此，他在给人一种爱好和平的鸽子形象的同时，也露出了长在鸽子腿上的一副鹰的利爪。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之所以这么做，有着国内外的因素。

第二次出任总理，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他与美国改善了关系，搞来了100亿美元的贷款；同时，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5%，人均收入提高到13000美元；其次，外交上始终占着主动；另外，他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反对派掀他下船的动机。这样，他以鹰爪鸽派的形象去处理一切问题显得游刃有余。他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和反对者，也在实施他的铁拳。如1992年12月17日，415名巴勒斯坦人遭到驱逐，成为“难民中的难民”。因为黎巴嫩不准入境，返回又被以军驱逐，想进入被占“安全区”又被以军截断了后路。由于18日以军开枪打死6人打伤30多人，因而遭到世界反对，安理会还通过了谴责以色列的799号决议，就连拉宾内阁的外交部正副部长，也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在冷静分析各种对手后，即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尤其表现在对待巴勒斯坦三派之间。

巴勒斯坦三派即巴解、哈马斯组织和侯赛尼所代表的一派。这三派都有相当的势力，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三派在政策和方法上具有不同特点。侯赛尼派以温和面目出现；哈马斯派是不折不扣的激进派；阿拉法特的巴解运动则居中。三派的态度和政策不同，拉宾对此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是力量最硬的一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阿拉法特，其目标是，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上，消除犹太复国主义，实现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由于它与约旦、科威特，尤其是埃及等有着良好的关系，同时与联合国等许多国际社会组织有着广泛联系，因而促成了巴以和平谈判的局面。

哈马斯的全称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它的领袖是阿赫马德·亚辛。

它的抵抗态度是最激进的，甚至是不惜一切的圣战主张者。在被占领土上，哈马斯是一个软硬不吃的组织，许多抵抗运动和石头革命的组织者就是它。以色列对此采取的是铁拳行动。

温和的侯赛尼派与“法塔赫”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方面它们是遥相呼应。但侯赛尼与犹太人有着杀父之仇。该组织注重现实，虽不会对以色列形成威胁，但却是最难对付的，其两位副手均是难以匹敌的雄辩之才。侯赛尼主张：“我的梦想是让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在这片领土的一个世俗民主国家里共同生活。如果这不是犹太人的梦想的话，那就让我们生活在两个毗邻的国家里吧！”因此，他获得一片喝彩声。以色列历届当局都是很认真地对待他，拉宾也不例外。

拉宾的鹰爪鸽派还表现在，尽管他呼叫着和平，但在两个问题上却拒不让步：一是坚持要整个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二是反对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5 东方之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也起着一定的推进作用。就在巴以和平协议正式签订之后，拉宾作为以色列建国后第一位访华的总理，于1994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

拉宾是这样评价以中关系的：“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两个亚洲古老民族造就的文化可以上溯数千年，以中两国人民应该相互学习，加强合作。”他还期待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以关系很早就开始了，旧中国政府在1947年支持联大的分治决议，并于1949年3月承认了以色列，但尚未与之建交。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3个月后的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曾回电表示感谢，此后双方开始朝正式的方向前进。但在美国政府50年代初采取了敌视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之后，以色列掌权人物改变了初衷。为了取悦美国，以色列政府有意地拖延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以色列人民要求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很强烈，统治阶层也不乏有识之士。如老资格的外交家哈科亨，就主张不顾美国压力而与新中国建交。1954年6月29日，周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途经仰光时与哈科亨进行了友好的会谈。1954年9月23日第一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总理专门指出：“我们同阿富汗、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

1955年1月，哈科亨带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但摩西·夏特政府限制代表团讨论问题，只签了一个贸易协定。以色列政府这种趋炎附势的做法，对中以关系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同纳赛尔及其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广泛接触，出现了中国与阿拉伯各国间的良好关系。此时，以色列才发觉自己犯了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于是，在1955年4月29日，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奉命匆忙向中国

驻苏联一名外交官正式表示，“以色列政府希望在尽可能早和方便的时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机会已经消失了。

1956年，中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止了与以色列的直接贸易，中国人民始终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此后30年中，以色列从不放弃任何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时机，但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和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抗斗争；在以色列政府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撤出被占领土以前，不同以色列政府建立官方联系。

以色列基本上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未与台湾“建交”，但与台湾共同研制核武器。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以色列时而投赞成票，时而投反对票。1971年10月25日，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26届联大提案表决时，以色列投了赞成票。

尽管中国反对以色列的扩张政策，但中国政府从未改变过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立场。并一再表白：“以色列和中东各国同样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两国间的民间交往也一直未断过。

1992年中以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同时，由于以色列移民及大部分领导人均来自东欧，自以色列建国开始，就与共产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缘分，其工党的思想体系，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社会主义的内涵相一致的。因此，拉宾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主动争取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是巴以和平协议签署以来以色列首次访问中东地区以外的第一个国家。拉宾访华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中东和平的最新进展，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关系同中国政府交换意见；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等问题。随同拉宾访问的有他的夫人利扬·拉宾，七位政府官员以及大批的以色列经济界人士及30多名记者。

在5天的访问时间里，拉宾始终有一种热情洋溢的感觉，活动也相当圆满。10月11日，李鹏总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开始100分钟的交谈，并签定了两国民用航空运输协定，李鹏还以中国传统烹调文化的中西餐结合形式宴请了拉宾及其一行。12日下午，江泽民主席又会见了拉宾。随后，乔石委员长以及国防部长迟浩田等也会见了拉宾总理。拉宾向乔石委员长表示：犹太民族一向十分钦佩中华民族，我们两个古老民族全都成功地保持了各自的特点，适应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13日，拉宾开始了对上海的访问。黄菊市长因赴京开会，于是委托沙麟副市长代他接待拉宾总理。到上海后，拉宾去了复旦大学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了犹太人与中国人友好交往的历史。他说，早在唐朝，波斯商人和阿拉伯人开始大批航海到中国去，其中就有犹太人。一些人便定居下来。他还特别强调了二战期间上海人民给予犹太人的同情与帮助。当时，为了躲避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和反犹太人浪潮，许多犹太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有很多人来到上海，仅虹口地区就有两万犹太难民定居。他这次访华，特意去上海，也是为了表达对上海人民的感谢，犹太人非常珍视这种患难之情。14日上午，拉宾还专程前往摩西会堂参观，这是俄罗斯犹太人于1927年建的，也是上海保留较为理想的犹太人旧址之一，较鲜明地体现了犹太民族风情。下午，拉宾还参观了上海浦东开发区，并到农民家里作客。

15日清晨，拉宾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回国。临上飞机前，

他紧紧握住中国陪同团团长的手，对中国人民给予他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并希望以中两国继续发展友好关系。

拉宾总理的飞机很快消失在蓝天白云中，但他对中国的短暂访问，却在中以友好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尤其是随同拉宾来访的以色列企业家，开始了或继续发展了许多友好合作项目。可以说，他的首次访华，是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悠久的交往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第十三章 和平之光与世纪葬礼

1 小屋透出光芒

在以巴和平协议签订之前，这里有必要回叙一下，有必要说说挪威山林中的一座小屋。因为，“以巴和平”的最初光芒是从那座小屋里透出来的。

1992年，当拉宾的鹰爪鸽派形象刚刚树起的时候，很快就因1992年冬季驱逐了415名巴勒斯坦人而受到影响，安理会甚至要求拉宾把他们接回去。无论是拉宾还是阿拉法特，日子都不好过，都必须顶着内外的巨大压力，形势极为严峻。阿拉法特眼睁睁看着哈马斯的声誉上去，而自己却受到内部激进者的反对，经济处境也每况愈下。因此，他不得不采取主动，与以方直接会谈。

于是，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希施菲尔德和巴解高级官员阿布·阿拉首先找到突破口，坐下谈了，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时，拉宾和阿拉法特已开始了解和接受对方的诚意了。1993年3月，当巴解执委会成员阿布·马赞通过一位实业家来打开与以色列总理直接联系的渠道时，拉宾点了头。

从一开始，拉宾和阿拉法特就明白：他们必须保密，首先是对自己人保密，即不但要对各自的反对派——利库德集团和巴解反对派保密，而且还要对自己的支持者保密。其中最担心泄密的是拉宾，他很怕吃不到羊肉惹一身膻，因此，他提出人数越少越好，范围越小越好，否则宁可不谈。他担心的是利库德集团搞到密谈证据后在议会里发难，弄得事情还没办成就先翻了自己的船。阿拉法特也同样需要保密，有“解阵”、“人阵”和哈马斯组织作对，加上部下人心不稳定，连工资也发不出，因此，他再也经不起内部造反的大折腾了。

但在哪儿谈？最终把会谈地点选在了挪威。挪威学者拉尔森擅长安排这类机密会谈。会谈在1993年1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份。主要的谈判场所设在保尔高德庄园，它是一座19世纪的农庄，室内装饰古朴典雅，屋内的壁炉里燃烧着劈啪作响的木柴，屋外白雪皑皑的园林中潜伏着双目圆睁的警卫。

谈判是艰苦的，常常为一点分歧争论数日，但通过8个月的拉锯谈，小屋里透出了光芒，巴以和平协议有了初步的雏形。但当问题越接近解决，保密工作也就越重要。后阶段除了更换地点外，连一些领导人的名字都用上了代号。拉宾为“爷爷”，佩雷斯为“爸爸”，以方主谈的副外长则成了“儿子”。巴方代表有时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比如“爷爷要求爸爸向儿子传达什么？”等等。即使专搞窃听的特工也不会弄清到底是什么意思。

通过14轮谈判，直到8月20日，以巴和平协议终于草签了。人们抑制不住泪水，狂欢高歌。两个毗邻的民族，终于开始摒弃前嫌，握手言欢了！然而，协议能否正式签订，以色列还得过内阁这一关。1993年8月29日，拉宾主持了以色列内阁会议，佩雷斯向部长们汇报了整个谈判过程以及达成协议的要害。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世界。欢呼的、沉默的、批评的、愤怒的都有。但不管持哪一种态度的人，都不得不钦佩拉

宾那非凡的胆略，因为他敢于干其他中东政治家不敢干的事情，敢于出来解决中东最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另一个成为新闻大主角的自然是巴解主席阿拉法特，他也以自己的现实、理智和大无畏的气魄博得了广泛的称赞和敬重。8月31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协议草案；9月4日，巴解主流派法塔赫也批准了这个协议；9月9日，以巴互相予以承认。

这样一桩轰动世界的大事，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完全是拉宾、阿拉法特，或者说是以色列和巴解双方的真心选择。但是，难堪的克林顿政府还是走上了前台，它要让世界知道：这场交易的经纪人是美国。美国一位官员称：“要是没有我们，和平进程决不会出现。”于是，“以巴和平协议”最后在华盛顿正式签订。

2 和平的荣耀

诺贝尔奖，是一项有影响的国际性最高荣誉。共设有和平、文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医学等5项。

鉴于1993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的“以巴和平协议”，在结束了以巴流血冲突，促进中东和平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决定，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和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拉宾。12月10日，是每年举行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和平奖颁发仪式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举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塞叶尔斯泰德分别向阿拉法特、佩雷斯、拉宾颁发了奖章、证书和奖金。这是和平的荣耀，是可以引为自豪的。

随后，拉宾他们三人分别发表了讲话。他们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把和平奖这种世界最高的荣誉给予了他们；同时还介绍了中东和谈、以巴和平协议的重大意义，以及今后的实施步骤。最后，他们都表示了将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继续努力的决心。

他们的发言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颁奖仪式后，挪威国王和王后亲切会见了他们并表示祝贺。

3 世纪葬礼

1995年11月4日晚，拉宾这只和平之鸽折翅身亡。他就像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一样，都是为中东的和平事业而献身的。当拉宾遇难的消息公布后，守候在伊奇格夫医院门外的数百名特拉维夫市民，禁不住失声痛哭，许多人自发地在街头点燃一支支蜡烛，以悼慰拉宾的亡魂。在当晚的内阁紧急会议上，阁僚们有的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们用黑纱罩住拉宾主持会议时常坐的椅子，以寄托无尽的哀思。许多反对派人士也认为，拉宾的遇害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拉宾的死，震惊了以色列，震惊了中东，震惊了整个世界。加利秘书长指出，拉宾被刺对以色列和全世界都是一个损失。5日，拉宾的遗体安放在以色列的一辆军车中，身上覆盖着象征这个犹太国的蓝白旗帜，车内6位将军守在灵柩旁。他们送拉宾最后一次走向耶路撒冷，然后守灵到国葬结束。

当拉宾的灵柩到达议会广场时，来自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全国各地的100多万群众排着长队，向这位为和平而献身的杰出领导人致哀和告别。

6日，是以色列为拉宾举行国葬的日子。这次葬礼，有人说是“世纪葬礼”。因为，二次大战以来，这次葬礼是世界各国政府要员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为一位为和平而献身的国家首脑举行的葬礼。这天，葬礼现场有6000多名来宾，全国参加葬礼的人民超过100万，各地人们则以不同形式表示哀悼。有44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拉宾的葬礼。

下午3时30分，耶路撒冷赫尔茨山公墓，祈祷声中，以色列军官将拉宾的灵柩缓缓放入墓穴中，一抔抔黄土洒了下去，渐渐地盖住了灵柩。这时，仪仗队朝天鸣枪致哀，人们便从震惊和悲哀中恢复过来，告别了为和平而献身的领袖。

4 深夜来客

拉宾之死，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也在深深地怀念着他。这人便是阿拉法特！

9日夜间，已故总理拉宾的家中，依然是一派肃穆、悲痛的气氛。客厅临时改成了灵堂。拉宾巨幅照片悬挂在进门的幕布上，下面是各种各样的花圈，它们是以色列政府、议会、军界的要人以及平民百姓送的。其中也有外国客人送的。

今晚，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将来哀悼拉宾。拉宾的遗孀利扬坐在扶手椅里，眼中不断涌出悲痛的泪水。她的女儿也在一旁守候着。

一会儿，大门打开了，利扬抬头看去，阿拉法特迈着军人步伐走了过来。这是他专程进入以色列来向利扬表示哀悼的。本来，拉宾被害时，震怒了的阿拉法特就要去以色列参加亡友的葬礼，因为对他来说，有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感情。与他一起签字、一起领奖，刚刚握过手的人，突然间便消失了。但是，以色列当局以“安全气氛不适宜”为由，婉拒了他的愿望。最后，他只好以这种形式来家中慰问其家属，并为亡友的灵魂默哀。

阿拉法特对利扬说：“拉宾是和平的真正英雄，他的不幸被害使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利扬称赞阿拉法特是拉宾的“和平伙伴”。

陪同阿拉法特前来悼念拉宾的有：巴解负责人阿布·阿拉和阿布·马赞，他们也是商谈以巴和平协议的代表。

整个这次活动是在以色列安全机构正式安排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位记者被允许赴现场报道。

阿拉法特义重如山，拉宾的亡灵可以安息了！

参考书目

- 《和平斗士——拉宾》杨苏曼等编著。
《拉宾传》杜人舟、愈文萍、商兰君等编著。
《以色列特工》吴银著。

附 录

祖孙情深

——诺阿写书忆拉宾

谢涛

去年 11 月，在拉宾的葬礼上，一位稚气未脱的少女款款登上讲台，悲痛却一点也不造作的回忆起了她与祖父在世时共享的天伦之乐，使在场的数万人和数百万收看葬礼现场的电视转播的人们感动得唏嘘不已。那位少女就是拉宾的孙女诺阿·本·菲勒索夫。

如今，年满 19 岁的诺阿已身着军装，成为以色列国防军主办的一家军事周报社的女记者。日前，在拉宾去世将近半年之际，她出版了一本回忆拉宾的书——《以悲痛和希望的含义》。

在书中，诺阿回忆了与祖父共同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上，他在慷慨激昂地呼吁犹太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要和解不要冲突。近 10 万热爱和平的人们在如痴如醉地倾听着他的演讲，我也是其中之一。在我的眼中，他是一柱永不熄灭的火焰，是一只荒原中踽踽独行的高傲的狼。他是我的英雄。”

拉宾被刺后，诺阿与哥哥约拿塔恩紧随载着重伤的拉宾的救护车赶到了医院。“我和哥哥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们的神经几乎被这突然降临的灾难摧毁。为了保持平衡不致失去理智，我们将后背靠在医院走廊的墙上，但不济事，我们仍然觉得天旋地转，于是只好顺着墙根蹲了下去。恍惚中，我听到一个快步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护士喃喃地说：“他快不行了，可他的亲人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谈到将拉宾刺死的杀手伊加尔·阿米尔时，诺阿这么写道，“他跟我一样，都上过犹太教会学校。我们甚至都住在特拉维夫的郊区赫兹利亚。但他却杀死了我的祖父……我不能原谅他，但这笔血债不能光记在他一个人头上。祖父是被只要暴力不要和平的极右黑潮吞没的，他（阿米尔）不过是那股黑潮中的一滴水珠……”

诺阿在书中呼吁以色列各界共同努力，彻底铲除极右势力这个“社会毒瘤”。“我不时应邀到一些学校去作演讲。我告诉我的同龄伙伴们，我和祖父一起度过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告诉他们，我有多么爱他，失去他我有多么痛苦……我还告诉他们，祖父和我在波兰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看到的恐怖景象……我告诉他们，是那些狂热的极右分子夺去了祖父给我的爱。”诺阿希望学校要教年轻人学会容忍，要对不同的观点持宽容的态度，并且以统一的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的大局为重。

在谈到写这本书的动机时，诺阿说，“我一直沉浸在失去祖父的悲痛中。拿起笔将悲痛写下来，也许能好过一些。当我终于将这本书写完，我有了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我已经证明自己能够面对失去祖父的事实，又能够和他自由地交谈了（虽然在书中），他也一定知道我是一个

坚强的孙女了……如果我突然发觉眼泪已在不知不觉中爬满了我的脸庞时，我知道，那一定是他听见我的声音了……”

走过疲惫的巴勒斯坦

龙应台

走之前，翻箱倒筐地寻找，终于在满墙书架上一个手够不到的偏远角落里找到了；踩上梯子，费力抽出来，再用抹布，把书面书背厚厚的灰尘拭掉，封面的烫金又亮了起来。

于是每夜入睡前，就在床上重读这本老书：《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很专心地读。

伴侣狐疑地探过头来，“有毛病呀你？”他说。

我读着读着，读到夜探，读到清晨。

黄昏时分，穿过迦法城门，走进狭长蜿蜒的阿拉伯市场。游客已经稀疏，留着小胡子的阿拉伯人闪着诡谲的眼光靠近来说：“里面还有特别的东西，进去看看？”

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

转过幽暗深邃的回廊，又是深邃幽暗的回廊；踩过几级石阶，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又是几级石阶。辗转回旋，走在历史的迷宫里，越走越深，越来越困惑，正觉得整个人已经陷在石墙石柱的阴影中时，踏脚出去却蓦然发觉头上一片晴空，月光，好像应承某种终生不渝的盟约，倾其所有地瀑泻下来，照亮了整个古城。不知怎么，我竟然立在一片层层叠叠、起伏有致的屋顶上头，放眼纵看，白石砌成的房舍城垣、教堂回寺，在温柔而虚渺的月色中纵横交错成一片惊心动魄的抽象线条。

今夕何夕？我几乎不敢眨眼，用眼光慢慢地、慢慢地描绘着月光所勾勒出来的线条。哭墙在清辉里像一面巨大的舞台布景，黑色的人影憧憧，将灵魂的重量倚在墙上。眼光瞄过教堂的圆顶，越过城垣，远处沙漠丘陵起伏，白色的沙，映着月光。月光锁着古城，像一种蛊惑。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乡土；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过平静生活，一心只想种下一株树，铺好一条路；一百多年了，我们试着和邻居修好，过免于恐惧的生活；一百多年来，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块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一起呼吸……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

坐着听以色列总理的演讲，拉宾的话哀伤而动人。可是，耶路撒冷的“苦难重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海深仇，只是一百多年的事吗？开始，恐怕是五千年前吧！

“神对亚伯拉罕说：抬眼望出去，往北、往南、往东、往西，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我应允给你和你子孙的土地。”（《创世纪》）

这片土地，就是石砾遍地的巴勒斯坦。亚伯拉罕的子孙，满脸络腮胡的耶舒华振振有辞地说：“什么占领区？这是神给我们的家产！你去读《旧约》吧！”

我读着《旧约》，却发觉问题不像耶舒华说的那么简单。和神有私盟的亚伯拉罕固然是犹太人的始祖，他却同时也是阿拉伯人的远祖。你

看，亚伯拉罕的妻莎拉不能生育，于是亚伯拉罕以她的婢女为妾，婢女生子伊斯米尔，而伊斯米尔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莎拉得到神的恩宠，以九十高龄而生子伊萨克，伊萨克的十二个孙辈，就成为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起源。

这么说起来，今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海深仇，只不过是五千年前开头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争夺家产的延续，也是人类历史上缠讼最久的房地产纠纷。

三千年前，大胡子耶舒华的祖先曾经有过一段黄金时代。才气纵横的大卫王东征西讨，打下了一个叫“耶布斯”的小城，以此为都，并改其名为“耶路撒冷”；小小土城，在大卫王不可知的未来成为人类三大宗教的圣地、历史的脐带。

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大概就在晋国打败郑国的前后吧，巴比伦的军队打进了耶路撒冷，放火烧城，俘虏了犹太国王和大臣、百姓。数万犹太人流离迁徙，这是犹太人的第一次大流亡，开始了两千多年寄人篱下的生涯。

而耶路撒冷这个沙漠中的土城，则任它朝代兴亡，高楼建起，高楼坍塌。巴比伦人来了又走了，波斯人来了又走了，希腊人、罗马人来了又走了，惟一不走的，大概只有那冷冷的月光。

当李渊称帝，建立唐朝的时候，阿拉伯人的骠马正驰骋沙场，南征北伐。“贞观律令”颁定之后几个月，阿拉伯人击溃了拜占庭的军队，长驱直入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开始成为回教徒的天下。

那是公元 638 年。

在 1993 年，如果你站在耶路撒冷的郊外山冈上，往约旦河的方向望过去，你会看见阿拉伯人的村子历历在目。头包白巾的老人手里握着拐杖，赤脚行过砂砾满布的荒野，他在找他的羊群，不一会儿，从土丘后面冒出一个黑巾蒙面的女人，那是他的妻，赶着羊群向他走来。

这一对满面风霜的老夫妻和他们黄土色的羊群，已经在名叫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脚下踩的是一代又一代祖先的足印。

当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种橄榄、喂羊群的那好几百年，犹太人在哪里呢？

犹太人一直在夹缝里惊惶喘息。别忘了，当中国开始了五朝十六国的时代，基督教已经从异端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大帝将巴勒斯坦列为“圣地”——耶路撒冷、伯利恒，四处兴起了基督教堂。1099 年，远方而来的十字军因此而理直气壮地打进耶路撒冷，杀烧虏掠，手屠犹太教徒和回教徒，甚至到 1516 年当耶路撒冷纳入土耳其人的鄂图曼大帝国时，整个耶路撒冷不过三百家犹太人。

犹太人在哪里呢？

他们在俄国，在波兰，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在每一个国家做“异乡人”。不被本地人接纳，也不愿被本地人同化，他们聚集在城墙外，自成一区，他们的凝聚力如此强大，使本地人侧目，时局不好时，犹太人就成为众矢之的。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近 20 万犹太人被西班牙人逐出家园。是“家园”，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在那儿活了好几代，可是由于是寄人篱下，主人驱客只需挥手。所谓几代家园只是一厢情愿的假想。

1881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赔出900万卢布。在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则面临灭种的危险，上百万的人被迫离乡——多数人前往美国，少数人却辗转来到原乡——巴勒斯坦，身无分文，只带了一个梦想，或许手里还有一本《旧约》。

百万人的流离失所使许多犹太人开始以新的角度审视一个历史难题：也许和地主国同化不是解决种族宗教歧视的办法，也许，也许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从俄国回到巴勒斯坦的那些少数人就怀抱着这样一个模糊的梦想，也是最初的所谓“锡安主义者”（Zionist），犹太建国主义者，我称为原乡主义者。他们流浪已久、疲倦已极的脚踏上巴勒斯坦土壤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的以巴血海世仇的开始。当拉宾沉重地说：“一百年的战争使我们伤痕累累”，他回首眺望的，正是这些原乡者在海滩上踩出的脚印，痕迹仍旧鲜明，因为淌血不断。

痛苦使人团结。1897年，第一届锡安大会在瑞士举行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议论纷纷，探讨民族未来命运。原乡建国论者还属少数；有人主张将巴勒斯坦看作一种抽象的文化祖国，有人认为和寄居国密切合作才能保存犹太文化，有人害怕犹太人建国反而会促使寄居国更加迫害，更有人建议把犹太国建在非洲刚果……奇怪的是，在七嘴八舌的建国讨论中，没有人想到一个问题：

犹太人回“原乡”建国，好，那么“原乡”上那几百万耕了一辈子地的阿拉伯人怎么办？

锡安主义者喊出一个口号：“巴勒斯坦有国无民，犹太人有民无国！”理所当然，犹太人应该移民巴勒斯坦，皆大欢喜。

怎么回事？巴勒斯坦怎么会“有国无民”呢？那手持拐杖赶着羊群，赤足走过砂砾的老夫妻和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先祖又算什么呢？

他们不算“民”，因为他们不知道何谓“国”。到了19世纪，阿拉伯人还不曾发展出国家观念。在巴勒斯坦埋首种地的老农，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家庭、部落；问他是“哪国人”，他只能瞠目以对。1913年，当阿拉伯联盟大会在巴黎召开时，与会者的目的也仅止于向鄂图曼帝国争取多一点政治权利，而不是要求民族自决。一直到一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横加暴虐，才促使阿人与英、法联合，对抗已经分崩离析的土耳其帝国。交换条件是，英国将协助阿拉伯人独立建国。

短短两年后，1917年，英国人却又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中，将巴勒斯坦许给犹太人建国——今天的以巴仇恨，竟是如此不可预见的吗？或者说，人的短视使悲剧无可避免！

犹太人一拨一拨地涌往原乡。文化中像强力胶似的凝聚力使犹太人组织起来，集体在巴勒斯坦买地。那在地上耕作的，是手掌上长满粗茧的佃农，土地的所有权，却在绅士的口袋里，他们住在遥远的大马士革、贝鲁特。土地换了主人，原来胼手胝足的佃农发觉自己一夕之间失去了生计。

“那又不是我们的错！”屯垦区里的简妮，拖着及地长裙，边煎蛋边说，“我们是用钱买的地，巴勒斯坦每一寸地都是我们光明正大买下来的。我知道可怜了那些佃农，可我们有什么办法？”

脑子里装着梦想和理想，手里紧握着《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充分

发挥他们远租亚伯拉罕的精神，一踏上巴勒斯坦就开始屯垦，用手，用脚，用汗水和智慧。

土耳其帝国溃倒之后，巴勒斯坦又来了新的主人——英国人。在英国的统治下，犹太人不断地涌入，阿拉伯人不断地暴动，耶路撒冷不断地流血。1936年，为了抗议英国不阻止流亡人潮涌进，阿拉伯人发起了长达六个月的罢工罢市运动（原来五十年前就有了“因地发打”运动）。三年后，英国人终于承诺将在十年内给予巴勒斯坦人独立，同时将犹太移民数目限制在75000人。

但是，这已是1939年，恐怖的1939年，欧洲的犹太人濒临绝境，煤气房和集中营等着他们。英国定下的移民限制，等于给百万的犹太人定下死刑。由于这个悲惨的刺激，十年后当犹太人立国时，同时也立下宪法，以色列将是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祖国，对犹太人来者不拒。

为了自救，犹太人组织了地下游击队。在1945~1946年间，游击队调动了64艘船，将73000人载往巴勒斯坦——这是现代的《出埃及记》吧？像摩西以法术使埃及人的长子猝死，游击队也诉诸恐怖暴力：大卫王饭店的爆炸中死了91个英国官兵。

沿着大卫王大街走向迦法城门，大卫王饭店就在右手边。进进出出的不再是身穿制服的英国官兵，而是背着录摄器材的各国记者，他们来为今天的耶路撒冷作历史的注脚。

历史的面貌诡谲难辨；或者说，历史根本没有面貌，只有面具，无数个面具。

当年炸死英国官兵的犹太恐怖分子，变成了日后以色列的政治领袖。当年暗杀以色列政要和运动员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成为今日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英雄。

恐怖分子和英雄领袖的差别，恐怕只印证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规则吧！而当这些由恐怖分子蜕变为政治领袖的人风度翩翩地坐下来开会时，与他们意见不同的新恐怖分子又悄悄从他们身后蹿起，像一个受了诅咒的恶性循环。

最诡谲的，莫过于面具的交换。犹太人曾经是欧洲的孤儿，他的流离使世人同情，他的艰苦建国使世人鼓掌。但是，犹太人有了归宿之后，巴勒斯坦人成为新的犹太人——现在轮到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饱受寄居国的歧视，他们没有国家的保护，巴籍作家图肯（Fouax Turki）在《失去继承权的人》中写着：

“今天，两个巴勒斯坦人碰在一块儿，马上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胞感，我们渴望团结，团结在一起承担痛苦……以前所分隔我们的阶级身份完全消失了……”

“天涯沦落人”曾经是犹太人，现在，是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的幸福，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上。所以阿拉法特在1974年说，欧洲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对犹太人欠了道义的债，良心不安，但是这个债，却要巴勒斯坦人来代偿。

1993年10月28日，以色列人米拉其离开他那由铁丝网围起来的屯垦区，步行到邻近阿拉伯人的村子里去买鸡蛋；阿拉伯人的鸡蛋比较便宜。

没有多久，人们就发现了米拉其焦黑的尸体。反对以巴和谈的回教

激进分子“哈玛斯”杀了来买鸡蛋的米拉其。

米拉其的朋友们、心情激动的犹太垦民，冲进阿拉伯人的小学，一把火烧掉了教室。

犹太人杀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杀犹太人。

以色列人杀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杀以色列人。

公元 1993 年。

经过长途的旷野跋涉，摩西和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的边缘。迦南，神所许给他们的土地。

摩西挑选出十二个精英作为侦察，出发前他谆谆告诫：

“你们去窥探迦南地；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在之处是营盘还是坚城……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

（《民数记》十三，17～20）

十二个人潜入迦南地，花了四十天的时间侦察研究。回来时，带来一支葡萄藤，藤上所结的葡萄粒硕大如斗，得由两个人用棍子穿起来抬着走。葡萄，还有鲜艳的石榴和无花果，疲惫的以色列人展开笑颜：是了，迦南是个“流奶与蜜之地”。

杀戮开始。

（鲁亚摘自《台港文学选刊》1995 年第 4 期）